



2013年第3期（总第34期）

（季刊）

卷首语

中秋之夜，我们总会吟诵苏轼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现将此词写意如下：

酒杯中的月亮，被吸入记忆的胃，不知今夕是何年。醉醺醺的月光，从青天上掘出的井洞中溜出，渗透如水的夜色。想要乘风飞去月宫的梦，经受不住高处的严寒，化作遗世的清影，在超然台上翩翩起舞。

转过朱阁的罗裳，进入绮窗的思念，与无眠的浊酒醉舞，在有恨与无恨之间，把那一轮圆月敲得山响。变来变去的鬼脸儿，与悲欢离合的表情一样阴晴圆缺。在有月的日子里，让我们把彼此的祝愿，通过或圆或缺的明月传递到远方吧。

蘇軾

2013年第3期（总第34期）

（季刊）

研究 SUSHI YANJIU



目 录

-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 主 编：张志烈
- 执行主编：李 酣
-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 编 辑：袁 丁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08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 年 9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特 稿

- 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张志烈/4
- 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晓春 申东城/5

□苏学论坛

-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 苏轼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的心路历程和文学成就 曾枣庄/9
- 追寻“真苏轼”
 - 从《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说起 刘尚荣/17
- 苏轼对“穷而后工说”的承继与拓展 庆振轩/21
- 苏轼诗歌的哲理思辨倾向 马德富/27
- 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
 - 咏梅诗的视角 陈才智/31
 - 苏轼论司马相如 房 锐/41
 - 苏轼乐山遗迹考 唐长寿/48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 酣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周成仕
周裕锴 祝 云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潘殊闲

论苏轼的治盜

彭林泉/50

关于战略苏学家的概念、素质与使命

——学习《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的体会 孟昭全/58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五)

徐 康/63

□新书评介

倾注“三心”写三苏

——熊朝东《大写三苏》的柔情与冰火 方永江/66

□苏学专家

永远的记忆，难得的教诲

——记邱俊鹏教授一席谈 乔建功/67

□研究史话

汉诗诗人江木衷(上)

——关于苏轼《聚星堂雪》的次韵诗 池泽兹子/68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十三)

——朝廷之旅(下) 雷金贵/71

东坡精神赞(上) 李时英/76

□苏学动态

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流 水/79

熊朝东“东坡传记”入选国家项目 熊 莉/79

第19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80

苏东坡流寓人生与文学暨雷州半岛

流寓文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80

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张志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各位朋友：

大家好！

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乐山师范学院隆重召开了。我代表主办方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向冒着酷暑而来的各位理事、各位会员、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礼！向筹办这次会议的乐山师范学院的领导、会员同志和会务组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乐山，古称嘉州，与苏轼家乡眉山毗邻。第 17 届在苏轼逝世地常州举办，而第 18 届则在与苏轼出生地眉山毗邻的乐山举办，便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必将唤起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深长的缅怀之情。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乐山，作为蜚声海内外的旅游城市，具有三江会合、青山环绕、优美迷人的自然环境，有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有秀甲天下的峨眉山，有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的郭沫若故居。乐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和积淀深厚的人文景观，为成功举办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文化氛围。

苏轼在青年时代便对乐山怀有亲密的情缘。有学者考察苏轼在此的遗迹达十余处，如凌云亭、洗墨池、载酒亭、东坡楼等，皆为名胜景点，观瞻者络绎不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嘉祐四年（1059），苏轼兄弟免母丧，与其父走水路南行赴京师，路过嘉州游览名山胜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初发嘉州》：“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苏轼对与家乡眉山紧相毗邻的嘉州秀丽的山水风光怀有多么难忘的依恋之情

啊，对于即将奔赴的京都更抱有“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昂扬奋力、胸襟开阔的高远情怀。

900 多年后的今天，会员朋友不远千里，冒着酷暑前来苏轼曾深情依恋的乐山参加全国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研讨“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建设”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三苏文化作为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容低估的地位，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便占有三席，这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堪称奇迹。这奇迹的产生必然与巴蜀在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三苏作为蜀学的杰出代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展与传承中的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尤其是苏轼，作为巴蜀文化的巨子，他在文化学术上巨大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疆域，穿越千载，影响遍及全国，荫庇后世。同时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四川学术开始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是在两宋时期，唐末五代时，中原长期战乱，衣冠士族纷纷入蜀避难，前后蜀国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大抵在北宋时期因三苏父子的开拓奋进而达于极盛，其间包含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文化的课题有待潜心探讨。

三苏出生于四川眉山，在继承先辈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有卓越创造，这对于当今文化的继承与革新，对于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这次会议对于加强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建设上的合作与联系具有建设性意义。我们坚信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必将把三苏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我衷心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晓春 申东城

为进一步弘扬三苏文化，服务当代文化建设，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乐山师范学院议定，于2013年7月25~28日在四川乐山举办以“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建设”为主题的“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大会引起国内外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及广大苏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会议共收到海内外参会人员提交的论文90篇，约95万字。为期两天的讨论，除了让我们进一步领略了“苏海”的浩瀚深广，同时也体现了“苏学”正日趋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显学”（江苏科大喻世华先生的《基于“中国知网”“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的苏轼研究情况分析》，通过分析数据库，认为苏轼研究已经与红学、鲁学以及孔子、老子研究一样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有成为显学的趋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苏文化作为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正不断吸引着人们探索的热情和研究的兴趣。

短短两天的会议，气氛活跃、交锋激烈，达到了张志烈会长所预期的目标，真正做到了扎实、有声有色。受学会委托，现谈几点体会。囿于学养和见识的局限，其间的疏漏和不足，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关于三苏文化的当代性与地域性

当代性与地域性，一为时间概念，一为空间概念，三苏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性与地域性，客观显示三苏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流播所凸显的意义与价值。学者们均深刻认识到，应立足当代，深入挖掘这一价值，以推进地方文化建设。有关这一论题的讨论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三苏文化的当代性

乐山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杨胜宽先生的《三苏的文化观及其当代启示》，从本于人情的文化起源观、经史并重到百家共存共荣的文化发展观、通变与致用的文化价值观等三种独特的苏轼文化观念出发，得出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人情需要的基本原则、文化发展必须遵循多元并存共生共荣的基本规律、文化的价值评判必须体现人文性时代性与进步性要求等结论。此外，成都师范学院的张春阳先生、平顶山学院赵志勋先生、《河北法制报》高级编辑齐梅鹿先生等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三苏文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

（二）三苏文化的地域性

苏轼一生飘泊，足迹所至，均全息式地投下他的人格、理想和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宝贵的地方文化资源。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三苏文化研究中活跃着一支重要的力量——地方文化研究力量。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涂普生先生，诸城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会长徐恩聪先生、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云峰先生，郏县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刘继增先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刘清泉先生，郏县苏轼研究会理事刘彩平女士，《杜甫研究学刊》编辑刘晓凤女士等为代表，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视三苏文化所惠及区域的地域文化特征，而我们看到，也恰恰是这种地域性不但成就了地方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也因为这一基因而造就了三苏文化世界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直接实际意义。因为这一研究是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前提。

（三）三苏文化的教育观

在本次的研讨中，三苏文化的教育观是结合苏轼成长的环境来思考的，体现了学界一些新的思考和探索。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宋明刚先生的《苏轼成才环境初探》，从家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心境等角度，探寻了苏轼成才原因。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希平的《苏东坡成长经历之要素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之启示》，从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三方面新探了苏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诸城市城北学校校长徐增宝先生《论中小学校在苏轼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提出开发独具特色的东坡文化校本课程，打造“特色+品牌”的现代化名校实践和理念。

二、关于三苏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一向是三苏文化研究的热点，会议研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三苏作品研究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先生的《〈苏轼诗词写意〉序》，以书评兼书序形式，充分肯定了刘清泉先生和画家杨再琪先生采用现代散文诗和水墨画组合的方式来诠释苏轼诗词意境。张会长凝练精要的评述也让我们真切感悟到苏轼文学融通书画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先生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苏轼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的心路历程和文学成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苏轼的文学成就与苏轼的人生遭际呈现出反向的情形。苏轼历贬三州，文学成就也远超过他处境顺利时，从中我们既能看到苏轼人生遭受着一次次的挫折，文学却实现了一次次超越，也深刻领悟了“诗穷而后工”的道理。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刘培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红霞教授专门对苏轼、苏辙的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潘殊闲教授的《试论苏轼海南诗词的“海”味》，让我们体会到了苏轼远谪海南三年诗词独特的思想、艺术和风格。台湾东华大学副教授张蜀蕙女士着重分析了苏轼的纪行诗中的舟行诗，强调了这类诗词在苏诗中独特的地位和耐

人寻味的审美意义。此外，汉中市陆游学会会长、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名誉教授孙启祥先生，《超然台》编辑部编辑王晓磊先生均分别就他们所关注的具体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解读。

（二）苏轼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关于苏轼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就是将苏轼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成就放置于中国文学生动的语境中进行考察，突出他所关联的谱系及所做出的贡献与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先生的《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咏梅诗的视角》，指出苏轼于白居易受容最大超越处在于将梅格与人品有机融合，创造性地提出“梅格”概念。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暨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庆振轩先生的《苏轼对“穷而后工说”的承继与拓展》，指出苏轼力主“诗能穷人”之说，并且有“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穷达”透脱之论，对“穷而后工说”之说有新的拓展。盐城师范学院王文龙教授认为东坡论诗诗是杜甫论诗诗的嫡传，且更有其独创性，其论诗宗旨大体上可归结为对诗艺的研究和诗美的探求。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房锐女士通过赏析苏轼三篇短文，得出苏轼对司马相如一生行事和为文进行了否定性评价的结论。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伍联群女士从政治、文化、巴蜀士人三方面论述了入蜀文人的巨大贡献，其中有张方平、雷简夫对三苏父子的扶助、荐举和识拔。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申东城先生的《苏轼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从苏轼巴蜀诗数量和五阶段分期、苏轼巴蜀诗变体现苏诗之变、苏轼巴蜀诗展示出苏诗的承唐启宋及其价值意义三个方面，论述了苏轼巴蜀诗及其价值。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段莉萍女士、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副教授宋秋敏女士、宜宾学院副教授赵德坤先生、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王琴也就苏轼诗词诗论的继承与创新进行了有创见的分析。

三、关于三苏思想生平研究

思想研究向来也是“苏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在宋代儒、道、释交汇的思想文化语境中，

弄清三苏思想方面的抉择和基本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次会议这一领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一）从文学创作反观其思想特征

这也是研究三苏思想的基本路径。三苏的思想和人生感悟大都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的。四川大学马德富教授的《苏轼诗歌的哲理思辨倾向》认为，苏诗的哲理思辨因其对困境的体验和超越而上升到了崭新的境界，同时也突破了唐诗情景交融的艺术范式，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天地。韩国东国大学国际语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朴永焕先生的《苏轼禅诗所体现的幸福》指出，贯通苏轼禅诗的重要思想，是坚持伴随着大乘空观、随缘自适、无执著、圆融无碍等因缘的人生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杨治宜女士通过对苏轼流放岭海期间和陶诗的解读，认为苏轼的“回归”是美学和伦理的回归，即通过美学方面走向平淡，在伦理方面走向生命原始本然状态，最终遁入内心的“乌托邦”。此外，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庄逸云女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伟先生、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刘丽珈女士等均就苏轼相关作品所呈现的思想与心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二）继续关注三苏儒道佛思想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沈如泉先生的《苏辙养生修道简论》，分析苏辙养生修道三特点，指出佛道思想使其对待生命和生活态度更积极。平顶山学院文学院罗浩刚先生的《苏轼与孔颜乐处命题》，认为苏轼的快乐生活和快乐哲学是孔颜乐处命题充分展开的结果。常州工学院高纯林先生的《在中华传统文化培育下——浅谈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从生活、交往、诗文作品及名人评论等多方面，论说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此外，武汉大学文学院程磊先生、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杨松冀先生、宝鸡文理学院王渭清先生还就苏轼人格的形成与特征进行了颇有新意的分析。

（三）政治与哲学思想

三苏尤其是苏轼的政治与哲学思想是三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现正在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尽管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还不能

令人满意。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教授的《苏轼倡兴“天下之水学”应得到注意》一文，敏锐地发现并简要阐释了苏轼由孔孟“水道”而提出的“水学”的政治理念和治世原则。西华师范大学金生杨教授的《眉山苏氏与扬雄〈太玄〉》，揭示苏洵、苏轼对扬雄所作《太玄》皆有论说，并直接影响到扬雄历史地位的升降。黄冈市的谈祖应先生介绍了苏轼《东坡易传》中标新立异地提出了“以有所不同为同”、“和而不同为和”以及“惟同必睽”、“知睽必同”的同异辩正观。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林宜陵女士、乐山师院文新学院副教授唐瑛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潘玥女士均对苏轼特定时期独特的政治情怀进行了细腻体察和呈现。平顶山学院郝二旭先生、杨秋玲女士专门就苏轼的农业思想进行了评述。此外，眉山的赖正和先生、乐山师院副教授何晓苇分别对苏洵积极有为的精神层面和苏轼一贯的裕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四）生平史实的考证

乔建功、王祥林、王宪斌、罗宁等先生在详细占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均对与三苏相关的史实进行了辨析与考证，为我们了解三苏的生平和相关史实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四、关于三苏接受与传播研究

三苏的接受与传播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讨论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首先是三苏的接受与传播研究，这方面研究体现了研究者较为宽阔的视野和一些新的突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论苏轼〈赤壁赋〉的“跨体”传播与“跨国”传播》指出《赤壁赋》跨体传播的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一名篇在韩国、日本的传播盛况。厦门理工学院何李女士、四川理工学院万燚女士分别讨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三苏书写和苏轼形象的变异。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杨玉英对英语世界《赤壁赋》研究概述、英译、英译注释与评论、文本解读等做了梳理，并分析了译介误读、误释的原因。郏县苏轼研究会会长萧根胜先生、副会长刘继增先生采用地方文献学、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方法，以苏轼在中原为个案、

人地关系为视域，在明清时期特定历史坐标中，探究和梳理苏轼中原宦绩和行踪诗文在中原地区传播的基本路径。

其次是“后苏轼时代”对苏轼的接受与传播。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武振玉教授的《苏轼韵文明代接受文献辑考》，从“为韵”、“和苏”“仿苏”“效苏”“拟苏”“用苏”“集苏”等方面，对明代苏轼韵文的接受文献进行了全面辑考。深圳大学刘尊明教授和李志丽女士对历代次韵“赤壁词”进行了定量的统计和分析，凸显了苏轼这一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此外，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何泽棠、西华师范大学方新蓉、保定学院中文系李新、乐山师范学院徐立昕等也分别从更加具体的层面探讨了“后苏轼时代”的接受和传播。

五、关于苏轼书画艺术研究

苏轼在书画艺术方面突出的成就使研究者从来就绕不开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关于书画方面的研究，直接研究作品的文章仍然很少，主要都集中在对其画论书论的研究上。乐山师范学院陈晓春教授的《苏轼画论略谈》，强调要将苏轼的画论放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的思想文化及艺术理论语境中来细读，苏轼有关绘画的言论虽然零散但已经形成了包括本体论、创作论和审美风格论的绘画理论体系。《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编辑彭燕女士从杜甫的题画诗说起，对杜甫、苏轼二人书画艺术的审美观，以及二人艺术审美分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王万洪先生的《苏轼书张少公判状发微》通过张旭笔法来由的讨论，以及苏轼对张旭草书几则评论的剖析，指出了苏轼尚意书风的得与失。另外，王琳祥、张海等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苏轼与绘事相关事实的考证和与画家们交往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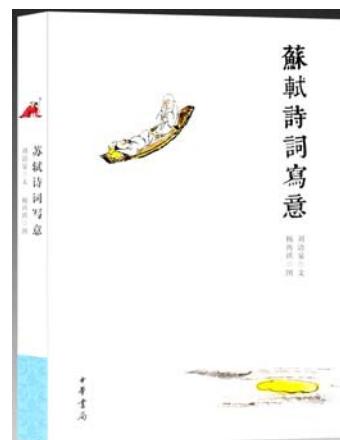
最后，我们还想郑重推荐中华书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刘尚荣先生的《追求“真苏轼”》一文，文章以严谨科学的分析进行学术打假，刘先生所强调的学术规范，是一个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需要特别关注、特别重视的问题。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才智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苏轼研究书目》，汉中宗教局张芳女士

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汉中作协主席清扬女士的中篇小说《情归苏东坡》。

两天的学术研讨，大家围绕会议主题，或者从价值论出发，深入研究三苏文化在当代宝贵的价值和丰富的意义，它的接受、传播和深远影响，或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深入探讨三苏文化本身的特征及其多元的构成，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等。两方面的研究在内容方面有新的拓展，在方法手段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正如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三苏研究的成果多，但问题仍然不少。他所列举的诸如选题重复但仍有盲区、新观点新方法不多等问题在本次会议中依然或多或少存在。这都有赖于我们今后加倍努力，以更大的智慧、更严谨科学的态度推进了三苏文化研究迈向纵深。

2013年7月27日

（陈晓春，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申东城，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书名：苏轼诗词写意

作者：刘清泉/文 杨再琪/图

出版：中华书局 2013年10月第1版

板式：大32开、192页、彩印

定价：30.00元

购买：请联系《苏轼研究》编辑部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苏轼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的心路历程和文学成就

曾枣庄

内容提要 苏轼想“致君尧舜”却一事无成。他历贬三州，处境越来越差，心理适应能力却越来越强，文学成就也越来越高。

关键词 苏轼三贬 心路历程 文学成就

一、苏轼《金山自题画像》的本意

北宋著名画家、苏轼好友李公麟画苏轼像于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苏轼去世前不久，过金山，撰《自题金山画像》①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有人据此说苏轼自认为他一生的“功业”，特别是文学成就最大的时期是他贬官黄州、惠州、儋州时。“诗穷而后工”，仕途得意，特别是身处庙堂之上的文学家往往写不出好作品，只有在他们穷愁潦倒时，才能写出好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苏轼贬官黄州、惠州、儋州期间的文学成就最高是对的。但如果说是苏轼此诗的本意，那就完全理解错了。苏轼从小也“奋厉有当世志”②，认为“致君尧舜，此事何难”③，他怎会把三次贬谪认为是他“平生功业”所在呢？这样解释也与此诗前两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很不协调。

苏轼一生为官四十年，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很短，多数时间是做地方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所度过的，建功立业、“致君尧舜”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回顾一生，他深感“身如不系之舟”，“长恨此身非我有”，早已心如死灰，不禁悲从中来，感

慨万千。所谓“平生功业”完全是反话，也就是一事无成之意。他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的诗文，更具体证明了此诗的这一主旨。

二、“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初贬黄州

在苏轼的三次贬谪中，他对初贬黄州反应最大，最为心灰意冷。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赴黄途中，经过陈州（今河南淮阳）时，苏辙专门赶来看他。苏轼在《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中写道：“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很大，不但打掉了他平时的“骄气”，而且连“奋厉当世”、“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也消磨殆尽了。“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平时总想“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水调歌头》），结果不仅未能“功成名遂”，反而成了罪人，连“扶病入西州（指家乡四川）”也无望了，只好作“齐安（黄州）民”了。他显然没有把贬官黄州视为他的“平生功业”。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他在《初到黄州》诗中自我嘲笑说：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贬官黄州不是他的“平生功业”，而是“荒唐”“事业”，即无罪被贬。“诗人例作水曹郎”

的“例作”二字，充分揭示了正直诗人的共同命运，如何逊、张籍等诗人都作过水部郎中之类的闲职。苏轼此时也被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故说“无补丝毫事”。检校官俸例以退酒袋折支，故云“尚费官家压酒囊”。但也正好因祸得福，从此有时间欣赏长江的“鱼美”，体味山中的“笋香”了。这显然是一首自我解嘲，自我安慰，表面轻松而实际充满牢骚的诗篇。

苏轼在黄州常游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一词二赋，是他“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的集中表现。《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篇气壮山河，寄慨万端的作品。上阙主要写赤壁，引出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下阙主要写怀古，归到伤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他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慨叹“千古风流人物”一去不返，通篇充满了作者的美好理想同可悲现实的矛盾。他本希望像“千古风流人物”和三国时的“多少豪杰”那样建立功名，特别是希望像“公瑾当年”那样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但是，可悲的现实却是“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反落得贬官黄州，于是发出了“人间如梦”的哀叹。全词状景写人，怀古伤今，慷慨激昂，苍凉悲壮，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最足以代表苏轼豪放词的特色，被誉为“千古绝唱”。

《赤壁赋》④则用老庄的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的痛苦。赋的开头描写了月夜泛舟大江的美好景色和饮酒赋诗的舒畅心情，接着，作者通过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声，自然地引出了主客间关于人生意义的一场辩论。主客的对话，实际上都是作者的独白，是他陷于深沉苦闷而又力求摆脱的矛盾心情的表露。他通过客人之口说，当年的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像这样不可一世的曹操，

都被时间的流水洗尽了旧迹，何况自己已经“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还能“致君尧舜”，留名青史吗？“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太渺小了，太短促了！这是“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深感壮志难酬而发出的沉痛哀叹。但他不愿沉浸在悲观的思想中，而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好搬出老庄的处世哲学来自我安慰说，从变的一面看，人生固然短促，渺小，但从不变的一面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高官厚禄既“非吾之所有”，就只好“莫取”了，但“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可以尽情享受而又与世无争。结尾处的“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实际上掩藏着作者难以排遣的苦闷，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后赤壁赋》中“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更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同样表现了作者贬官黄州期间孤寂悲凉的心情。

为什么苏轼对贬官黄州反应如此强烈呢？这是因为苏轼在此之前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即使因政见不合，离开朝廷，但在杭州是任通判，是地方副长官，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也是地方长官，过惯了“倾城随太守”（《江城子》）的生活。现在却先被投入御史狱，几乎被杀头，继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生活反差太大了。他在黄州的生活大体可概括如下：

一是孤独。为了防止言多必失，苏轼尽量不与人往来。他在《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中说：“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为了防止再次因文字得罪，他尽量不作诗文。其《与陈朝请二首》云：“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苏轼在黄州，众人有些回避他，他更回避众人，整天闭门谢客，过着孤独寂寞，借酒浇愁的生活。他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中说：“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任，听凭）嘲骂。”他的

名篇《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更是借名花的幽独寓自己的幽独，苏轼正像“幽独”的海棠一样处于“粗俗”的桃李之中，天姿自然，不准备追求华屋金盘：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他在黄州无事可干，到处闲游：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遙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突然看到这样—株美丽的海棠，因此感慨万千：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天涯”一句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己的命运正好与海棠相似，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宋人魏庆之说：“东坡作此诗，词格超逸，不复蹈袭前人。”又说：“(苏轼)平生喜为人写(此诗)，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轼平生得意诗也。”^⑥此诗正是苏轼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

二是穷困。《答李端叔书》说“廩入既绝，人口不少”，他只好开垦东坡荒地为生。在《东坡八首》中说：“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廩何时高。”

三是深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的对他落井下石，乘机“推骂”；有的生怕牵连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其《答李端叔书》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送沈达赴广南》说“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当他“廩入既绝”时，更是无人帮助，《蜜酒歌》说：“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势利。其《王子立墓志铭》说，当“余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时，王子立、王子敏兄弟不但没有“惊散”，反而送苏轼出郊，安慰苏轼，并把苏轼家属送到苏辙处。苏轼在湖州被捕，押送进京的途中经过扬州，扬州知州鲜于侁要求见苏

轼，为御史台官吏所拒，并要他烧掉同苏轼的往来书信，以免受连累。鲜于侁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⑦；《答陈师仲主簿书》说他贬官黄州后，钱塘主簿陈师仲曾因乌台诗案“偶有关及者”而受牵连，但他仍“不以前事介意”，主动多次给苏轼写信，在他所作诗文中“十常有四五”提及苏轼兄弟。苏轼深有感慨地说：“自得罪后，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足下独犯众人之所忌，何哉……何相爱之深也。”特别是马正卿，追随苏轼二十年，苏轼贬官黄州，他也来黄州，并参与东坡垦荒。苏轼在《东坡八首》中写道：“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当地的潘生、郭生、古生也参与了东坡垦荒：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

苏轼的可贵在于虽处困境，仍无所畏惧。他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面对“穿林打叶”的“风雨”，苏轼一面“吟啸”，一面“徐行”，从容不迫，无所畏惧。“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在苏轼看来，“风雨”终将过去，“斜照”必然相迎。

中国的大小河流一般都向东流，蕲水却向西流。苏轼在《浣溪沙》中写道：“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同样表现了他虽处困境，仍对前途充满信心。溪水尚能西流，难道人生就不能再少？何必自伤发白，悲叹衰老呢？

苏轼在黄州既无公务，又不敢多作诗文，不敢多与人交往，只好努力研读经书：“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在贬官黄州期间，他虽然用各种办法来逃避现实，但是仍然不能完全克制自己，仍然不时要发泄自己的愤懑。他少有壮志，才气横溢，却遭到贬斥，而那些酒囊饭袋，却能扶摇直上，安于朝廷。他在《洗儿戏作》诗中愤慨地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骂得何等

痛快！寥寥四句，充满了作者的悲愤，像他这样“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聪明”人，往往一生穷愁潦倒，坎坷不平，甚至丢掉脑袋，而那些愚鲁之辈，倒能无灾无难，青云直上。这正是中国历代的升官图，深刻揭露了中国官场的黑暗。《宋史·苏轼传》说他的“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这首《洗儿》诗就属于这种“嬉笑怒骂”之词。

三、“人间何处不巉岩”——再贬惠州

元祐八年（1093）是苏轼又一倒楣时期 的开始。九月，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哲宗对元祐大臣的态度首先在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的问题上表现出来。苏轼作为哲宗的侍读，朝廷的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陞辞。但哲宗却以“本任官阙”为借口，拒绝苏轼上殿面辞。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说：“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苏轼深感“国是将变”，要求哲宗“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哲宗不但没有听从他这位老师的劝告，反而起用新党，尽逐元祐大臣。苏轼更是一贬再贬，再也没有让他回朝。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他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中感叹道：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紫绶，系官印的丝带。恩纶，皇帝的诏令。“适见恩纶临定武”指哲宗不久前还曾派人到定州“赐日历”、“赐衣袂”给他；而现在却突然受到“落两职，降一官”（“分职”）的惩处而被远谪英州。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白居易贬官的地方。苏轼怕触景伤情，因此说“休宿浔阳旧酒楼”。

苏轼在赴贬所途中的纪行诗，抒发他的抑郁心情。或后悔奔走官场，《过高邮寄孙君孚》说：“宦游岂不好，毋令到千钟”；或感叹人间

坎坷，《慈湖夹阻风》说：“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或深感人生如梦，《天竺寺》说：“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⑦；或感叹救国无术，《望湖亭》说：“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苏轼在赴英州途中，就担心会有“后命”，其《与孙子发七首》之五说：“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果不出他所料，他还未到英州，八月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宋代，节度使是无权的虚衔），惠州（今属广东）安置。他在《与程德孺书》中说：“业已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

苏轼深受老庄思想影响，善于“随缘委命”。他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中写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新丰在陕西临潼东北，汉高祖刘邦是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建都长安后，其父思归，刘邦就在这里仿照丰邑改筑此城，并把丰邑之民迁来，故叫新丰。广东也有新丰县，在惠州之北。苏轼虽然是“初到惠州”，但觉得“仿佛曾游”，连新丰的鸡犬似乎都为自己的到来高兴。

“吏民惊怪坐何事”，指自己是无罪被逐。苏武，汉武帝时人，出使匈奴，十九年不得返汉。管宁，三国时人，汉末避乱辽东，三十七年始归。

“苏武”二句表明，他作好了长期贬谪的思想准备。当地百姓以“岭南万户酒”款待他，安置他这位远方来客。

他未到惠州时，就有人为他介绍“惠州风物之美”：“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到达惠州后，更觉得确实名不虚传：“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苏轼初贬黄州，心情十分悲凉，再贬惠州，已有较强承受能力，心情好多了：“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与陈季常》），“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苏轼在惠州萦怀于心的不是贬谪，而是病且死于惠州的侍妾朝云。据苏轼《朝云墓志铭》，朝云姓王字子

霞，钱塘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朝云年仅十二，被苏轼收作侍女。大约在苏轼贬官黄州时，成了他的“侍妾”。生子苏过，未满岁而夭。她是苏轼的红颜知己，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可谓一语中的！说苏轼满腹文章或满腹识见，当然也对。但苏轼之所以为苏轼，苏轼之所以在新旧两党当政时都遭到排斥打击，就因为他一肚皮不合时宜。王安石当政时，他反变法；司马光当政时，他又反对“尽废新法”。从“退朝”二字可知，此事发生于元祐年间。

当时秦观、苏轼各有一首《南歌子》^⑧。秦词云：

靄靄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春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
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苏词是答秦词的：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
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关于秦观这首词的本事，胡仔云：“朝云者，东坡侍妾也，尝令就秦少游乞词，少游作《南歌子》赠之”^⑨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九录此词，直接题为《赠东坡侍妾朝云》。如果把苏词与之对比，就可看出两首《南歌子》都是写朝云的：秦观把朝云比作巫山神女，苏轼也说“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秦观说她“暂为清歌住”，苏轼也说她“待歌凝立翠筵中”；秦观写她“瞥然归去”，苏轼也写她“回身燕漾空”；秦观说自己见她归去而断肠，苏轼答以朝云匆匆归去的原因：“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两词丝丝入扣。

如果说苏轼早年主要欣赏朝云的“舞衫歌袖”，而在贬官惠州期间却对朝云的人品越来越尊敬。他在《蝶恋花》词中写道：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鬢鬟生彩。这些

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朝云好佛，这首词用了一些佛语。一二句以维摩自喻，第三句以散花天女比朝云。全词是说，自己虽“白发苍颜”，远谪惠州，却像维摩一样超然无垢，贬所虽仅一丈方室，但何妨朝云舞姿像天女般散花。其《朝云诗》中的“天女维摩总解禅”，可作此词前三句的注脚。接着描写朝云在惠州虽然不离“药炉”，但风韵却不减当年，仍然是樱桃小口，髻鬟生辉，浓发如云，翠眉如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这首词中所用的“纫兰为佩”，语出屈原《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蓠、辟芷、秋兰皆香草，喻“内美”，即苏轼所说的“好事心肠”；“修能”指美态，即苏轼所说的“着人情态”。苏轼用屈原自赞其高洁的句子赞美朝云，充分说明了他对朝云的敬慕。

为什么苏轼这样敬佩朝云呢？《朝云诗》作了很好的回答：“不似杨枝（即樊素）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伶玄，西汉潞县人，《赵飞燕外传》的作者，通德即樊通德，“能言飞燕姊弟故事”，伶玄的《赵飞燕外传》即据他所讲的飞燕故事写成。由此可见，苏轼之所以特别看重朝云，就在于朝云“好义”，能随他“南迁”。苏轼是“风流太守”，他当然对“舞衫歌袖”很欣赏，但他又是情操高尚的人，对歌伎的人品尤其看重，喜欢“绝妙年中有品流”者。王定国因与苏轼乌台诗案牵连，坐贬广南，其家歌伎柔奴随行。后北归，苏轼问柔奴道：“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了很感动，在《定风波》词中称美柔奴道：“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王定国的柔奴与苏轼的朝云，都不仅“眉目娟丽”，而且心灵很美。苏轼对柔奴的称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他对“独朝云者随予南迁”的崇敬之情。

朝云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随苏轼到达惠州贬所，不到两年，即绍圣三年(1096)七月病卒于此。苏轼对朝云之死是很悲痛的，写了两首诗、一首词、一篇墓志铭、一篇荐疏来

寄托自己的哀思。词是题作《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惠州珍禽）。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表面看，这首词是咏梅，实际上却在借物拟人，借咏梅花的高洁来歌颂朝云的高洁。“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惠州梅花的不畏瘴雾正象征了朝云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精神。她面临恶劣环境，却能泰然处之，飘飘然仍有神仙之态。“素面”二句形容朝云以本色为美，卸妆之后亦不减色。“高情已逐晓云空”，她是一去不返了，在清空的词语背后，含有苏轼的无限哀痛。

苏轼这种哀痛之情，在《悼朝云诗》中表现得尤为激切，这有助于加深对这首咏物词的理解。“驻影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他自恨没有药可使日影停驻，使人长生不死，使朝云红颜长在，她死后，自己只有念佛来为其“赠行”而已。“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中勤礼塔中仙”，现在是前生冤债已偿，后世姻缘难期，好在人总是要死的，自己不久也将同朝云一起“归卧竹根”，但现在，他只有向朝云安眠的大圣塔不断礼拜而已。全诗凄恻悲凉，催人泪下，可与元稹著名的悼亡诗《三遣悲怀》媲美。

四、“海南万里真吾乡”——三贬儋州

绍圣四年（1097），朝廷再次加重对所谓元祐党人的惩处，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再贬儋州。其《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十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已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到昌化军谢表》说，临行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难道）许生还”。苏辙也再贬雷州（今属广东），苏轼《吾谪海南，作诗示子由》安慰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非常幽默，他说琼州、雷州虽为海所隔，但还可隔海相望，这正是皇恩浩荡啊！宋朱弁说：“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

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岛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⑩他坚信一切逆境终将过去，“方轨八达之路”就在前头。

苏轼于七月二日到达儋州，儋守张中对他很好，让他暂住行衙，并开始为他整修官舍，以备居住。为了自食其力，苏轼要了一块官地耕种。《籴米》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市之。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不久，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岭南，派人把苏轼从官舍逐出，张中也因此罢官。苏轼只好在儋州城南买地，筑屋时得到当地人，特别是追随学子的帮助。特别是王介石，其《与郑靖老书》称他“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在友人的帮助下，茅屋修成了，新居景色宜人，其《新居》说：“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比起官屋来，这里宽敞得多：“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屏弃，驱逐）。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屋子四周有很多桄榔树，苏轼就用桄榔叶编织了苏东坡三字挂在门上，把这一新居叫做桄榔庵，并写了《桄榔庵铭》：“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入怒”。他决心生住于此，死葬于此（“生谓之宅，死谓之墟”）。

海南百姓除帮助苏轼建屋外，还在生活上经常帮助他。有的为他送食，其《纵笔三首》云：“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燔是古代用于祭祀的烤肉。“定燔吾”即一定会送祭灶的烤肉给他。话说得这样肯定，表明左邻右舍送食给他已成常事。从其和陶诗中的《和陶拟古九首》第九首看，当地还有人送木棉布给他御寒：“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鸡蛋吉贝布，海风今岁寒。”苏轼对“生不闻诗书”，“荣辱未易关”的黎山老人充满羡

慕之情，实际上也就是后悔自己误入仕途。

苏轼同海南人民的关系十分融洽，其《被酒独行》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宋赵德麟记此诗背景云：“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①小孩更爱吹着葱叶，追随苏轼：“总角(儿童的束发)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同上)一次，他访黎子云兄弟归来，途中遇雨，便向农妇借一斗笠和木屐穿上，引得孩子们大笑。有人据此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这幅画是苏轼在海南生活的生动写照。

宋代的海南岛还是十分荒凉的地方，丁谓贬海南，作《有感》②诗云：“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若到京华。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夜听猿啼孤树远，晓看潮上瘴烟斜。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州城人口不到三百户，麋鹿甚至跑到县衙游玩，其荒凉就不难想象了。儋州的情况好不了多少，生活条件比惠州艰苦得多。其《与程秀才书》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儋州的气候炎热潮湿，容易生病，年过六旬的苏轼更难适应这里的气候。他说，这里的物品到了春夏之交，没有不发霉的，而人非金石，其何以堪？这里又特别缺医少药，他只好托人从内地给他寄一些药来，一则供自己治病，二则也可以救济他人。他在《与程全父十二首》之十二中说：“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此间举无有，得者即为稀奇也。间或有粗药以授病者，入口如神，盖未尝识耳。”但内地来岛上的船只很少，不可能经常带药来。这时苏轼已经须发皆白，瘦骨嶙峋。无病时精力还好，饮食如故；一生病，加之缺药，就受不了了。他在《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一中说：“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州)、广(州)海舶绝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就物质生活讲，苏轼父子在儋州确实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就精神生活讲，苏轼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苏轼的组诗《谪居三适》集中表现了他这

种“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一是《旦起理发》：“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蹀躞响珂月，实与粗械同。”年轻时候，睡眠很好而忙于朝谒，痒未搔足就要衣冠楚楚地朝谒上司，拜会同僚，如服辕之马，如粗械加身，很不自由。现在好了，每天可以“安眠”到“日出”才起来梳头，清爽极了：“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二是《午窗坐睡》，两脚盘在蒲团上，两肘靠着竹几，沉沉入睡，重游“无何有”之乡：“蒲团盘两膝，竹几阁双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三是《夜卧濯脚》：“长安大雪年，束薪抱衾裯。云安市无井，斗水宽百忧。”长安柴贵，云安水贵，都不可能舒舒服服地濯足。儋州虽然米贵，“得米如得珠”；但柴、水不缺，可任情“濯足”：“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这里虽然缺药，但洗脚就可疗脚疾：“土无重臚(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谁还会再次把足裹起来，去做虚有仪表的猕猴呢？以上“三适”，都是在官场中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的乐趣，所以他说：“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高官)？”

元符三年(1100)，年仅二十七岁的哲宗病逝，徽宗赵佶继位，政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有利于元祐党人的变化。哲宗当政期间被贬的官吏，已死的追复原官，录用其子孙，未死的逐渐内迁，苏轼也在其中。五月，苏轼被命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在经过海南岛北部的澄迈驿时，他登上通潮阁，北望中原，仍觉渺渺茫茫。其《澄迈驿通潮阁》说：“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苏轼从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渡海来儋州，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还，整整三年了。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全诗充满了兴奋之情，似乎真的“参横斗转”，“云散月明”，海天清澈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生活结束了，“苦雨终风(西风)”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但是，苏轼高兴得太早了。宋徽宗上台后，

最初想调和新旧两党，调和未成，又再度绍述新政：“朝廷命令，莫不是元丰而非元祐”^⑬，政治空气又为之一变。苏轼连北归颍昌与苏辙团聚都不敢，于建中靖国元年（1001）七月卒于江苏常州。

五、结语

综合上述，第一，苏轼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一心想“致君尧舜”，他不可能把三次贬谪认为是他的“平生功业”所在。第二，苏轼三次谪居之地，离京越来越远，环境一处比一处差，特别是儋州，更是无肉、无药、无室、无友、无炭、无泉的“六无”之地。第三，苏轼对逆境的心理适应能力却一处比一处强。他在贬官黄州之前，一直处于顺境之中，故贬黄州时，感到似乎一切都完了，“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贬惠州时，已觉得人生难免受挫（“人间何处不巉岩”），只为朝云之死颇感伤情；贬儋州时，他已坚信一切逆境终将过去，前面会有“方轨八达之路”。从贬黄州的“落尽骄气浮”，到贬惠州时的“人间何处不巉岩”，再到贬儋州时“海南万里真吾乡”，这就是苏轼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的心路历程。

“诗穷而后工”，苏轼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他处境顺利时的成就。如前所举，贬官黄州以后，他写了不少抒发个人感慨的诗篇，但也同样写了不少为民请命的政治诗，如赴黄途中《蔡州道上遇雪》的“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黄州所作的《五禽言》的“水中照见催租瘢”，《鱼蛮子》对渔民“何异獭与狙”的非人生活，寄予了深切同情，并发出了“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的愤怒抗议。岭南所作《荔支叹》不仅指斥汉唐进贡荔枝害民，而且指名道姓地揭露本朝大臣“争新买宠”，甚至暗暗讽刺当今皇上“致养口体何陋耶”！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在苏轼贬官黄州之前，他们兄弟的文章还可相“上下”，“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苏轼在诗词文赋等方面的许多名篇都是在贬官黄州期间写成的。贬官岭南特别是海南时的诗文，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说：“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黄庭坚《与欧阳元老书》⑩云：“寄示东坡岭外文字，今日方暇遍读，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陆游《跋东坡诗草》⑪说：“近世诗人老而亦严，未有如东坡者也。”刘克庄《后村诗话》⑫说：“和陶之作，如东海青，西极马，一瞬千里，了不为韵束缚。”可见前人多认为“东坡岭外文字”代表了他一生最高的文学成就。

注释

^①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四八。下引《苏轼诗集》诗，只随文括注卷次。

^② 苏辙《栾城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③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4页《沁园春》（孤馆灯青）。下引苏轼词，只随文括注该书页码。

^④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一。下引《苏轼文集》文，只随文括注卷次。

^⑤ 南宋魏庆之著《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卷一七。

^⑥ ⑩ 脱脱著《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三四四《鲜于侁传》、卷三一四《范纯礼传》。

⑦ 在苏轼十二岁时，父亲苏洵曾游天竺寺，到他这次经过此地，已四十七年。

^⑧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92、694页。

^⑨ 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卷二九引《艺苑雌黄》。

①②③④⑤⑥ 《曲洧旧闻》卷五,《侯鲭录》
卷七,《宋诗纪事》卷六,《山谷集》卷一九,《渭南文
集》卷二七,《后村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

(曾枣庄，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追寻“真苏轼”

——从《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说起

刘尚荣

内容提要 指出《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在介绍苏轼生平及其文人画理论时，不足两千元的篇幅竟有十来处漏误。

关键词 追寻 真苏轼 以《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为例

苏轼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历史文化名人，他的遗闻轶事，也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聊博一笑，也无可厚非。然则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评判这位伟大诗人、画家时，就必须严谨认真，切忌戏说与胡诌。可惜浮华与浮躁的学风，总是对全面正确解读“真苏轼”，带来各种干扰，也总令我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近日偶然看到某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撰写的《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简称《美术史》），其中用不足两千元的篇幅介绍苏轼生平及其文人画理论，竟有十来处违背学术规范，甚至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漏误。对此本人将逐条辩证，并求教于方家。

一、《美术史》介绍苏轼生平，第一句话是：“苏轼，四川眉山人。”此说无误，但不规范。

按《美术史》体例，介绍画家生平首先要括注其生卒年。某些画家生卒年存疑未定，也毫无例外地作了括注，如《美术史》229页：“李唐（约1066～1150年）；又如233页：“马远（1140年前后～1225年前后）”。众所周知，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无论干支纪年或公元纪年，都可以对苏轼生卒年作精确的标注；不注，显系疏漏。此外“四川眉山人”是用今

天的地名标示古人的籍贯，不够精准。精准的标注方式应是：“宋眉州眉山县（今属四川省）人”；或云：“今四川眉山（市）人”。明确古今地名对应关系。

二、《美术史》：“苏轼二十一岁时参加科考，考中进士第二名。”这里年龄与名次的计数似有问题。

苏轼携弟苏辙于嘉祐二年（1057）正月参加礼部考试。按古人计龄通常用虚岁，则此年苏轼虚龄二十二岁，按今人计龄惯用实岁，则此年苏轼实龄二十岁。无论采用哪种计龄法，都得不出“嘉祐二年苏轼二十一岁”的结论。

据《宋史·选举志》，“礼部贡举……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第3604页）考试内容既达六项，则考绩亦应分述。

（一）诗题：丰年有高廪。宋·江休復《嘉祐杂志》载：“嘉祐二年，欧阳永叔主文，省试《丰年有高廪》，云出《大雅》。举子喧哗。为御史吴中复所弹，各罚金四斤。”考《诗·周颂·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苏轼的答卷歌颂盛世丰年乐，可谓中规中矩，但在辞藻典故，对仗韵律诸方面并未出彩。因此，苏轼手编《东坡集》不收此诗（本应是今知苏轼编年诗开卷第一首），后人编《东坡外集》卷十，首苏轼所写《丰年有高廪》诗。孔凡礼整理《苏轼诗集》卷四十八收有此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29页）。可以认定苏轼此诗并未考得高分，他本人也不看。

（二）赋题：佚道使民赋（民得终佚，劳

固无怨)。今《二程文集》卷五有程颢所撰“南庙试”，此题赋文一篇；又《宋文鉴》卷十一收林希同题赋一篇。按林希、程颢与苏轼同为嘉祐二年礼部进士。林、程所试赋题应与苏轼一样，可惜苏轼赋文没有传于后世，甚至可能亦未见流传于当年。《石林燕语》卷八：“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可见这篇未入其他考官法眼的赋文，不能给苏轼带来更好的声誉，故既未得高分，也不入选《东坡集》。

(三) 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宋史·苏轼传》的记载雷同。宋人笔记对此有大量记述，尤其是文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处，苏轼后来当面向欧阳修等供认是“想当然耳”，由此引发欧阳修出言谨慎的鼓励性评价，更为后代学者津津乐道。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今见于孔凡礼整理之《苏轼文集》卷二，该文最早见于《东坡集》卷二十一，应为苏轼自鸣得意之作。(苏辙同题论文收在《栾城应诏集》卷十一，亦佳作也。)

(四) 策五道。旨在考量举子对时局大政的见解与对策。经孔凡礼考定，《苏轼文集》卷七《休兵久矣而国益困》即为此番考试“策五道”之一，见《苏轼年谱》卷三“嘉祐二年”纪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页)。另四篇策文，我以为即《苏轼文集》卷七“杂策”所载《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河防、外交诸多方面。至于苏轼策五道之考绩如何，则不得而知。

(五) 帖《论语》十帖。旨在考察举子对《论语》经典的熟悉与理解程度。考的方法类似于今之“填空白”试题。苏轼此项成绩考核亦不得而知，盖文献不足徵也。

(六) 对《春秋》墨义十条。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宋史·苏轼传》记述文字同《墓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南省讲三传》十事，郎晔题注：“仁宗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修考试礼部，既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即此十事。”这十道问答题，今见孔凡礼整理《苏轼文集》卷六《三传义》(南省说书十道)。

此外，苏轼还参加了殿试，即仁宗皇帝亲临殿廷主持的策试。殿试后进士分五甲，苏轼殿试中乙科(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综上所述，嘉祐二年苏轼应礼部试，《春秋》对义居第一，“论”文“寘第二”而实应第一，诗、赋、策、帖的名次不晓。总成绩如何？《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引李复圭《纪闻》列举是科登第者十六人姓名，章衡居首位，苏轼第六。但这未必是最终的总排名。在是科录取的数百名进士中，“状元”无疑是章衡，至于明清以来俗称的“榜眼”是否为苏轼，似仍待考。宋代科举制度太复杂了，“读懂”也难。因此，追述苏轼参加此次考试的过程与名次时，最好遵从苏辙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宋史·苏轼传》的记述，不宜简言之为“进士第二名”。

三、《美术史》：“1079年，苏轼六十二岁，调任湖州太守。”“《谢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结果惹了大祸，贬到黄州。”

《苏轼年谱》载，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罢徐州任，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上《谢表》。”

按干支纪年，1079年苏轼虚龄四十四岁，计实足年龄，则苏轼仅有四十二岁。真难以想出“六十二岁”是何种计龄法得出的数字，故尔甚觉荒谬。

《谢表》中那两句话，自命清高，不合时宜，也暗含嘲讽，但还不足以陷苏轼于牢狱之灾。事实是，在“乌台诗案”中，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强加给苏轼的罪名是“包藏祸心”，“讪谤朝政”。在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持不同政见，并赋诗撰文唱反调，让政敌下不来台，也令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反感气恼，终至罹祸。苏轼是新旧党争牺牲品，岂

止是《谢表》惹的祸。

四、《美术史》：“苏轼在黄州是生活很困难，于是有人送给他城东一块几十亩的坡地。”

据《宋史·职官志》当时官吏均有职田，即按品级分给地方官的公田，虽不得买卖，离职即需退还，但允许出租，收取地租作为俸禄外的重要补充，犹如岗位津贴。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却不得签书公事，实际身份是“靠边站”，被监管的罪臣，因此得不到职田。坡地虽荒芜，仍属公田，任何人都无权也不敢慷公家之慨，将公田转赠给苏轼。事实诚如苏轼《东坡八首·叙》所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即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施注：“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苏轼诗集》1079页）这里交代得很清楚，“坡地”是友人马正卿（梦得）协助苏轼向郡中申请所得，并非“有人送给他”。若是私人赠送的地产，则苏轼有权出租或转卖。唯其只申请得到经营垦荒权的公田，只能自力更生躬耕其中，为此苏轼亦备尝艰辛。

《东坡八首》其一：“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其八：“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大约苏轼原本设想仿效东晋陶渊明，作个自食其力的田园诗人。其实二者的身份地位环境结局有极大差异，不可同日而语。黄州生活困难是实情，“有人送田”则子虚乌有。马梦得本人是穷士投靠苏东坡的，哪有资本送田给东坡？

五、《美术史》：“（苏轼）最后被贬至海南，后来终于恩准回京。”按“贬至海南”是真有其事，“恩准回京”是胡诌。

《宋史·徽宗本纪》：“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正是借助于这次大赦，元符三年五月中诰命下，苏轼量移廉州。七月四日到任。八月中诰命下，授汝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十一月初一日，授苏轼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随后苏轼四处漂泊，居无定

所。最后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病逝于常州。其北归后的经历，《苏轼年谱》卷三十九至卷四十有清晰记述，可确信对苏轼遇赦后的屡变未定的安置，没有一次明言“恩准回京”，最终的诰令仍是“外军州任便居住”，唯独不许回朝。其实“回京”只是友人的企盼和他人的奢望，朱象求、黄庭坚等蜀党旧将确曾制造舆论要苏轼拜相，前朝皇帝也曾明言苏轼、苏辙兄弟有宰相之材，尤其在苏轼病危之际，连政敌章惇之子章援也在恭维苏轼乃：“圣时之耆龟”，德高望重，说什么“士大夫日夜望尚书（指苏轼，曾任礼部尚书）进陪国论”（见《云麓漫钞》卷九）。但宋徽宗拒绝起用苏轼，还要处罚为苏轼复出摇旗呐喊的大臣。他说：“若更用苏轼、辙为相，则神宗法度无可言者。”（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卷十七、建中靖国元年六月甲辰纪事）因此苏轼至死不得回京，最后安排个闲差以领取养老金而已。苏轼在常州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途，没能实现回京的梦想。

六、《美术史》评价苏轼文人画理论云：“苏轼说：‘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按此处引述“苏轼说”，出自宋·邓椿所撰《画继》卷四，实为断章取义。又查苏轼言论的原始出处，见诸《东坡集》卷二十三，今收入孔凡礼整理本《苏轼文集》卷七十《书朱象先画后》（第2221页），原文是：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

用《东坡集》原文核校《美术史》引文，不难发现，《美术史》省略“松陵人朱象先”的主语，遂令苏轼针对性十分明确、单指朱象先画所作评语“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蜕变为可适用于一切画家作品的泛论。这是偷换概念，有悖于东坡初衷。《美术史》依从《画继》漏引“曰”字，则更令朱象先自鸣得意的独白“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蜕变为苏轼高自标榜的画论，这也与苏轼的一贯主张及创作实践相抵牾。众所周知，苏轼本人并非“能文而不求举”，只求“达吾心”而已，他继承了韩愈、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传统，是主张“文以载道”的。《艺术史》引“苏轼说”的最后两

句话：“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根本不是“苏轼说”过的话，而是《画继》作者邓椿引述苏轼评朱象先上述一段话后所发出的感慨之辞。如此张冠李戴，归入苏轼文人画论中，实属误导。《美术史》据此总结苏轼主张“文人画的根本特征在自娱”，不能服人。考苏轼《书朱象先画后》的创作缘起，是有感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认为他既不如书法家王子敬之高，也不如琴师阮千里之达。慨叹他若能如朱象先“无求于世”，也不至于自取画师之辱。全文并无主张文人画“自娱”之意。

七、《美术史》论述文人画“得之象外”特征云：“苏轼有一次论吴道子与王维二人壁画优劣时说：‘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按这里引述的苏轼诗句，见诸《东坡集》卷一，今收入孔凡礼整理的《苏轼诗集》卷三《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第109页），原诗云：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经核校可知，《美术史》将“妙绝”改为“绝妙”，又将“笼樊”改为“樊笼”。尽管“妙绝”和“绝妙”都表示精妙绝伦，“笼樊”与“樊笼”也都是关鸟的笼子，词意似无大碍，但你若将两个关键词改变了字序，那就不是东坡诗了。况且原诗“文”“元”韵通押（这是古风押韵所允许的），若将词语改变，字序颠倒，“樊笼”便失韵矣，岂不厚诬坡公！诸如此类随意改变原诗字词的引证，在当今学术著作中屡见不鲜，实在是不可取，有违科学性与严肃性。

八、《美术史》：“文人画好在哪里？……用苏轼的话说：‘妙在笔墨之外’。”

无论《东坡集》，还是《苏轼文集》，乃至古今各本东坡著作中，均未发现苏轼有过“妙在笔墨之外”的经典画论。仅在孔凡礼整理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可以读到似是而非的如下论述：“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这篇文章及上引这段话，后被清人王琦收在《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附录“丛说”中时，“笔画”改作“笔墨”，显系误改。《美术史》若从王琦

误改字句而不从原著，则是放弃第一手资料而转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这也是当今学者之通病，不足为训，然亦不足为奇。此处另有令人称奇者，苏轼明言“予尝论书”，而非论“画”；言钟繇、王羲之两位古代书法大师的作品，具有“萧散简远”的特点，其美妙处在“笔画之外”。很明显苏轼的“妙在笔画之外”，与文人画理论及画风无关，不能移花接木，借喻画论。

九、《美术史》：“苏轼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

按苏轼此段文字，《东坡集》未收。《东坡外集》卷五十收录，今见于孔凡礼整理之《苏轼文集》卷七十《又跋汉杰画山二首》（其二）（第2216页）但《美术史》似转引自《画继》卷三，仍用第二手资料。又据《东坡外集》“几尺”下脱“许”字，则《美术史》引文不准。

十、《美术史》：“苏轼又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这里引述的苏轼诗句，出自《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但各种版本的东坡文集、诗集均是“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只有《画继》卷四，《诗人玉屑》卷五改“赋诗”为“作诗”。《美术史》照例不用正规的苏轼文集、诗集，而是转引自《画继》，因而再出现误字。按“赋诗”指朗诵或吟咏诗歌，其引申义也指创作，但本义比“作”丰富，内含更多，将“赋”改为“作”，不合东坡诗旨。

《美术史》介绍东坡生平和文人画论，还有其他一些失误，不逐一列举。只是如此多的失误，能否真能引导大家“读懂中国美术史”，就颇值得怀疑了。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法则是实事求是。生平事迹搞不准，诗文议论屡出错，必然失去可信度，离所谓“戏说”与“胡诌”越来越近了。对此，我感到悲哀。但我依然呼吁：“真苏轼”，不要离去！真学者与你同在。

（刘尚荣，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一部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

苏轼对“穷而后工说”的承继与拓展

庆振轩

内容提要 欧苏相继主盟文坛，东坡对于欧公“诗穷后工”之论，有承继，更有拓展。对“非诗之能穷人”之言，东坡力主“诗能穷人”之说；且有“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穷达”透脱之论。于“穷而后工说”则多所拓展。东坡于欧公沾溉既多，知之甚深，其独到见解，启悟后人。

关键词 穷而后工 承继 拓展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穷而后工说”，远承屈原、司马迁“发愤抒情”、“发愤著书”之说，近承韩愈“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论，在我国古代文学史、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学者或奉为不易之论，或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考察欧阳修“穷而后工说”传承流布的过程，苏轼的观点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在此辨析其论，以就教于同好。

—

自欧公提出“穷而后工说”，自宋以来将之奉之为不易之论者代不乏人。南宋李纲《五峰居士文集序》①即认为：

欧阳文忠公有言：“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信哉！士达则寓意于功名，穷则潜心于文翰，故诗必待穷而后工者，其用志专，其造理深，其历世故险阻，艰难无不备尝故也。

清代陆蓥批驳了葛胜仲、陈师道“诗能达人”说，认为“士之穷达有命，诗之精深微妙，惟穷者而后工耳。”②明代孙琮甚至认为“若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言。”③

也有论者引述相关作家创作事例为欧公之论作注：

欧阳永叔序梅氏集，谓诗“多出于古穷人之辞”，凡数十言，以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按司马迁《报任安书》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何孟春《余冬诗话》④

然而翻检现存有关资料，我们发现自宋至清，人们对“穷而后工说”质疑与批评者也代不乏人。范仲淹作为欧阳修政治改革文学改革的挚友，其出身较之欧阳修更为贫寒，而对于贫困于人生的影响与欧公认识不同。庆历二年，范仲淹在奏议中上言：

怀才抱艺之人，一落散地，终身不齿。兽穷则变，人穷则诈，古人之所慎也。⑤

另据魏泰《东轩笔录》⑥记载，范仲淹曾针对孙复的遭遇感叹“贫之为累亦大矣！”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游，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范仲淹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兼容并包风格多样，应该全面反映风俗人情，有益于道德人心。他在《唐

异诗序》⑦中说：

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峰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覩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

诗家者流，厥情非一，范仲淹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与之同时，他尖锐批评当时诗坛为文造情无病呻吟的习气。其说曰：

五代以还，斯文大坏，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雅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常途而悲，非常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则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矣。⑧

尽管范仲淹没有像后来张耒批评秦观那样明确指出诸多“悲愁凄婉，郁塞无聊者之言”是囿于“世之为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⑨但其与欧阳修同时而持论不同，值得关注。在学界，不断有学者指出，“穷而后工”之“穷”，非指生活之穷困，乃指仕途穷通之穷。但不容讳言，仕途之穷通与生活之富贵、贫穷关系密切。所以，范仲淹的观点值得关注。

二

欧公之后，对“非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人们从多方面加以诠释和探讨，东坡的相关议论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检索相关资料，将诸家之说与东坡之论加以对照，能加深我们对东坡诗论的深入了解。

苏轼出于欧门，对于一生钦仰的恩师著名的《梅圣俞诗集序》以及梅尧臣本人的诗歌创作人生遭际极为熟悉，并在诗文中表示自己“非诗能穷人”、“穷而后工”的理念来自欧阳公：

轩轩青田鹤，郁郁在樊笼。既为物所縻，

遂与吾辈同。今来始谢去，万事一笑空。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风入齿牙，出语如风松。霜髭茁病骨，饥坐听午钟。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僧惠勤初罢僧职》⑩

且在诗中喻示“诗穷后工”。在《次韵和王巩》诗中，他以李白贬放、杜甫躬耕来比况激励经历了贬谪生涯的王巩：

谪仙窜夜郎，子美耕东屯。造物岂不惜，要令工语言。……天欲成就之，使触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归来千首诗，倾泻五石樽。⑪

此外，在苏轼诗作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这样的诗句：“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⑫“有客独苦吟，清夜默自课。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何当暴雪霜，庶以蹑郊、贺。”⑬“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吾言岂须多，冷暖子自知。”⑭“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⑮

喜欢苏轼的读者还发现“秀句出寒饿”，一见于苏诗《病中大雪》，又见于《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⑯。而不同意“诗穷后工”之论的，则批评说：“东坡云‘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此言误人不少。”并且说，“退之‘愁苦之音易好’，永叔‘穷而后工’，皆不可信。”⑰而实际上，只要细细翻检东坡诗论，就会发现苏轼对于“非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曾给予特别关注，并有自己独到的思考。

苏轼从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诗史的考察，态度鲜明地指出“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⑱并且在与友人书信中坦陈诗文贾祸给予自己心灵和创作上的影响。他多次言及“乌台诗案”之后被贬黄州之后的处境与心态：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颂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自得罪后，不敢做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

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答李端叔书》⑩

某所不敢作者，非独铭志而已。至于诗赋赞咏之类，但涉文字者，举不敢下笔也。忧患之余，畏怯弥甚，必望有以亮之。——《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十⑪

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农夫也。——《王定国诗集叙》⑫

自得罪后，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

——《答陈师仲主簿书》⑬

甚至友朋离别，亦抄写古人之诗寄意。其说云：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书苏李诗后》⑭

晚年被贬惠州，苏轼仍有类似的表述：

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瘖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也……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剗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答刘沔都曹书》⑮

此诗幸勿示人，人不知吾侪游戏三昧，或以为诟病也。——《奉和程正辅表兄一字韵诗跋》⑯

即使在元祐时期，对于以文罪人、以诗罪人、以言罪人影响下的浇薄世风，东坡依然言之惊心“感叹亲友之间动成陷阱”⑰：

某启。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颖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剗心钳口矣。此身于我稍切，须是安处，千万相信。日与乐全翁游，当熟讲此理也。某甚欲得南都，而侄女子在子开家，亦有书来，云子开欲之，故不请。想识此意。——《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二十六）⑲

也正是在对繁难人生的体验探究中，苏轼对

“诗能穷人”颇多感慨：

贵、贱、寿、夭，天也。贤者必贵，仁者必寿，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适与天相值实难。譬如匠庆之山而得成鐸，岂可常也哉！因其适相值，而责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难，而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困，得乎？⑲

文人固穷，诗人命运多舛，因其“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也。

在欧阳修之后，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诗是否能穷人进行探讨，陈师道即有“诗能达人”之论。苏轼阅古览今，有十分精到的见解。他不断地考问诗人何以穷困的原委：

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书渊明乞食诗后》⑳

而对于人们何以会纷纭其说，或谓“非诗能穷人”，或言“诗能穷人”，或倡“诗能达人”，苏轼的见解至为透彻：

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今足下独不信，建言诗不能穷人，为之益力。其诗日已工，其穷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龟手之药，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达乎？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谬，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江淮间人好食河豚，每与人争河豚本不杀人。尝戏之：性命自子有，美则食之，何与我事。——《答陈师仲主簿书》⑳

苏轼曾自言平生乐事无过于作文为诗：“某平生无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⑳但为时为事有为而作的诗文，却动辄得咎，屡受攻讦，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但直面人生坎坷，屡经变故的苏轼依然一怀浩然之气：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苦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心必不尔。

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与李公择十七首》之十一⑩

正由于其无意于“畏穷”，能够直面人生，笑对人生，所以其对于“诗能穷人”“诗能达人”的认识全面而深刻。由是言之，周裕锴先生在《宋代诗学通论》中的推论对我们颇多启示，他认为：“因为欧阳修强调‘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我怀疑就是针对同时代的宋祁而发的。宋祁认为，诗蕴藏于天地之间，有才之人可以获得，‘然造物者吝之，若取之无限，则辄穷蹶其命，而佛戾所为’。

（《宋景文集拾遗》卷一五《淮海丛编集序》）⑪但我们依据苏轼“云能穷人固缪，云不能穷人者，亦不免有意于畏穷也”推想，欧公非有意于畏穷者，但其似有所讳而言。何以故？因欧公一生仕宦，正直立朝，直言敢谏，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贬夷陵，再贬滁州，其《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名文皆为诱因，甚至小人无端诬谤，也从其词中寻章摘句。所以以欧公之阅历，焉能不知诗能罪人、文能罪人？盖因《梅圣俞诗集序》乃为友人而作，且梅之特点集中于诗穷而后工。欧公之文，简而有法，于此可见。而欧公所讳言处，苏轼直谓“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并认为诗文创作，意所乐则为之，何患乎穷达；“云能穷人固缪，云不能穷人者，亦不免有意于畏穷也”，何等明达。读苏轼此论，使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三

苏轼对于“穷而后工”也有个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艺术创作之工，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他在早期的《南行前集叙》中倡言诗文创作“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而工”之说：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而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辄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⑫

在创作上，诗画一理，书画一理。苏轼论书法，认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⑬其对尚意书法的阐

述与其诗文创作“乃不能不为之而工”的理论是一致的。苏轼《小篆般若心经赞》⑭写道：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间无篆亦无隶。
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
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

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

心忘其手，手忘其笔，兴到挥毫，任笔自为，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

学富后工是苏轼诗文创作论的另一观点。刘勰《文心雕龙》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⑮继承传统之论，结合自己的观察体验，他常鼓励后学勤奋向学，积学储宝，博观约取。其《与张嘉父》⑯书中说：

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他在《题文潞公诗》⑰又说：

轼尝得闻潞公之语矣，其雄才远度，固非小子所能窥测，至于学问之富，自汉以来，出入驰骋，略无遗者，下迨曲技小数，靡不究悉，虽笃学专门之师，莫能与之较，然世不以此称公，岂勋德所掩覆故耶？今观其幼时诗，精审研密，句句皆有所考，盖其积之也久矣。

宋代由于“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科举制的发展与渐趋完善，读书人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上下对于教育格外重视，再加上印刷术的进步，宋代士人对于硕学鸿儒的崇尚成为一代风气，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至以学问为词，成为文学创作发展的趋向。学富后工，才富后工是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

然而对于诗文创作而言，仅有创作的欲望，有满腹的才学还是不够的。苏轼以自己的学习经验教诲后学，诗歌创作还需勤习而后工。其《答陈传道五首》⑲之一中说：

知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也。圣俞昔尝如此。某近绝不作诗，盖有以，非面莫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梅尧臣“昔尝如此”，也是勤习而后工。令我们极感兴趣的是，苏轼《记欧阳公论文》⑳告诉后学，勤习而工也是欧阳修的观点：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公，尝乘间以文字问

之。曰：“无他术，惟勤读书而多为文，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如果再联系欧公创作之“三多”、“三上”之言，则苏公以欧、梅二公和自己之“尝试者告人”，其言尤其有味而耐思。

苏轼还在“穷而后工”、“不能不为之而工”和才高学富勤习后工的基础上，倡言诗文创作志昌而后工、守道守正后工。他在诗中写道：

昌身如饱腹，饱尽还复饥。昌诗如膏面，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气，郁郁老不衰。虽云老不衰，劫坏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气自随。养之塞天地，孟轲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儿。何如鲁连子，谈笑却秦师。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吾言岂须多，冷暖子自知。^⑩

苏轼可能与王晋卿多次讨论身处忧患，如何昌志守正的问题，所以他在《题王晋卿诗后》又写道：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⑪

他更在《送人序》中主张“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见闻，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⑫在复杂的现实人生中，如何直面人生坎坷忧患，如何历险如夷超越艰难困苦，正气完志，完善人格修养，笑对尘寰，超然乐处，是苏轼一生都在思考追求的精神境界。

只是对苏轼相关诗文论大致的梳理，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轼认为诗文创作需要多方面的要素，需要生活的历练、学识的积累、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创作心态。其得之于欧公的“穷者诗乃工”仅仅是其中一端而已。在苏轼相关论述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影响，也可看到欧阳修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苏轼独立的思考，作为一代文坛巨擘，以其所尝试者示人，使人启悟良多。尤为让人感佩其贯通古今，不为苟同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力量。苏轼在入仕之初曾经宣示：

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上曾丞相书》^⑬

东坡对于欧公“穷而后工”说的承继与批评正是其人格精神的一种体现。

四

东坡出自欧门，欧、苏相承，二人均倡导诗文创作的多样化风格。所以，同出苏门，陈师道有“诗能达人”之说，而张耒则在《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中直言批评秦观诗文创作存在的情实不一、无病呻吟的弊病。认为秦观“内有事亲之喜，外有朋友之乐，冬裘而夏缓，甘食而清饮”，其为诗文则“大抵悲愁凄婉，郁塞无聊之言”，其原因在于受“诗穷后工”说的影响，“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词。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词，殆出此也。”^⑭而苏轼则从多方面论述了诗文创作的要素。

由于欧、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的相关观点在后世引起高度重视，在“诗能穷人”抑或“诗能达人”的争论中，也有论者认为诗能穷人，亦能达人。祝穆《事文类聚》即列出“因诗致穷”、“诗能达人”二类。至王世贞、沈长卿则衍“诗能穷人”说为“文章九命说”“文章十命说”；清代王晫亦衍“诗能达人”论为正面的“文章九命说”。诗能穷人亦能达人，是历史之真实存在。相关争议，吴承学《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古代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一文已经有极为深入的讨论。^⑮问题在于，诗人该如何看待这分生活的“赐予”。

历览欧、苏之后人们对于“诗能穷人”与“诗穷后工”说的讨论，更能见出苏轼见解的独到全面与深刻。宋代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中曾说：“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欧阳公。如《吉州学记》之类，和平而工者也。如《丰乐亭记》之类，感慨而好者也。然《丰乐亭记》意虽感慨，辞犹和平。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纯乎感慨矣。”^⑯吴子良所说欧公纯乎感慨的苏子美集序之类，应该包括《梅圣俞诗集序》，

^④ 欧阳修在《江邻几文集序》中说：

“自尹师鲁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间，相
继而歿，为之铭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铭，
与虽铭而非交且旧者，皆不与焉。呜呼，何其
多也！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
此，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又可悲夫！而其
间又有不幸罹忧患，触网罗，至困厄流离以死，
与夫仕宦连蹇，志不获伸而歿，独其文章尚见
于世者，则又可哀也欤！然则虽其残篇断稿，
犹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故余于圣
俞、子美之歿，既已铭其圹，又类集其文而序
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欧公说得很明白，其所感慨于诸友人者，感叹其“仕宦连蹇，志不获伸而歿，独其文章尚见于世”。亦即黄震所说《梅圣俞诗集序》“惜圣俞生干盛世，

‘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⑩；林云铭《古文析义》所说“痛惜其以穷而老”^⑪，非幸其穷也。誉其所长而惜其所遇，乃欧公之用意处。清代孙琮曾甚为直接地指出：“欧公作希文神道碑，其事业多不胜记，故止记其大者；作圣俞墓志铭，其事业少无可记，故并记其纤悉。”^⑫

由是而论，后人认为欧公“穷而后工”乃不易之论者，或认为欧公此论未详考诗史，为一偏之论者，多未究悉欧公之用心。东坡继欧公之后主盟文坛，其受欧公沾溉既深，对欧公知之也深。所以对欧公之诗学思想，特别是对其“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之说，既有承继，更有拓展。纵观欧公诗穷后工说的影响，清代王之绩极为贊成东坡之论：

予喜玉局云：“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穷达？云能穷人者固谬，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⁶³

至于“词达而工”、“学富而工”、“才富而工”，以及“穷者工，达者亦工”、“穷于遇，未穷于道”诸说，多未出苏公论诗之局囿，使人更感苏轼作为一代文坛巨擘，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上下古今，纵横捭阖，以其所思考、所经历、所尝试者示人，使人于崇拜之余，多有启悟。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95 版, 第 192 页、第 1225 页、第 708 页、第
528 页、第 1172 页、第 385 页、第 304 页、第 409 页、第
819 页、第 717 页。

^{⑤⑦⑧}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485页、第185页、第186页。

^⑥ 魏泰著、穆公校点《东轩笔录》卷一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第2777页。

^⑨ 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版，第752页《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

^{①②③④⑤}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版，第 576 页、第 1441 页、第 1750 页、第 158 页、第 1804 页、第 1871 页。

^⑩ 张道《苏亭诗话·考摘类》，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下编），中华书局1994版，第1994页。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版,第1428页、第1432页、第1430页、第318页、第1428页、第2089页、第1429页、第1513页、第320页、第2112页、第1428页、第1500页、第323页、第2183页、第618页、第1564页、第2129页、第1575页、第2055页、第2137页、第325页、第1379页。

^② 毛九苞编《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九，齐鲁书社1997版，第833页。

^⑩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版，第993页。

^⑧ 何蓬《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版，第84页。
^⑨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122页。

^⑤ 刘勰著，王运熙、周峰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245页。

^②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版，第1804页《韩退之〈孟郊墓铭〉》云：以昌其诗。举此问王定国，当昌其身耶，抑以昌其诗耶？来诗下语未契，作此答之。

^⑩ 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版，第752页。

^① 吴承学《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古代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4期。
^② 王之绩《评注才子古文》卷一二，汇编清刻本，第766页。

(庆振轩,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文学暨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苏轼诗歌的哲理思辨倾向

马德富

内容提要 以哲理思辨入诗是苏轼诗歌颇具个性的艺术特征。苏诗的哲理思辨涉及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苏诗的哲理趋归显示了苏诗意蕴深化的艺术倾向，苏诗的哲理思辨突破唐诗情景交融的艺术范式，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天地。

关键词 苏诗 哲理 思辨

—

诗与哲学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西人有云：“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①这一说法对诗人来说也许过于苛刻，但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当其面对自然、社会、人生，常常具有哲理的感悟，则是没有疑问的。这方面，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以哲理思辨入诗不始于苏轼，即使就宋代而言，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诗作，但苏轼这方面作品之多，哲理意味之浓厚，思辨色彩之强烈，以及艺术表现之杰出，却是在他之前或同时的人少有及得上的。

宋代哲学十分繁荣，其思辨的深度和广度不亚于魏晋，是继先秦诸子之后又一个哲学的黄金时期。庄禅的风行，理学的兴盛，极大地拓展了宋人的思维空间，引发他们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天理、物理、人性、心性等问题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话题。哲学的繁荣必影响及于文学，因之宋诗、宋文等，较之过去都更多地容纳进哲理内容，并程度不同地浸染了思辨的色彩。而苏轼正是这一艺术潮流的代表。

苏轼作为与关学、洛学鼎足而三的蜀学巨子，又被列为禅宗南岳临济宗黄龙派法嗣，绝非偶然，他既通儒学，对庄禅之道又有精深研究，其在哲学上的造诣为当时社会所公认。黄

庭坚说：“吾闻斯人，深入理窟。”^②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③都对他哲学方面的造诣深表钦佩。既然如此，他卷入当时的艺术潮流，在诗歌创作中有意无意地趋向哲理，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苏轼是智者、学者加才子型的诗人，这样的主观条件使他具有思辨的癖好和哲理的兴趣。他的目光自由伸缩于浩淼无穷的宇宙和万象森列的自然人生，常常在心的感发的同时步入哲理的思考。在他二十多岁自荆州赴京时有《夜行观星》一诗，诗中写道：“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诗以动态的笔触写出了星空的灿烂庄肃。诗人仰望夜空，对世俗强为星宿立名提出了疑问：“南箕与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岂有之，无乃遂自谓。”这是理性对想像的裁定，表现了青年诗人一种清醒独立的宇宙意识。有趣的是，在他晚年由海南北返时，又仰望星空，作《和黄秀才鉴空阁》诗，其中写道：“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境。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世俗传说月中的阴影是桂树、玉兔、虾蟆，

苏轼认为是错的应当屏弃。他认为月亮像挂在天上的一面镜子，其中的阴影是映照地上山河的影子。苏轼的解释当然也不正确，不过倒不失为一种富有诗意的假说。其实解释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看出诗人对宇宙的思考，他一直到老都保持着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

苏轼常在对宇宙现象的观察中进行哲理沉思：“并生天地宇，同阅古今宙。视下则有高，无前孰为后。”（《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在浩渺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之流中，一切都是相对的，高下、前后、

巨细等，均互为存在的条件。这里诗人无疑感受到了一种空间和时间的辩证意识。使他迷惑不解的是，茫茫环宇，其存在及其运动，究竟是谁在主宰：“天地有常运，日月无闲时。孰居无事中，作止推行之。”（《和陶形赠影》）他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天地和日月的运动是谁在推动，谁在控制？这无疑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苏轼似乎已经不相信是上帝之类神的力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无解的，是永恒的不可知，但问题的提出却反映了他对宇宙思考的深度。

除了对宇宙的思考外，诗人还经常在对山水景物的观照中进行哲理思考。《题西林壁》就是非常典型的作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在对庐山的观照中得到哲理的启示：一个人所处地位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当一个人囿于局部，目光受限，便不能认识全貌。诗人似乎感悟到了人类认识的某种难以避免的局限。这首诗常常作为苏轼哲理名篇为人们提及。其实在此诗之前苏轼还作有一首诗，也是对庐山的哲理思考：“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初入庐山三首》之一）意思是如果和青山没有交道，青山就与人不亲近，人也就不能认识它。要认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在山中住下去，和它做朋友。同样谈如何认识庐山面目的问题，《题西林壁》的答案是必须跳出山外，《初入庐山》的答案是必须深入山中，两个答案正好相反，但都有道理。

苏轼还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究竟是来自琴还是来自指？也就是说美究竟存在于客体还是存在于主体？显然这已经涉及对美的本体的思索。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只这一首诗，前面提到的《和黄秀才鉴空阁》“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境”，也涉及同样的问题。此外还有《和段屯田荆林馆》：“南山有佳色，无人空自奇。”《和何长官六言》：“青山自是绝色，无人谁与为容？”山林之美，如果没有人的欣赏参与，其美便不为人所知。这些诗和《琴诗》一样，都涉及美在客观还是主观的问题。看来苏轼对

这个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一直萦绕在心。这个问题是美学中一个重要问题，直到今天专家们还争论不休。从苏轼的作品可知，他对这个问题大概持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立场，应该说是很见地的。

苏轼还有作品对一些哲理命题进行思辨，如《秀州僧本莹静照堂》，就对动和静进行思辨：“鸟因不忘飞，马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君看厌事人，无事乃更悲。”苏轼认为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静，就像鸟不忘飞，马常念驰一样，动是人和事物的本性。一个厌倦事务的人，如果让他完全不做事，心情会更悲哀。这里对动和静的思辨颇富哲理意味。与对静的思辨差不多，苏轼还在《徐大正闲轩》中对“闲”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徐大正是黄州知州徐君猷之弟，因这层关系从苏轼游。他建造了“闲轩”，请苏轼题诗。苏轼写道：“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闲见闲地，已觉非闲侶。……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颇讶徐孝廉，得闲能几许。”苏轼认为，冰中的蚕不知道寒冷，火中的鼠不知道暑热。与此相同，真正处于闲中的人并不知道闲，就像眼睛看不见眼睛自身一样。当你知道了闲并标榜闲，就已经不闲。苏轼这番议论具有比较深刻的辩证意识。

二

苏轼诗歌中的哲理思辨更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人生命运的思考。由于苏轼自身的一些原因，以及他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他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对人生命运有更复杂而深刻的体验。生死、寿夭、穷达、荣辱、得失、祸福等问题的思考，对苏轼而言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由唐而宋，封建社会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升平，但内里政治经济的种种矛盾已日趋复杂而尖锐。官场中派系争斗激烈，迁官和谪降如儿戏般频繁而不可预料。一个人的命运难以把握，因此一种世事无常、人生空幻的悲凉之雾便迅速弥散。而对于苏轼这样具有一颗灵慧之心的诗人来说，其感受就更为深巨了。早在他舟行适楚，“睹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④，就一再流露出这种苍凉的悲

慨：“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留题仙都观》）“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望夫台》）江水长流不断，而自古及今，船去船来，行客换了一批又一批，生命如秋草、浮萍般渺小脆弱。这是历史沧桑的咏叹和生命短暂的悲歌。写这些诗句的时候苏轼才二十多岁，两年前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前途正不可限量，这时表现出这样深沉的人生感慨不能不令人吃惊。不能说这种感慨是应景文字，或者归为一般墨客骚人的无病呻吟，他的悲慨是确实可信的，从大的人文背景来看，这是封建社会一种具有历史承传的基于忧患意识的生命感叹。

此后由于仕途的坎坷，人生命运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苏轼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验。他写道：“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迁居临皋亭》）苏轼说他在天地间，如蚁行磨上，蚁欲右行，而磨左旋，磨疾蚁迟，不得不随磨左转。这几句形象写出个体生命的悲剧。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的叹息在苏轼诗中频繁响起：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
——《过云龙山张天骥》
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
——《罢徐州，往南京》
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
——《送芝上人游庐山》
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谢运使仲适座上……》
觉来身世都是梦，坐久枕痕犹著面。
——《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天竺寺》
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寄吕穆仲寺丞》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其二）

所谓“如寄”是说人生短促，犹如寄居世间。“如梦”则指人生的虚幻，也有短暂的意思。人生如寄、如梦这类诗句在苏诗中有很多，数量大大超过其他诗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如寄、如梦抒发的自然是人生短暂虚幻的悲感，但苏轼并没有完全陷入这种悲感而不能自拔，就在他咏叹如寄、如梦的同时，有时又由此导向一种解脱。如《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诗写于元丰三年正月，时苏轼出狱赴黄州贬所。这里说人生如暂寓人世，但正因为暂寓人世，也就不必选择去哪里了，只要有鱼和稻就很满足了。这里的“吾生如寄”，就不完全导向悲观，而导向一种随遇而安的知足。又如元祐中所作《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既然人生短暂，那么无论祸还是福，都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两忘。这里的人生如寄就导向一种解脱。

苏轼对于世间功名富贵是否定和鄙弃的，早在南行诗中就写道：“富贵荣华岂足多，至今惟有冢嵯峨。”（《竹枝歌》）这是以人生的短暂否定富贵荣华的世俗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还从宇宙之大来映衬人世功名富贵的渺小：“天形倚一笠，地水转两轮。五伯之所运，毫端栖一尘。功名半幅纸，儿女浪苦辛。”（《赠月长老》）

“君看汉唐主，宫殿悲《麦秀》。而况彼区区，何异一醉富。”（《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在宏大的宇宙中，帝王霸主苦心经营的雄图霸业，以及世人奔竞追逐的功名利禄，只不过如毫端的微尘而已。可以看出，苏轼从宇宙和人生的巨大反差中，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哲理启示。这种反差不完全导向人类卑微的叹息，而导向对庸俗现实、对世人拼命追逐功名利禄的鄙薄和批判。而诗人也在这种反差中获得一种对痛苦的化解。

通过人生哲理思辨来化解心中的块垒，这在《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诗中有很典型的表现。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时苏轼贬谪海南。诗写他登上海南岛，从琼州去儋州贬地，途中“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这十句诗具体描述了苏轼当时心情变化的过程。诗人登高回望中原，一片水天茫茫。他想到此生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心中产生极大的悲伤。但当他想起“谈天翁”邹衍的话，远望

邹衍所说的九州之外宏大无比的“大瀛海”，忽然想到芸芸众生不过如太仓的米粒，比起宇宙之大，一粒米又算得了什么，谁弱谁强，谁胜谁败，这些都太渺小了，毫无意义。既然如此，自己被谪荒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为此悲伤。于是“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苏轼就凭着这种哲理思辨使自己从巨大的悲伤中解脱出来，胸中块垒瞬间消散。

一方面是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深悲，一方面是随缘自适、扬弃悲哀的旷达，两者都指向哲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人生空幻体悟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苏诗哲理思辨所达到的唯一深度，更重要的是扫灭情累，扬弃悲苦，获得一种对人生困境的超越，才把人生哲理的思辨引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三

上面对苏轼哲理思辨的内容作了一些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苏诗的哲理思辨不仅是一种内涵，而还是一种艺术倾向，这种倾向就是指向哲理的趋近。就苏诗总体来看，纯粹进行哲理思辨的作品并不多，大量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叙述和山水风景的吟咏中自然产生的哲理升华。诗人的目光一般不愿停留于事物的表面，满足形而下的描述，而总是竭力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把握，常由感性描述进入理性思考，表现出一种对哲理的趋归。这种趋归显示了苏诗意蕴深化的艺术倾向。

苏轼不少作品的景物描写，常象喻或暗示了一种哲理。如《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之三，通过对园中草木的描写，表现一种哲理的体悟：葡萄、石榴、葵花、丛蓼、不论妍丑，均为春阳所遍照，显现生命的多样形态；它们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无论茂盛或飘零都由造物所主宰。此诗之三复将焦点从众多草木集中到柏树和蕡草上：“柏生何苦艰，似亦费天巧。天工巧有几，肯尽为汝耗。君看藜与藿，生意常草草。”柏树固然有更多的用处，但需更多的时日，蕡草等却春种秋刈，不需要什么照管，因此大小各有优缺点，各当其用。这里已经不是对草木的一般吟咏，而是一种颇富哲理的观照。所以纪昀评云：“纯乎正面说理，而不

入肤廓，以仍是诗人意境，非道学意境也。”^⑤又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时令已是冬天，荷尽菊残，但大自然仍显出勃勃生机。诗中的景物描写暗含了一种哲理。残菊傲霜象喻了傲视困境的人格精神，黄橙绿桔则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暗喻了一种向上的人生境界和乐观精神。

除了上述对哲理的象喻和暗示外，苏轼更多作品是在景物描写和叙事之后（或中间）进行的哲理思辨，显示一种由感性事物向哲理的趋近和升华。如作于海南的《独觉》一诗，前半叙述他在海南的生活，接着写一日午睡醒来的情形，最后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诗人回首往事，那些荣辱、得失、祸福，都不存在，都无意义，诗人已超然物外获得透彻之悟。又如《次韵钱穆父紫薇花二首》之一：“虚白堂前合抱花，秋风落日照横斜。阅人此地知多少，物化无涯生有涯。”诗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是触景生感，表达一种深沉的人生体验。紫薇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没有尽头，而人生是有限的，表达了一种生命短暂的悲哀。

在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描述中穿插理语，在叙事写景中加入议论，是苏轼相当多作品艺术表现的共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场合，诗人的体验和感悟的东西十分丰富，因而插入诗中的理语大幅膨胀，形成大段议论。这在《泗州僧伽塔》、《百步洪》、《登州海市》、《送参寥师》、《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等作品中都有典型的表现。由于苏轼才气大，阅历丰富，学识广博，这类诗大多写得气机流走，才气纵横，博辩无碍，潇洒自由。确如方东树所说：“子瞻‘胸中蓄得道理多，触手而发，左右逢源，皆有归宿，使人心目了然餍足，足以感触悟心意。’”^⑥

但这类作品也招致一些人的批评。张戒说：“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因而诗“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⑦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⑧

（下转第 47 页）

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

——咏梅诗的视角

陈才智

内容提要 本文从咏梅诗这一视角，指出苏轼对白居易的受容与超越，他将梅花置于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将梅格与人品有机融合，使梅之高格逸韵，成为东坡范式的形象写真，并进一步被升华为宋代文化淡雅精神的缩影。

关键词 白居易 苏轼 咏梅 受容与超越

影响与接受之间的因果，或显或暗，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既要看水的量多量少，也需要视土壤的情况而定。白香山之于苏东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白苏相提并论，由来已久。宋人王直方（1069～1109）、洪迈（1123～1202）皆有“东坡慕乐天”之论^①，周必大（1126～1204）有“（东坡）独敬爱乐天”之评^②。明代袁宗道（1560～1600）更以白苏名其斋。而追根溯源，肇启白苏并论者并非他人，正是苏轼自己。这从接受史的角度看，是主动接受的个案。本文拟从咏梅诗的视角，探讨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

梅花，内修外美，玉蕊香清，“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③，“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④《尚书》、《诗经》中早有梅的描述，但仅取其实而已。《离骚》遍撷香草，然独不及梅。“梅花见于五言诗，自晋时始也。……至梁陈而大盛。”^⑤谢朓、鲍照、何逊、萧纲、庾信、陆凯都有咏梅名作传世。有唐肇兴，赋咏未辍，但梅花的幽姿为牡丹的绚丽所掩。至北宋，林逋结庐西湖孤山，梅妻鹤子。苏轼《书林逋诗后》称之“神清骨冷”、“高节”、“绝俗”。^⑥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曲尽梅之体态，唱出千古咏梅

绝调。梅之高格逸韵，遂成为宋代文化淡雅精神的缩影。

梅花审美地位的发展，在中晚唐是个拐点。之前多偶然寄意，视之与其他诸花略同，此后则逐渐别立品题，单成一脉。宋人陈从古曾裒辑古今梅花诗八百篇，一一次韵，其自序云：

“在汉晋未之或闻，自宋鲍照以下，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诗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乐天四首，元微之、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各一首。自余不过一二，如李翰林、韦苏州、孟东野、皮日休诸人，则又寂无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余日积月累，酬和千篇云。”^⑦梅花审美地位的提升，无论从数量看，还是从影响论，起到重要转捩作用的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是多情之人，爱花是其多情的自然流露。其2700多首诗中，直接咏花的达110多首，具体有所指的花20余种。既有象征纯洁的白牡丹、白槿花、白莲花等白色之花，也有象征热情的红辛夷花、红樱桃花等火红明艳之花，更有傲霜斗雪、迎寒怒放的梅花。不像陶渊明仅爱菊，也不似陈子昂、张九龄独以兰若、桂花自比，乐天是爱花“不限桃杏梅”（《东坡种花二首》其一），“逐处花皆好”（《樱桃花下叹白发》）。

而引起苏轼留意的是白居易笔下的紫薇花。宋时杭州府治虚白堂前，有紫薇花两株，初传白乐天所植，苏子瞻守郡时，神宗尝书乐天紫薇花诗以赐之。^⑧苏轼《次韵钱穆父紫薇花二首》其一云：“虚白堂前合抱花，秋风落日照横斜。阅人此地知多少，物化无涯生有涯。”自注曰：“虚白堂前紫薇两株，俗云乐天所种。”另一首云：“折得芳蕤两眼花，题诗相报字倾斜。箧中尚有丝纶句，坐觉天光照天涯。”自注曰：“乐天诗云：‘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

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上尝书此诗以赐轼。”（《苏文忠公全集》卷十八）钱穆父，指钱勰，字穆父，元祐初拜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后曾知开封、越州等地。唐以来，中书省植紫薇花，历世循用之，不以为非。至宋代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⑨白居易笔下的紫薇花，除了上面苏轼后一首诗中自注所引《内直》，还有四十五岁在江州所作《见紫薇花忆微之》：“一丛暗淡将何比？浅碧笼裙衬紫巾。除却微之见应爱，人间少有别花（一作惜花）人。”^⑩以及五十四岁在苏州所作《紫薇花》：“紫薇花对紫微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浔阳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⑪

除了紫薇，杭州虚白堂前的牡丹，相传也是白乐天手植。^⑫因其与乐天的因缘，也曾引起苏轼留意。晚唐范摅《云溪友议》“钱塘论”一则，载有颇具传奇色彩的徐凝、张祜较文公案，开篇就事关杭州牡丹。本来杭州并无牡丹，长庆中，开元寺僧惠澄自京师乍得一本，始栽植于庭，谓之洛花。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云：“此花南地知难种，慚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⑬张祜亦有《杭州开元寺牡丹花》诗：“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⑭白居易来到开元寺看牡丹花，乃命徐凝同醉而归。^⑮那两句——“惟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可谓是恰到好处的恭维。至宋代，杭州牡丹渐多，而吉祥寺独盛。苏轼通判杭州时，有《牡丹记叙》，其略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可谓盛矣。^⑯

但若论对苏轼最富启发的咏花诗品类，则首推咏梅诗。乐天咏梅诗，以出现在诗题而论，有四首。《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忽惊林下发寒梅，便试花前饮冷杯。白马走迎诗客去，

红筵铺待舞人来。歌声怨处微微落，酒气醺时旋旋开。若到岁寒无雨雪，犹应醉得两回。”^⑰这一首中，梅花还只是个引子，尚未占据全篇核心，从篇幅看，也还不如“饮”的分量重。

《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共觅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诗思又牵吟咏发，酒酣闲唤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⑲这一首中，梅花在全诗中的审美地位略有提升，正面描写梅花的篇幅，与饮酒各占一半。三、四句：“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以人花相映，用颠倒之法，颇有杜少陵之笔意。

《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蹋随游骑心长惜，折赠佳人手亦香。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薛刘相次埋新垄，沈谢双飞出故乡。歌伴酒徒零散尽，唯残头白老萧郎。”^⑳诗中的梅花已是主角，正面特写已占到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正面特写中收尾的一句——“赏自初开直至落”，为评家所激赏，许以“最佳”。^㉑明代高鹤《见闻搜玉》以此诗为代表，谓孤山梅花虽以和靖得名，然白乐天《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诗云云，则自唐已赏鉴矣。^㉒

《新栽梅》：“池边新种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莫怕长州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㉓已全篇句句写梅花，惟角度不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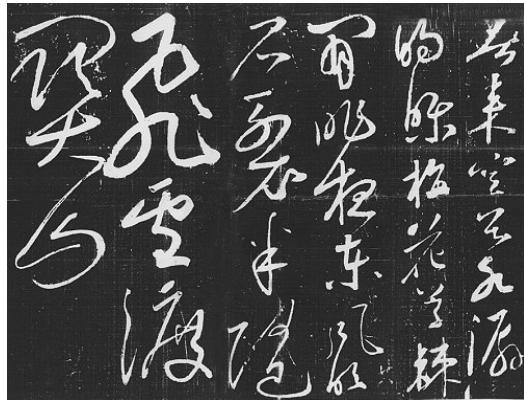
另外，《寄情》其实也是咏梅诗：“灼灼早春梅，东南枝最早。持来玩未足，花向手中老。芳香销掌握，怅望生怀抱。岂无后开花，念此先开好。”^㉔满含惜花之意，但并无惜花长怕花开早的惆怅。全首写因春梅早开引发的情思波动，娓娓道来，一一铺开，说得极纤细，极平淡，但令人有静观物理、因花悟道之感。

白居易还有一些咏梅诗句，如“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㉕“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㉖或对比于樱杏桃梨，或相衬在竹叶炉香，点缀在全篇之中，皆气色难掩。

再来看苏轼的咏梅诗。苏轼与梅花的结缘，始于被贬黄州之后。从诗题上看，苏轼的咏梅诗有40余篇，大都作于被贬黄州之后，占到其全部咏花诗的半数之多。这些“惜花未忍都无

言”（《花落复次韵》）的歌咏，与白居易咏梅诗相较，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全无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往往融入诗人对坎坷经历的切身感触；而在这样的主题之下，诗人并未喧宾夺主，将梅花视作附庸风雅的点缀。梅花仍是诗中主角，咏物与抒情，描摹与寓意有机但却无形地结合于咏梅诗之中，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梅花二首》是代表上述特色的名作：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皵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此诗作于元丰三年（1080）正月。时苏轼赴黄州贬所路途中，心情复杂难言。在赴贬所的路途中，看见幽谷寂寞开落的清梅，触动情怀，写下这两首七绝。第一首开篇所云幽谷，令人联想到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幽居在空谷的是佳人绝代，幽处在草棘间是梅花的皎洁，赞美梅花明妍的皎洁之貌，感叹它“半随飞雪度关山”、“开自无聊落更愁”，显然寄托了诗人自己的感情、个性和遭遇。风吹石裂一句，化自欧阳修《山斋绝句》“正当年少惜花时，日日东风吹石裂”之句。飞花如雪一句，化自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吹笛》“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

这两首咏梅诗，不即不离，亦实亦虚，托意在似有似无之间，运笔空灵而深沉。第二首后两句从“落”字生情，写只有三百曲清清溪流不辞辛苦，直送落梅到黄州，实际是暗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悲。人情之炎凉，使原本无心的自然之物在孤寂的诗人看来，眷恋怀感，一往情深。其中深情绵邈，奇幻非凡，令人百读不厌。东坡后来屡次提到这两首咏梅诗，可见得

他当时写作时是极有所感而有所寓怀的。如一年后的《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十四年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春风岭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两年后的《红梅三首》^②是更为后人所称道的名作：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馀孤瘦雪霜姿。寒心
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
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雪里开花却是迟，何如独占上春时。
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细雨
裏残千颗泪，轻寒瘦损一分肌。不应便杂
妖桃杏，半点微酸已着枝。

幽人自恨探春迟，不见檀心未吐时。
丹鼎夺胎那是宝，玉人顰頷更多姿。抱丛
暗蕊初含子，落盏秾香已透肌。乞与徐熙
新画样，竹间璀璨出斜枝。

第一首是众选家青睐之作，因为诗中创造性地提出“梅格”的概念，对梅花审美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②当时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已是第三载。诗以梅自况，咏物寓志；借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的红梅，象征诗人刚正坚贞的品格。红梅独开迟放，不是“怕愁贪睡”，而是自知“冰容”“寒心”难以入时；故作“桃杏”“酒晕”之浅红，并非欲与群芳斗艳争妍，只是口诺心非，身不由己。故“诗老”石延年（曼卿）《红梅》诗篇之末虽有“未应娇意急，发赤怒春迟”，不愧全篇精彩之收笔，但其诗中“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终为有形无神之败句，此后元祐三年（1088），苏轼《东坡志林·评诗人写物》又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③此正可移笺“诗老不知梅格在”。这首《红梅》诗品出自人品，梅品照映人品，梅格与人格互衬，《唐宋诗醇》卷三十七评云：“不着意‘红’字则泛衍，然一落色相，则又如涂涂附矣。石延年句岂不精切，而诗谓其不知梅格，知此者可与言诗。”诗人自己也引为得意之作，还稍加损益，填为《定风波·咏

红梅》：“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②刘熙载《艺概·词概》评价说：“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非仅可以学坡词，观“孤瘦雪霜姿”，还可得东坡独特的审美取向。所谓“孤瘦”，杨夔生《续词品》之形容有云：“怅焉独迈，谬于隐忧。悟出系表，天地可求。亭亭危峰，倒影碧流。空山冱寒，老梅古愁。味之无腴，揖之寡俦。遥指木末，一僧一楼。”《红梅三首》第二首尾句：“不应便杂夭桃杏，半点微酸已着枝。”第三首颔联：“丹鼎夺胎那是宝，玉人顚頷更多姿。”亦佳妙之笔。

又过了两年，元丰七年（1084），苏门弟子秦观寄来一首《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诗：“海陵参军不枯槁，醉忆梅花愁绝倒。为怜一树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恼。清泪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结子待君来，洗雨梳风为谁好？谁云广平心似铁，不惜珠玑与挥扫。月没参横画角哀，暗香销尽令人老。天分四时不相贷，孤芳转盼同衰草。要须健步远移归，乱插繁华向晴昊。”苏轼答以《和秦太虚梅花》，诗云：

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

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粉不扫。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界昊。

西湖处士指林逋（968~1028），林逋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孤力学，恬淡好古。早年放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孤山，相传二十年足不至城市，以布衣终身。真宗闻其名，曾赐粟帛；及卒，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和靖先生的文化符号就是梅妻鹤子。他对前辈杭州太守白乐天并不陌生，还颇有好感，有诗为证。诗云：“白公睡阁幽如画”^③，“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④黄州即自称“本与乐天为

后进”^⑤的王禹偁，咸平元年（998）任黄州太守。八十六年后来到黄州的苏轼，接续了这段因缘。此诗步秦观梅花诗原韵。秦观诗回忆梅花，东坡也从忆梅归结到贬谪黄州的感慨。诗中说他因爱林逋和秦观的梅花诗而更爱梅花，但自己穷愁潦倒，有负大好春光，还不如让风雨送春归去算了。东坡不粘滞于咏梅，而能寓感慨于言外，寄托深远。全篇押“槁”字仄韵，诗句骈散交错，音韵流美。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八曾评价说：“前辈谓东坡梅花诗有押‘瞰’字韵三首，皆绝妙，摆落陈言，古今人未尝经道者。愚谓此篇语意亦高妙，如‘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写出梅花幽独闲静之趣，真不在暗香疏影之下也。”诗中描绘梅花，正面描绘仅“江头”、“竹外”一联，确实点染生动，传神微妙，造语新鲜自然。《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范正敏《遯斋闲览》评云：“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值得留意的是，诗中“点缀裙腰粉不扫”之“裙腰”二字，正出自长庆三年（823）白居易所作《杭州春望》诗：“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透过这则跨越二百六十一年历史风烟的用典，可以看到白苏之间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与渊源。五年后，元祐六年（1089），东坡另一首咏梅诗《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五再用此典：“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⑥

上引《诗林广记后集》所云：“前辈谓东坡梅花诗有押‘瞰’字韵三首，皆绝妙，摆落陈言，古今人未尝经道者。”所谓前辈云云，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后集》卷二十一，苕溪渔隐曰：“陈敏政《遯斋闲览》云：‘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鑾字韵咏梅诗》二首，东坡在岭南，有瞰字韵咏梅诗三首，皆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也。’余以《临川集》、《东坡后集》细细味之，鑾字韵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诗，其一云：‘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其一云：‘肌冰绰约如姑射，肤雪参差是玉真。’其余亦别无奇特句。至若东坡瞰字韵三首，皆摆落陈言，古今人未尝经道者，三首并妙绝，第二首尤奇。”下面来看苏轼这三首在惠州所作的“瞰”字韵咏梅诗。

第一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⑦：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蠢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瞰。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

此诗作于绍圣元年（1094）十一月。时苏轼在惠州贬所。松风亭，在广东惠州嘉祐寺附近。“昔年”句，作者自注：“予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蠢雨，泛称南方海上暴雨。“海南”二句，把梅花写成善解人意的仙子，叩诗人的门拜访诗人。同是咏梅诗，此诗可与东坡《梅花二首》同看。一是刚从死地复生，贬黄州途中作；一是从大学士直落而下，南贬惠州所作。时隔十四年，同借梅花记贬谪情怀。悲伤断魂，幽人自叹，时光借着花开花落而交叠在一起，引动东坡无限感慨。年来踪迹无定，而每在寂寞落拓时分，惟孤梅相对，似有情长相伴，而不似人间情意淡薄，只相弃不遑顾。诗自昔年见梅情怀说起，写梅花虽流落荒蛮之地，仍洁身自好，清姿雅态，不同凡俗。梅与人相融一体，叹梅花知己，怜梅花落寞。梅在东坡的想像中，化成海南仙子，正如纪昀所评：“天人姿泽，非此笔不称此花。”（《纪评苏诗》卷三八），又如汪师韩所赞：“秀色孤姿，涉笔如融风彩霭。”全诗寓目寄情，描写形神俱佳，寄托幽微。

第二首《再用前韵》⑩胡仔评以“尤奇”：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岭南珍禽有倒挂子，绿毛红喙，如鹦鹉而小，自东海来，非尘埃中物也。

这首咏梅诗与上一首属自赓自和之作。罗浮山梅花村能够与大庾梅岭、西湖孤山、苏州邓尉、杭州西溪并列五大梅花风景名胜，与此

诗尤其是首联有很大关系。接下来的“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一联，则更为后人艳称。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谓，林和靖赋梅花诗，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语，脍炙天下殆二百年；东坡“此语一出，和靖之气遂索然矣。”⑪这一联中的“耿”字，是苏轼笔下体现“梅格”内涵的重要诗眼，既有明亮鲜艳之貌，又含坚贞正直之意，为苏轼咏梅诗所偏爱，如《忆黄州梅花五绝》“淮阳城里娟娟月，樊口江边耿耿参”，《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寒厅不知春，独立耿玉雪”，《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涛雷殷白昼，梅雪耿黄昏”。上一首写刚到环境险恶的贬谪地，乍看到荆棘丛中的两株梅花，不禁牵动诗人丰富的情感。他将梅花比作善解人意的仙子，以博学多才为联想的底蕴，在诗中抒写梅花引发的翩翩美善情思，从而让自己内心产生无限慰藉之感。这一首把海南的一种鸟叫倒挂子的写成使者，而使者派啄木鸟敲诗人的门。麻姑是道教神话人物，据《神仙传》记载，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东汉时应仙人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貌美，自谓“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故以麻姑喻高寿。苏轼又有《西江月·梅》词：“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其所用比喻，与此诗略同，再次展现出梅花的高贵情操和优雅风姿。明代杨慎《词品》评曰：“古今梅花词，以坡仙绿毛幺凤为第一。”

第三首《花落复次前韵》⑫：

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
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桂成幽昏。暗香入户寻短梦，青子缀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雪肤满地聊相温。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多情好事余习气，惜花未忍都无言。留连一物吾过矣，笑领百罚空罍樽。

苏轼在惠州共作三首自唱自和的白梅诗，前二首咏盛开的梅花，待到梅花零落时，一直关心着梅花命运的诗人，又写下这首咏落花的诗。诚可谓“惜花未忍终无言”。首句“玉妃谪

堕烟雨村”，梅花以玉雪为骨冰为魂，故比作玉妃，但“谪堕”二字出《杨贵妃外传》，玉妃还暗指着杨贵妃。而与杨贵妃密切相关的本应首选牡丹，苏轼却投胎换骨将其与宋代精神的象征——梅花联系在一起，以“谪堕”来转换，诚可谓先生作诗招魂之际的奇思妙想，出新而入化。《长恨歌》中的玉妃在后半部分的仙化描写，不知是否也对此诗有所启发。人间草木决非玉妃愿意为伍，她要奔向月宫与桂花相伴。后面幻想暂断，先生再次回到人间。耳顺之年的先生已皈依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所谓“不二之法”，指“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佛性既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转瞬即逝的，所以，善根是不断灭的，无差别的本性就是佛性。那梅花怎么办呀！“多情好事余习气，惜花未忍终无言。”先生自嘲，习气尚未除尽，我还留恋人间。为了这对梅花的留恋，我愿罚酒百杯，一空罍樽。拿不二之佛法，立爱梅之宣言，不能不令人惊叹。元人韦居安《梅磵诗话》云：“梅格高韵胜，诗人见之吟咏多矣。自和靖‘香影’一联为古今绝唱，诗家多推尊之。其后东坡次少游‘稿’字韵及谪罗浮时赋古诗三篇，运意琢句，造微入妙，极其形容之工，真可企微孤山。以此见骚人咏物，愈出而愈奇也。”这的确是知音之言。

东坡先生的咏梅佳作还有很多，佳句亦多可圈可点，除了上面提到的“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和秦太虚梅花》），“乞与徐熙新画样，竹间璀璨出斜枝”（《红梅三首》其三），“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再用前韵》）之外，像“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噪开”（《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玉蕊檀心两奇艳”（《蜡梅一首赠赵景贶》），“浮光风宛转，照影水方折”（《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四），“檀心已作龙涎吐，玉颊何劳獭髓医”（《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七），“风蒲半折寒雁起，竹间的蝶横江梅”（《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真态香生谁画得，玉如纤

手嗅梅花”（《四时词》其四），“冷烟湿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二月三日点灯会客》），“殷勤更下山阴雪，要与梅花作伴来”（《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之一），“从今莫入寻春会，为欠梅花一首诗”（《法惠小饮以诗索周开祖所作》），“秋来欲见紫髯翁，待得梅花细萼红”（《欲往湖州见孙莘老别公辅希元彦远醇之穆仲》），“山行尽日不逢人，浥浥野梅香入袂”（《自普照游二庵》），“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醉看梅雪清香过，夜棹风船骇汗流”（《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化工未议苏群槁，先向寒梅一倾倒”（《再和潜师》），“坐听屐声知有路，拥裘来看玉梅春”（《次韵陈履常雪中》），“为公过岭传新唱，催发寒梅一信春”（《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二），亦各具梅姿，兼寓心志，或由梅而入，或由人而梅；或描摹梅态，借题发挥；或使事传神，清空入妙；或声情跌宕，韵险语工，无不各臻其致。

与白居易相比，苏轼对于梅花的审美更加独到而全面。他笔下的梅花清冷孤傲、不屈不挠，具有梅格的同时，又不失人性的细腻。从咏梅诗这一视角看，苏东坡对白香山既有受容，亦有超越，其超越首先是建立在受容基础之上的超越。而其超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苏轼将梅花置于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宦途遭遇寄托在了梅花之上。其最大的超越处在于，将梅格与人品有机融合，使梅之高格逸韵，成为东坡范式的形象写真，并进一步被升华为宋代文化淡雅精神的缩影。

注释

① 前者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九《评论门》五，《宋诗话辑佚》上册第45页；后者见《容斋三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容斋随笔》，第474页。

②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历代诗话》第656页）据张海鸥《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受容和诗

学批评》考证，周论在洪评（绍熙四年1193年）之前。此后庆元五年（1199）己未，周必大《书曾无疑匹纸》亦云：苏文忠公素慕白乐天之为人，盖二公文章皆以辞达为主，其忠厚乐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着，亦略相似。乐天为忠州刺史，作《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文忠公中年谪黄州，偶因筑室，号东坡居士，尝赋八诗，其属意有自来矣。后为从官，羡乐天口之不置，如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又云：“出处依稀似乐天。”其他形于诗者尚多。（《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卷五十一平园续稿十一；重见于卷五十五）

③ [唐]朱庆余《早梅》，《全唐诗》卷515，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册5889页。

④ [宋]卢梅坡《雪梅》，[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一。卢梅坡，即卢钺，见王三毛《宋末诗人卢梅坡考》，《文献》2008年第1期。

⑤ ⑩ 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册第745页、第784页。

⑥ ⑦ ⑧ ⑨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4页、第1107页、第2076页、第2076页、第2078页。

⑦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程祁陈从古梅花诗》，《历代诗话》第672页。

⑧ 参见日本近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

⑨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香山居士》引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

⑩ ⑪ 《白居易集笺校》第992页、第1623页。

⑩ 罗隐有《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全唐诗》卷六六四）。

⑩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四，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第14册第5374页。

⑩ 见尹占华《张祜诗集校注》，第96页。钱塘寺，一作钱塘守。

⑩ 《云溪友议》古典文学出版社版卷中，第30~32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四，第2832册，第24~26页。

⑩ 陈秀民（？~1389后）《东坡诗话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

⑩ 长庆二年（822），五十岁，杭州，杭州刺史。《白居易集笺校》第1348页。

⑩ 长庆四年（824），五十三岁，杭州，杭州刺史。《白居易集笺校》第1384页。（自注：去年与薛景文同赏，今年长逝。）

⑩ 宝历元年（825），五十四岁，洛阳，太子左庶子分司。《白居易集笺校》第1595页。（自注：薛、刘二客，沈、谢二妓，皆当时歌酒之侣。）

⑩ 《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第784页。

⑩ 高鹤《见闻搜玉》卷四，明万历十九年夏越中函三馆雕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善本室藏。

⑩ 宝历元年（825），五十四岁，苏州，苏州刺史。《白居易集笺校》第1647页。

⑩ 大和六年（832），六十岁，洛阳，河南尹。《白居易集笺校》第1519页。

⑩ 《春风》，大和五年（831），六十岁，河南尹。《白居易集笺校》第1928页。

⑩ 《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开成三年（838），六十七岁，洛阳，太子少傅分司。《白居易集笺校》第2331页。

⑩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⑩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3页。

⑩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第322页，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⑩ 《孤山寺》，《四库全书》本《林和靖集》卷二；《全宋诗》第二册，第1213页。

⑩ 《读王黄州诗集》，《四库全书》本《林和靖集》卷三；《全宋诗》第二册，第1230页。

⑩ 王禹偁《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四库全书》本《小畜集》卷九；《全宋诗》第二册，第733页。

⑩ 参见曾季狸（1118~1179前不久）《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08页。杨公济名蟠，时任杭州通判。

附录：苏轼其他咏梅诗

【次韵李公择梅花】

诗人固长贫，日午饥未动。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飽即喧哄。君为三郡守，所至满宾从。江湖常在眼，诗酒事豪纵。奉使今折磨，清比于陵仲。永怀茶山下，

携妓修春贡。更忆槛泉亭，插花云髻重。萧然卧瀛麓，愁听春禽哢。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诗成独寄我，字字愈头痛。嗟君本侍臣，笔橐从上雍。脱靴吟芍药，给札赋云梦。何人慰流落，嘉觴天为种。杯倾笛中吟，帽拂果下鞚。感时念羁旅，此意吾侪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凤。君亦忆匡庐，归扫藏书洞。何当种此花，各抱汉阴瓮。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本作代书寄桃山居士张圣可）】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

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障开。野店初尝竹叶酒，江云欲落豆楷灰。行当更向钗头见，病起乌云正作堆。

【王伯扬所藏赵昌花四首·梅花】

南行渡关山，沙水清练练。行人已愁绝，日暮集微霰。殷勤小梅花，仿佛吴姬面。暗香随我去，回首惊千片。至今开画图，老眼凄欲泣。幽怀不可写，归梦君家倩。

【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

东坡先生未归时，自种来禽与青李。五年不踏江头路，梦逐东风泛蘋芷。江梅山杏为谁容，独笑依依临野水。此间风物君未识，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复在江湖，知君对花三叹息。

【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月黑林间逢缟袂，霸陵醉尉误谁何。

相逢月下是瑶台，藉草清樽连夜开。明日酒醒应满地，空令饥鹤啄莓苔。

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

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渐欹斜。西郊欲就诗人饮，黄四娘东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开，莫著新诗句句催。岭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来。

冰盘未荐含酸子，雪岭先看耐冻枝。应笑春风木芍药，丰肌弱骨要人医。

寒雀喧喧冻不飞，绕林空嶂未开枝。多情好与风流伴，不到双双燕诗时。

皎绡剪碎玉簪轻，檀晕妆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悬知欲落更多情。

缟裙练帨玉川家，肝胆清新冷不邪。秾李争春犹办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

一枝风物便清和，看尽千林未觉多。结习已空从著袂，不须天女问云何。

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凭仗幽人收艾纳，国香和雨入青苔。

白发思家万里回，小轩临水为花开。故凭剩作诗千首，知是多情得得来。

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黄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风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垆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开，白头朝夕自相催。斩新一朵含风露，恰似西厢待月来。

洗尽铅华见雪肌，要将真色斗生枝。檀心已作龙涎吐，玉颊何劳獭髓医。

湖面初惊片片飞，樽前吹折最繁枝。何人会得春风意，怕见梅黄雨细时。

长恨漫天柳絮轻，只将飞舞占清明。寒梅似与春相避，未解无私造物情。

北客南来岂是家，醉看参月半横斜。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

【蜡梅一首赠赵景贶（一题次履常蜡梅韵）】

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天工变化谁得知，我亦儿嬉作小诗。君不见万松岭上黄千叶，玉蕊檀心两奇绝。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归来却梦寻花去，梦里花仙觅奇句。此间风物属诗人，我老不饮当付君。君行适吴我适越，笑指西湖作衣钵。

【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

寒厅不知春，独立耿玉雪。闭门愁永夜，置酒及明发。忽惊庭户晓，未受烟雨没。浮光风宛转，照影水方折。鬓霜未易扫，眉斧真自伐。惟当此花前，醉卧黄昏月。

【赠岭上梅】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忆黄州梅花五绝】

邾城山下梅花树，腊月江风好在无。争似姑山寻绰约，四时常见雪肌肤。

一枝价重万琼琚，直恐姑山雪不如。尽爱丹铅竞时好，不如风雪养天姝。

虽老于梅心未衰，今朝谁赠楚江枝。旋倾尊酒临清影，正是吴姬一笑时。

不用相催已白头，一生判却见花羞。扬州何逊吟情苦，不枉清香与破愁。

玉琢青枝蕊缀金，仙肌不怕苦寒侵。淮阳城里娟娟月，樊口江边耿耿参。

【次韵陈四雪中赏梅】

腊酒诗催熟，寒梅雪斗新。杜陵休叹老，韦曲已先春。独秀惊凡目，遗英卧逸民。高歌对三白，迟暮慰安仁。

【谢关景仁送红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珍重多情关令尹，直和根拔送春来。

为君栽向南堂下，记取他年著子时。酸酽不堪调众口，使君风味好攒眉。

【次韵赵德麟雪中惜梅且饷柑酒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余，遣雪摧残计已疏。卧闻点滴如秋雨，知是东风为扫除。

阆苑千葩映玉宸，人间只有此花新。飞霓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

蹀躞娇黄不受鞭，东风暗与色香归。偶逢白堕争春手，遣入王孙玉蝶飞。

附录：苏轼与白居易研究文献

苏轼对白居易的受容

1. 金洙映《白乐天、苏东坡》，新太阳社 1968 年版，韩国出版公社 1986 年再版，“东洋历代伟人传记选集”第六册。

2. 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 《中唐—北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scholars and style of Ci from middle Tang dynasty to Northern Song dynasty: take Baijuyi and Sushi as the centre) 张再林(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161页)，2002年(导师)杨海明。

4. 《白居易与苏轼怀古诗比较研究》张亚祥(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9年4月(导师)钟振振。

5. 《宋诗对白居易诗的受容与超越：以苏轼诗为中心》王域铖(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6月(导师)杜华平。

6. 《论苏轼与白居易相通的性格》(白居易苏轼相通する的一种の性格について) 大西德治郎《国语》(香川大学)7, 1954年10月。

7. 莫红《西湖三诗人》(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新民报晚刊》1956年4月15日。

8. 西野贞治《关于苏东坡的思想渊源：特别围绕与白乐天的关系》，《日本中国学会报》(日本中国学会)16, 1964年12月。

9. 堤留吉《苏东坡与白香山》(蘇東坡と白香山)(上)，《东洋文学研究》(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会)12, 1964年3月, 第41~56页。

10. 堤留吉《苏东坡与白香山》(蘇東坡と白香山)(下)，《东洋文学研究》(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会)13, 1965年3月, 第40~48页。

11. 陈立文《我所欣赏的诗人与诗：晚唐的李商隐、杜牧、西湖骚客白居易、苏东坡》，《中华文艺》13: 3, 民66年5月, 第92~99页。

12. 葛晓音《诗文之辨和以文为诗：兼析韩愈、白居易、苏轼的三首记游诗》，收入其《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13. 周懋昌《满湖春色与一江春水：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与苏轼〈春江晚景〉对照》，《中学语文教学》1992年第10期。

14. 马识途《“东坡”之名从何而来：〈白居易与忠州〉序》，《文史杂志》1994年第1期，又收入四川省忠县政协委员会编印《白居易与忠州》，1993年9月，《忠县文史》第二辑。

15. 蔡正发《苏轼与白居易比较研究》，《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1期，第27~37页。

16. 蔡正发《白居易对苏轼的影响》，《古今艺文》第21卷第3期，1995年5月，第6~21页。

17. 沈洁《白居易、苏东坡、朱熹的养生方法(一)》，《医古文知识》1995年第3期。

18. 章尚正《白苏论》，收入《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 西冈淳《唐宋诗人与酒——白居易与苏东坡》，《法文学部论集》(人文科学编)(爱媛大学法文学部)3, 1997年。

20. The Exchange of Poetry and the Poetry of Exchange: A Perspective on Bai Juyi and Su Shi (诗歌的交换和交换的诗歌：关于白居易和苏轼的一点思考) the 1999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Affairs, Michigan Sat

e University, September 24–26, and at the 200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an Diego, March 9–12.

21. 张海鸥《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受容和诗学批评》,《橄榄》第11期(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会刊,2002年12月);又收入莫砺锋主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2002年8月);又作为附论三,收入其《北宋诗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 张再林《从白居易到苏轼:唐宋文人心路历程之一瞥》,《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

23. 杨彩贤《白居易与苏轼之比较》,《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4. 张再林《“渊明吾所师”与“出处依稀似乐天”:论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接受》,《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4期。

25. 王靖懿《从闲适到超旷的跨越:论东坡对乐天的接受与超越》,《阴山学刊》2004年第5期。

26. 郑敬东《白居易与苏轼的忠州奇缘》,《今日重庆》2007年第3期。

27. 刘勇《白居易、苏轼贬谪诗文意蕴之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28. 魏鸿雁《“不二法门”与“拈花一笑”:白居易与苏轼禅诗比较》,《名作欣赏》2007年第18期。

29. 张再林《论苏轼学白居易诗》,《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

30. 张蜀蕙《流动的生命经验与空间对话——从白居易、苏轼“历杭”作品看南方意识的形成》,《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 王域铖、徐金兰、郭辛茹、张慧玲《从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受容与警惕看苏轼的诗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32. 尚永亮《苏轼与白居易的文化关联及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3. 戎丹妍《古代房地产“开发商”也疯狂 白居易苏东坡如何买房》,《乡镇论坛》2010年第12期,《老区建设》2010年第15期。

34. 毛妍君《论苏轼对白居易“闲适”人生观的受容》,《西江月》2010年8月8日。

35. 汪国林《论白居易吏隐思想及其对宋代文人的影响——以苏轼为考察对象》,《求索》2011年第6

期。

36. 陈培新《西湖三堤与三朝“西湖长”——浅析白居易、苏轼、杨孟瑛对西湖保护的历史功绩》,《杭州(周刊)》2011年8月28日。

37. 张亚祥《白居易与苏轼怀古诗数量比较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8. 马丁良《苏轼词对白居易诗的化用》,《名作欣赏》2012年第8期。

白俗

39. 花房英树《白俗论考》(《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21号,1969年11月;后收入世界思想社1971年3月31日初版发行的其专著《白居易研究》第五章:《白居易评论:以“白俗论”为中心》,在收入时,增补了现代评论部分)。马歌东译《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所收仍为原论文。这篇论文资料翔实,行文缜密,持论公正,将苏轼之后近千年(若从李肇、杜牧始则已逾千年)这桩文坛公案作了一个近情切理的小结。

40. 吴小如《苏轼所说的“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指的是什么?》,《文史哲》1991年第7期。

41. 川合康三《“白俗”的检讨》,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下定雅弘、丸山茂等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五卷“围绕白诗接受的有关问题”勉诚社,1994年9月;又收入川合康三《终南山の变容:中唐文学论集》,研文出版社1999年版。刘维治、张剑、蒋寅译《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42. 范长华《苏东坡“元轻白俗”诗评浅析》,《台中师院学报》第8期,民国83年6月,第271-291页。

43. 曾晓玲《再议“白俗”:白居易后期诗歌的瑕疵》,《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44. 内山精也《苏轼“元轻白俗”辩》,《新释汉文大系季报》(明治书院)101,2004年。

45. 何斓《论白居易思想对“白俗”之影响》,《福建广播电视台学报》2005年第1期。

46. 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苏轼“白俗”之评的意味》,《松浦友久博士追悼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研文社),2006年3月。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苏轼论司马相如

房 锐

内容提要 指出苏轼的三篇短文从不同的方面对司马相如一生行事及为文进行贬斥，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些贬斥之辞针对性强，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尽管苏轼之论不无偏激之处，但它们却是司马相如其人其作在宋代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我们透露了丰富的信息。

关键词 苏轼 司马相如 贬斥

苏轼在《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司马相如之谄死而已》、《臞仙帖》三篇短文中，对司马相如一生行事为文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值得关注。其《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①云：

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卓王孙暴富迁虏也，故眩而喜耳。鲁多君子，何喜之有。《司马相如之谄死而已》②云：

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从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

《臞仙帖》③云：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

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鵩赋》，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东坡书。

这三篇短文有可能作于同一时期。《臞仙帖》文尾标明此文写于“庚辰八月二十二日”，“庚辰”，即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其时距苏轼去世已不足一年时间。

在这三篇短文中，苏轼从不同的方面对司马相如进行贬斥，旗帜鲜明，笔锋辛辣，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这些贬斥之辞针对性强，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为我们透露了丰富的信息。此简论之。

一、贬斥司马相如、卓文君私奔之举及相如炫耀乡里的行径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的故事，极具传奇色彩，为司马迁所津津乐道。《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描述了相如与文君的爱情婚姻奇遇，生动地刻画了一位落拓不羁、富于智略的风流才子形象。《西京杂记》卷二《相如死于消渴疾》条较为完整地叙述了相如与文君私奔结合和当垆卖酒的传奇故事，着重刻写了文君姣好的容貌与风流的性情，此条记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史传之外的材料，还反映了汉魏时期人们对相如、文君惊世骇俗之举的认识。④

对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之举，也有部分文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扬雄在《解嘲》中，曾提及“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由于《解嘲》⑤一文较长，此处只抄录与此句相关的一段：

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由此可知，扬雄“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之句，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出现的，且并无贬斥之意。至于此句在后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扬雄始料未及的。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司马长卿，窃赀无操。”^⑥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相如窃妻而受金。”^⑦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三〇《七十列传述赞》云：“相如纵诞，窃赀卓氏。”^⑧这三条评论均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视作相如“窃赀”或“窃妻”，且认为这是相如人品上的一大瑕疵。

苏轼在前人“窃赀”、“窃妻”之说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发挥，其“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之语，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之举进行辛辣的讽刺。与前人的说法相比，其措辞、语气更严厉，嘲讽意味也更浓。

按苏轼的说法，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一事为“污行”，且为蜀人所不齿。但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在相如生活的时代，蜀人未必会把此事视作相如的“污行”。这一说法当为苏轼臆测之辞。

苏轼“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卓王孙暴富迁虏也，故眩而喜耳”等句，乃针对《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所载相如出使西夷、途经蜀中一事而发。《司马相如列传》^⑨云：

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司马相如以天子使节的身份出使西夷，衣锦还乡，受到蜀郡太守等人的隆重礼遇，在当

地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令蜀人羡慕不已。此行又为相如带来了巨额财富。但苏轼把相如此行视作炫耀乡里的行径，“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两句，指责相如对故乡、对故乡人缺乏应有的恭敬之心。卓王孙先人于赵国灭亡后，迁徙临邛，富可敌国，苏轼贬称卓王孙为“暴富迁虏”，其“鲁多君子，何喜之有”两句，斥责卓王孙趋炎附势、重利轻义、不知礼仪，实乃小人嘴脸。

汉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关于中郎将一职，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二六《司马相如列传》“中郎将”注引魏人张揖语：“秩四百石，五岁迁补大县令。”“县令负弩矢先驱”注云：“霍去病出击匈奴，河东太守郊迎负弩。又魏公子救赵击秦，秦军解去，平原君负弩矢迎公子于界上。”^⑩《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⑪可见，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夷时，其官职是低于县令的。司马贞所举二例，一在相如之前，一在相如之后。而信陵君、霍去病的身份与地位也均高于司马相如。

然而，当相如途径成都时，却受到了蜀郡太守及其属官郊迎，县令还效法平原君，“负弩矢先驱”。蜀郡太守以这种高规格的接待仪式，彰显对天子使臣的高度重视。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相如出使西夷之时，文翁化蜀已初见成效。文翁“通《春秋》”^⑫，其化蜀措施带有浓郁的统一思想的意味^⑬。司马相如为“大一统”观践行者，文翁或其继任者以极高规格迎接使臣相如，是可以理解的。而受到文翁教化多年的蜀人亲眼目睹这一历史场景，也由此体认到为中央王朝效力、成为天子使臣的尊贵与荣耀。

由此可知，苏轼称司马相如“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之句，与“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之句，均与事实不符。

二、贬斥司马相如“谄事”武帝

司马相如以辞赋惊动人主，其《天子游猎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哀

秦二世文》、《大人赋》、《封禅文》等作品，多有为而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⑫在《司马相如列传》中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⑬他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收录了相如的一些作品，并强调其赋作讽谏的价值。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卷三〇《七十列传述赞》中，对司马相如其才其作加以肯定，认为：“其学无方，其才足倚。《子虚》过咤，《上林》非侈。四马还邛，百金献伎。惜哉《封禅》，遗文卓尔。”^⑭一些文人也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讽谏作用予以肯定。如虞世南、魏征劝阻唐太宗围猎，虞世南《谏猎疏》云：“是以马卿直言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微贱，敢忘斯义？”^⑮魏征《谏格猛兽表》云：“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其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谏曰……”^⑯

事实上，苏轼对司马相如辞赋也不乏正面的评价。如《远游庵铭并叙》云：“昔司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意其鄙之。乃取屈原《远游》作《大人赋》，其言宏妙，不遣而放。”^⑰《复改科赋》云：“议夫赋曷可已，义何足非。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巧拙由一字之可见，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隐括者必在于枢机。所以不用孔门，惜扬雄之未达；其逢汉帝，嘉司马之知微。”^⑱可见，苏轼对司马相如“知微杜渐”，敢于及时进谏，是持赞赏态度的^⑲。

但在《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臞仙帖》三文中，苏轼却称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他认为，司马相如开西南夷，作《大人赋》、《谕蜀父老》、《封禅书》等文，均为迎合武帝，其行为是可耻的。他甚至直呼相如为“孺子”和“小人”。

笔者以为，苏轼贬斥司马相如“谄事”武

帝，或许有如下原因：

（一）司马相如所“谄事”的汉武帝并非值得称颂的仁君

在历史上，汉武帝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他致力于开疆拓土，奠定了汉帝国的疆域版图。但他因好大喜功、劳民黩武，又受到后人（尤其是宋人）的非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条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⑳

宋哲宗时，苏辙因把宋神宗比作汉武帝而被贬谪。绍圣元年（1094）三月，廷策进士，李清臣撰策题，历诋元祐之政。苏辙上疏面奏，其《论御试策题札子二首》其一中有如下内容：“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乏，于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苛政，汉室乃定。”^㉑

《续资治通鉴》卷八三《宋纪八十三》“哲宗绍圣元年”^㉒条载：

帝固不说，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论，帝益怒，遂责辙以汉武比先帝，辙曰：“汉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邓温伯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退，举笏谢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乞赐屏逐，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有“风节

“天下所闻”及“原诚终是爱君”之语，帝怒，命别撰词。辙止散官知汝州，安诗寻亦罢为起居舍人，从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后来撰写的制词称：“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资，加之经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②

苏辙因把宋神宗比作汉武帝，几致灭顶之灾的遭遇，令人感慨。从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可以想见汉武帝在北宋君臣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在苏辙看来，汉武帝就是一位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君主，而他“汉武，明主也”的辩白显然是苍白的。苏轼对汉武帝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文中，他对汉武帝多有讥刺。如《汉武无秦穆之德》：“汉武帝违韩安国而用王恢，然卒杀恢。是有秦穆公违蹇叔之罪，而无用孟明之德也。”^③《汉武帝唐太宗优劣》：“轼以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尽其用，歿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亦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才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④《卫青奴才》：“汉武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为可佳尔。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⑤《汉武帝巫蛊事》：“汉武帝讳巫蛊之事，疾如仇雠。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记·封禅书》云：‘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已且为巫蛊之魁，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云。”^⑥《梁统议法》：“汉仍秦法，至重……武帝暴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帝之旧。”^⑦《相如长门赋》：“予观汉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词褒慢及宫闱间。”^⑧

《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云：“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允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⑨苏轼因卷入新旧党争，半生沉浮，艰险备尝。面对与武帝有相似之处的神宗及以“绍述”为己任的哲宗，面对谗佞之徒盘踞朝中的现实，苏轼有感而发。而他对汉武帝的评价，也隐含着对当代政治的批判。

（二）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给蜀人带来灾难

西南夷在今云南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地区。开西南夷，实乃司马相如之壮举。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建节往使，“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⑩。他在《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两文中，对汉王朝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影响极为深远。司马迁把《司马相如列传》排在《西南夷列传》之后，是具有深意的^⑪。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开边功臣，其开西南夷之举，为武帝后来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宣宗在《遣宋涯宣慰安南邕管敕》中，充分肯定了相如开西南夷的历史功绩：“昔司马相如奉汉廷之命，通西南夷路，飞檄晓谕，不劳师征。夜郎、牂牁等，皆生梗之俗，犹能永奉汉法，于今称之。”^⑫

五代十国时期，西南夷的一部分被大理国占据。北宋平后蜀之后，未对大理国用兵。双方以大渡河为界，各守疆域。至徽宗之前，北宋与大理国也未形成所谓的“册封”关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载，绍兴六年九月，“癸巳，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戒之上策。”^⑬朱震的说法，当有所依据。苏轼关于相如“开西南夷之隙”、“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的说法，显然是站在宋人立场上说的，这些说法也间接反映了北宋统治者未开“西南夷”的事实。

应该指出，苏轼关于相如开“西南夷”的言论，仍具有针对性。北宋后期，西夏屡屡威胁到北宋边境的安全。《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载：

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开熙河，谋灵、夏，师行十余年不息。迨闻永乐之败，神宗当宁恸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辅推本其意，专务怀柔外国。西夏请故地，以非要害城砦，还之。惇以为蹙国弃地，罪其帅臣，遂用浅攻挠耕之说，肆开边隙，绝夏人岁赐，进筑汝遮等城，陕西诸道兴役五十多所，败军覆将，复弃青唐，死伤不可计。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议，请诏中

外察民妄语者论如律。优立赏逻，告讦之风浸盛。民有被酒狂讹者，诏贷其死，惇竟论杀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⑩

关于宋与西夏之战及其后果，苏轼是有所考虑的。元祐二年（1095），西夏联合吐蕃侵扰宋境，宋将种谊收复挑州，擒吐蕃宰相鬼章，西夏被迫求和。高太后“无意用兵”，准备许和。苏轼连上《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等奏札，陈述自己安边息民之方略^⑪。

对“肆开边隙”所导致的连绵不断的战事，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苏轼是痛心疾首的。他在《王韩论兵》^⑫中认为：

王恢与韩安国论击匈奴上前，至三乃复。安国初持不可击甚坚，后乃云：“意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则臣不可知也。”安国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议以信恢耳。不然，安国所论，殆天下所以存亡者，岂计于“谬巧”哉？安国少贬其论，兵连祸结，至汉几亡，可以为后世君子之戒。

结合史籍的记载，可知苏轼关于“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等议论，是意有所指的。苏轼反对妄生事端，他对相如支持武帝开“西南夷”的贬斥，乃借古讽今，具有当代意义。不可否认，这些议论亦不可避免的染上了党争的色彩。

其三、司马相如“谄事”汉武帝，鼓动武帝封禅，无耻之至

司马相如劝武帝封禅事，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文云：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⑬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禅肃然。^⑭

封禅泰山，祭天祀地，为古代帝王宗教礼仪中最隆重的国祀大典。在汉代人心目中，封禅典礼具有崇高的地位和神圣的意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载：“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⑮太史令司马谈因不得参与汉武帝封禅盛典，“发愤且卒”，临终前执司马迁手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⑯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曾提及封禅一事^⑰，他在去世前作《封禅书》，力主武帝封禅，武帝后终成封禅大典。汉明帝认为：“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浮华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远矣。”^⑱

苏轼称司马相如“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对相如作《封禅书》，建议武帝封禅一事大力挞伐，言辞犀利。但若联系宋真宗君臣当年伪造天书、强行封禅的闹剧，则不难理解苏轼态度如此激烈的原因了。

宋真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举行封禅大典，借此彰显赵宋王朝的天命正统和大一统地位。此次封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封禅，耗资之巨、历时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堪称史上之最。

宋真宗封禅实际上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驾崩。十月，仁宗接受宰相王曾、参知政事吕夷简的建议，下诏以天书陪葬真宗永定陵。苏辙《论御试策题札子二首》其一指出：“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明肃太后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⑲

苏轼兄弟对宋真宗封禅的闹剧是极为反感的，苏轼为此“迁怒”于一千多年前主张封禅的司马相如，并竭力加以贬斥，是可以理解的。

又，宋人林逋曾对司马相如作《封禅书》有所非议。曾巩《隆平集》卷一五《儒学行义》

载：林逋“临终，有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亭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曾无《封禅书》。’……逋之卒，（李）諱时知杭州，为制缌麻服，与其门人哭而葬之。刻临终一绝，纳圹中。既而仁宗赐谥曰‘和靖先生’，仍赐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石。”⑩林逋临终前所作诗及仁宗对他的褒奖，不仅对宋代士风有激励作用，对苏轼评价相如作《封禅书》的动机，亦当有所启发。

苏轼在《三国名臣》中指出：“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¹³此文作于绍圣元年（1094）。在苏轼看来，西汉士人多注重才智谋略，而轻视名声与道义。或许，在苏轼眼里，司马相如即是西汉士人的典型。他贬斥相如，当带有贬斥西汉士风之意。

⁴⁹ 苏轼在《西汉风俗谄媚》中认为：

西汉风俗谄媚，不为流俗所移，唯汲长儒耳。司马迁至伉简，然作《卫青传》，不名青，但谓之大将军；贾谊何等人也，而云爱幸于河南太守吴公。此等语甚可鄙，而迁不知，习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时，士大夫亦有此风，至今未衰。吾尝发策学士院，问两汉所以亡者，难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尽，吾亦尝于上前论之。

苏轼认为，西汉时期，谄媚之风盛行，而自宋太宗朝迄今，士大夫中也盛行此风。文末数句道出苏轼对谄媚之风危害的认识及其试图矫正此风所作的努力。联系苏轼的这三篇短文，不难看出，他把司马相如树为“谄媚”的典型，并展开激烈的抨击，是大有深意的。苏轼抨击相如，意在抨击以相如为代表的一代士风。苏轼“好谈古今得失”，^⑩其文章的字里行间，时时透露出针砭当世的意味。

苏轼的这三篇短文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它们集中体现了苏文“好骂”的特点，火药味极浓，杀伤力极强，引起的反响也极大。⑩时至今日，影响仍未衰歇。

应该指出，这三篇短文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尽管苏轼之论不无偏激之处，但它们却是司马相如其人其作在宋代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环节。研读这些文献，不仅有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认识宋代历史背景、政治文化生态等对

文人创作与批评的深刻影响，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变迁之大势。

注释

① ② ③ ⑩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㉛ ㉘ ㉙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10 页、第
2010 页、第 2011 页、第 568 页、第 29 页、第 2008
页、第 198 页、第 2009 页、第 2012 页、第 2014 页、
第 2042 页、第 2009 页、第 2042 页、第 2009 页。

^④ 房锐《〈听雨楼随笔〉与相如、文君文化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⑤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1~2012页。

^⑥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⑦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98页。

^{⑧⑪} 司马贞《史记索隐》，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6册第657页、第625页、第657页。

^⑨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20页、第2506页、第2339页《西南夷列传》、第2283页、第2332页、第2338页、第1181页《太史公自序》、第2490页。

^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4页《循吏传》、第2688页。

^⑩ 房锐《文翁化蜀对儒学传播的推动意义》,《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⑦⑧⑨} 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9页、第1408~1409页、第848页。

²² 祁和晖《苏轼小贬大崇司马相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7页。

❷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页。

❸ ❹ ❺ 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6页、第1399页孙汝听《苏颖滨年表》、第622页《为兄轼下狱上书》。

❷ 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14~2115页。

²²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612页、第10613页。

^④ 刘南平、班秀萍在《司马相如考释》中认为：

“司马相如为汉朝各民族的融合发展，为汉武帝开疆拓域的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意义显然在于对中国之‘大一统’的贡献，故而司马迁把《司马相如列传》排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非但没有列于《儒林列传》类的传记之后，而且比排在卷一二一的《儒林列传》提前了五卷。这说明，史迁更看重司马相如的政治作为，看重他对汉大帝国固边稳疆、民族团结、政治安定的贡献，其文学作为不过是其政治行为的附属品而已。”（刘南平、班秀萍《司马相如考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❸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870册，第1713页。

❸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二八收录了这四篇奏札，可参看。

❹ 司马相如著，李孝中、侯柯芳注译《司马相如作品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难蜀父老》。

❺ 班固《典引》，《文选》卷四八，第2158页。

❻ 《宋史》卷八《真宗本纪》赞语云：“真宗英悟之主。……及澶州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鵠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宋史》卷八《真宗本纪》，第115页）

❷ 曾巩《隆平集》卷一五《儒学行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1册第153页。

❸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司马相如》云：“相如文人无行，不与吏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无足污简册者，亦无足多责。惟《封禅书》祸汉天下，于身后且祸后世，罪不胜诛。蔺相如威信敌国，名重泰山，犬子何人，亦冒其名。呜呼！禹，圣神也，而有张禹之‘禹’；汤，兴王也，而有张汤之‘汤’；蔺相如，命世人豪也，而有司马相如之‘相如’。故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彼圣贤之名，亦有时不幸，而辱于小人也。”（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286页）同书卷四七《司马相如》

云：“相如素行不谨，立朝专是逢君之恶，或者犹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赋，《封禅》等书，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齿颊间哉！”（第297页）朱熹《楚辞后语》卷二云：“盖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能谅。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朱熹《楚辞后语》卷二，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3页）

（房锐，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接第30页）

张戒、严羽等人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对于宋代为数不少空洞肤廓的说教类作品，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论。但他们严守唐诗矩镬，对苏诗的新变全部抹杀，则失之偏颇。应当指出，哲理的介入不能看作是诗的一种缺陷，以议论入诗也不应笼统地受到责难。诗自三百篇以下，历代诗人不乏议论说理的作品，苏轼只不过是在前人基础上发扬光大而已。尽管他某些作品的确有“伤率”、“伤露”的缺点，但总的来说艺术性是很高的。苏诗的哲理趋归深化了诗的意蕴，提升了诗的境界，其中不少作品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一种透辟见解，给人哲理启迪，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从诗歌发展的流程来看，苏轼哲理思辨的作品从整体上表现出北宋前期诗歌艺术的新变趋势。苏轼的创作实践表明，诗的功用不只在抒情，而还在于达意；诗歌创作不只出于情感的推动，一种哲理的感悟和探索也有诉诸诗歌的权力。苏诗的哲理思辨突破了唐诗以情为主情景交融的艺术范式，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天地。

注释

① 柯勒律治《文学传记》，《西方文论选》下卷。

② 黄庭坚《东坡居士墨戏赋》，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

③ 秦观《答傅彬老简》，见《淮海集》卷三十。

④ 苏轼《南行前集叙》，见《苏轼文集》卷十。

⑤ 《纪评苏诗》卷五。

⑥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一。

⑦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⑧ 严羽《沧海诗话·诗辨》。

（马德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轼乐山遗迹考

唐长寿

内容提要 苏轼乐山遗迹有 11 处之多，可分南宋以前形成的和明以后形成的两大类。它们均有很高的价值，是乐山乃至四川继承和弘扬东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应吸取以往开发保护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文物法》“整旧如旧”的原则，做好现存东坡遗迹的开发保护继承工作，促进乐山的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苏轼 乐山遗迹 东坡文化 保护发展

苏轼乐山遗迹有 11 处之多，可分南宋以前形成的和明以后形成的两大类。它们均有很高的价值，是乐山乃至四川继承和弘扬东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乐山遗迹

苏轼乐山遗迹分布今乐山市市中区凌云山、龙泓山、白岩山、苏稽镇和五通区金粟镇 5 个地点。

(一) 凌云山

该山是苏轼遗迹最多的地点，从文献中可知的有以下 6 处：

1. 清音亭。该亭是最早记载的苏轼乐山遗迹，始见于南宋绍兴年间出知眉州的邵博《清音亭记》中，文载：“(凌云)寺之南山又其胜也。嘉祐(1056~1263)中，东坡先生字其亭曰清音，则又南山之胜也。……余闻旧有东坡遗迹，过而访焉。……旧榜尚存，复置于额，而并刻之石记其事。”到明代，清音亭仍在。明万历《嘉定州志》载：“凌云寺……殿后有清音亭，东坡题，后人重刻。”榜非宋物，或为明人重刻。现存清音亭为 2002 年大佛景区管委会在旧址新建之物，为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亭子。

2. 洗墨池。明袁子让《洗墨池亭记》载：“汉嘉亦有洗墨池。……登凌云寺，又得洗墨池于灵文殿左。池上有桥，桥复与宇。嘉靖(1522~1566)间，郑大夫鼎因而亭其西，至

今杰然为凌云最胜。”清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载道：“由(凌云寺)佛殿左折而上，有小涧跨石梁，坡公洗墨池也。旁为清音亭。”清张洲“游凌云记”载：“登高峰，观清音亭，为层楼，祀东坡苏氏，西向。亭前洗墨池，苏氏所凿。”清同治《嘉定府志》载：“洗墨池，在凌云寺清音亭下，有小涧跨石梁，苏轼洗墨处也。亭前旧有柏，池上旧有松，各四株。种类特殊，离奇磊落，皆千年物。今俱亡。”民国《乐山县志》载：“洗墨池，在东坡楼前，池无水多荒草，以山顶凹下处名之。”池存，2002 年大佛景区管委会维修后，石栏杆装饰繁杂，已非旧制。

3. 载酒亭。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游凌云山，在《吴船录》中记道：“东坡诗：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后人取其语，作载酒亭于山上。”首次提到凌云山上有载酒亭。稍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 1208~1227)有相同记载，其卷一四六嘉定府条下载：

“载酒堂。在大佛寺山上，取坡诗载酒凌云之义。”显然是据《吴船录》而来，只是称“堂”不称“亭”。到清代，载酒亭改建为载酒楼，李调元“凌云山诗钞序”中有载：“遍游凌云及乌尤、大佛、载酒楼诸胜。”至于清代载酒楼的具体位置，民国《乐山县志》指其在凌云寺前。现凌云山登山道右新建的载酒亭，已不在原地了。随便一提的是，新载酒亭匾额及楹联均为嘉州画师李琼久题，可见李琼久书法之功力。

4. 东坡楼。民国《乐山县志》载：“东坡楼，在凌云绝顶，俗称东坡读书楼。盖因龙泓附会于此。挹爽轩杂记：郡为魏阉建生祠，工完而魏败，乃改祀东坡。”清宋鸣琦“凌云山纪游”载：“山有坡公读书楼。……余乃缩俸修读书楼及清音竞秀两亭。落成日即坡公寿辰也。”清陶澍《蜀游日记》载：“数百步至高峰观，为凌云最高处，同游者俱集登楼，拜东坡像，史君疑焉。盖东坡早年读书此山，故像作少年无髯，与他处所刻画有异。”日本教师山川早水《巴蜀旧影》记其游东坡楼所见道：“楼上中央有一佛

龛，里面祭有三苏之像。二子之像是小时候的，头上全结羊角发型，与眉山三苏祠所祀不同。”颇具嘉州地方特色。

道光五年（1825）嘉定府知府李晶移刻苏轼书画4幅嵌于东坡楼外侧廊壁上。到光绪时，东坡楼或又称“坡公书室”、“坡公读书堂”（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似乎不是东坡楼的正规称呼。今存东坡楼为清嘉庆时建筑。2002年大佛景区管委会维修，原两侧廊被封，李晶移刻苏轼书画4幅原刻已不可见。

5. 治易洞题刻。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嘉定州条下载：“凌云山山顶有清音亭，……其下有治易洞，东坡摩崖大字云圣作易，晦其数。刘传吴，识易祖。”明万历《嘉定州志》也载：“治易洞。东二里。凌云山拥翠峰后。宋郡守吴秘题名。洞之前有见易二字，大可方丈。……又有东坡诗。”清同治《嘉定府志》记载雷同：“治易洞，凌云寺后稍右，宋郡守吴秘题名，洞前有见易二字。”苏轼诗载于《永乐大典》：“自昔遥闻太守高，明爻象彖日忘劳。洞中陈迹今如扫，斯道何曾损一毛。”当代人于就日峰上搞建设，该洞遭到严重破坏崩塌，题刻有无已不可知。

6. “苏东坡载酒时游处”摩崖题刻。清初王士禛《蜀道驿程记》载：“（凌云山）壁间多前人题字，有大书苏东坡载酒时游处。”清方象瑛康熙二十二年（1683）《使蜀日记》记道：“十一月十四日……凌云山今石崖刻东坡载酒时游处七大字。”该题刻无款识，但据地方志载，是为明嘉定州知州郭卫宸书（民国《乐山县志》）。题刻位于凌云山登山道左侧集凤峰崖壁上，保存尚称完好。其下另有“仰苏”摩崖题刻一通，无款识。

7. 钓鱼台。位于凌云东南石棠溪西岸。苏轼《初发嘉州》诗末句公自注：“是日，期乡僧宗一，会别钓鱼台下。”清嘉庆十二年（1807）无名氏“钓鱼台记”载：“凌云山后有钓鱼台，东坡钓游处也。”清同治《嘉定府志》载：“钓鱼台，凌云山后石棠溪畔。……苏轼初发嘉州，曾期乡僧宗一会别于钓鱼台下。故其诗云，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现在只知其大略位置，无迹可寻。

（二）龙泓山题刻

龙泓山又名龙岩。明刘春“东坡书院记”载：“龙泓山，真巅平衍皿旷，有洗墨池焉。……烂柯岩洞者，东坡墨刻也。……此当为公潜隐之地。”万历《嘉定州志》则载：“烂柯洞，在八仙洞北，有东坡大书烂柯岩洞四字并诗。洞旁有金蟹池，石上刻此三字，亦东坡书。”由于

上世纪后半叶的建设，现在龙泓山只剩清代重建龙泓寺一座、东汉崖墓及唐代佛教摩崖造像残迹。苏洵有《游嘉州龙岩》诗，当是嘉祐四年（1059）携苏轼兄弟游龙泓山时所作。另外，苏轼有《烂柯洞诗》：“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请君时向岩中座，一日真如五百年。”均佐证了苏轼游过龙泓山，更不消说“梦中却到龙泓口”的名句了。

（三）白岩山“程公洞”碑

在乐山城北，有东汉崖墓改造成的三个洞——白岩三洞，分别称白云、清风、朝霞。三洞中均有摩崖碑刻，共约40通，时代从宋至清。王象之《舆地纪胜》对此有多处记载，或称“白崖院”，或称“三洞”，或单列出“白云洞”、“清风洞”。其中白云洞碑刻中有一通“程公洞”碑，碑载：“程公望寓白崖院注易，苏文安公尝携二子过之。永嘉陈公谦题曰程公洞于清风、朝霞之间。后十八年，石泐字剥。资中张方祥刑暇日访古，惟白云洞苍遂可避暑，仍大书刻之。嘉定十五年（1222）六月廿五日。”该碑距今已有791年，是与苏轼相关的最早的文物，保存状况尚可，是乐山苏轼遗迹中最为珍贵的文物。

（四）苏稽镇东坡亭

清释彻中《朝峨眉山记》载：“宿苏稽东坡亭。故为苏廷读书处，即眉山始祖。后人建东坡亭于上，今废。有茅刹。”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窦炯《游峨眉山记》载：“乾隆七年（1742）憩苏稽镇，唐苏谪居稽留于此，后人建东坡亭其上，遂传为东坡读书处。亭今废，仅留茅刹。”东坡院在苏稽南临江河南岸杨军坝小山上。笔者20年前调查，东坡院只留其名，有尼主事成为尼庵，已非古刹也。

本来，苏稽得名就传说因苏轼之故，明万历《嘉定州志》载：“苏稽山……东坡曾稽古于此，故名。相传明成化中，有掘地得其遗砚，为督学王公敕取去。……苏溪，西二十里。苏稽铺，皆以苏名，重东坡也。故郭沫若有‘苏溪弄筏口占’诗道：‘此地存苏迹，可曾载酒来。’

（五）五通桥区金粟镇三圣石题刻

清乾隆《犍为县志》载：“三圣石在三圣驿，有眉山苏东坡与弟子由舣舟游处，题小绝于崖。”清嘉庆《犍为县志》补充道：“其诗宋时因禁凿去，今凿迹犹存。”金粟镇旧属犍为县，俗称磨子场，传说场外观音岩下岷江中有巨石如磨子，冬春水落见于二层水中，故名。笔者实地调查，因河道河床变迁，水位变化，造成磨子石没于水中，宋代当高出水面。笔者推测此磨子石或许就是三圣石。

（下转第57页）

论苏轼的治盗

彭林泉

内容提要 苏轼认为密州和徐州的贼盗严重，其原因是干旱蝗虫、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变革执行中的问题造成的，在打击甚至镇压贼盗的同时，应采取宽政利民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贼盗”产生的条件和土壤，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实践中，苏轼采取了寻求政策扶持、惩治贼盗、组织抗旱救灾和反对“手实法”的推行等措施。苏轼的治盗观及其实践，于今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苏轼 治理 贼盗 观点

苏轼在密州和徐州作知州时，先后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徐州上皇帝书》等诗文中，提出了治盗的看法。这不仅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一些苏轼的传记作品在描述苏轼在密州和徐州的人生故事时，简要叙述了苏轼在密州治盗的过程及初步效果。^①有论者也提到苏轼的治盗内容，如有的在谈到苏轼在密州的经历和政绩时，认为苏轼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盗之策。^②但未作具体分析。更多的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分析苏轼这两篇文章，如浦起龙评说《徐州上皇帝书》认为“弭盜是一篇大旨。地势民风，通盘会算。文凡四转关，前见近虑，后见远略，周密而宏大。苏家文大抵多纵横习气，独此朴老坚实。”^③也有论者提到这篇文章的思想，认为是仁者之言也。^④可以说，迄今为止，鲜有从法律的角度研究苏轼的治盗观。本文将详细分析苏轼治盗的背景、内容、实践、原因和意义，以促进对苏轼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宋代的贼盗重法

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文中，提到“贼盗渐炽”，也就是贼盗日益猖獗。这涉及当时的盗贼重法，是苏轼提出治盗的法制背景，有必要作一介绍。

据《宋史·食货志上六》记载，熙宁间“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渐增”，指出了河北等地的严重自然灾害。《宋史·神宗纪二》“丁未，立京东、河北盗贼重法。”丁未：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立：创立。按照京东、河北盗贼重法的规定，凡是犯了抢劫强盗罪应处死刑的，抄没他的家产，赏给告发他的人，妻室儿子编置到千里以外，如遇因水旱灾害而发布减刑的赦令时，本人可以减死刑配到远恶地区。罪当判处刑、流刑的，刺配到岭南，服流刑的罪犯适逢赦令降等处罚的，配往三千里，抄没他家产的一半作为告发者的赏钱，妻子儿女依次降等处理。应被刺配编置的，虽然遇到大赦，也不移地不释放。凡窝藏罪犯或罪赃的窝家，如劫盗本犯是死罪的，那么窝藏情节严重的处斩刑，其他情节的都刺配到远恶地区，抄没他们家产的一半作为告发者的赏钱。本犯盗罪当判徒刑、流刑的，刺配五百里地区，抄没他们家产的三分之一作为告发者的赏钱。三次犯盗窃罪的，处杖刑并发配五百里，或相邻的州。虽然不处在重法地区，但窝藏适用重法的犯人，也按照重法论处。重法地区的知县、捕捉盗贼的官员都要任用举人，或任用武官作为县尉。盗贼十人以上作案，在期限内捕捉不到一半的，就要检举有关官员的罪名报朝廷处理。如果贼盗又杀死官吏，以及累及杀害三人，烧毁房屋

百间，或者结伙作案于州县之内，在江海之中抢劫船的，即使不是重法地区，也要以重法论处。⑤

这里的“重法地”，按照我国法制史学者的解释，适用于判处贼盗罪行的特别刑事法规的地区，始于仁宗嘉祐年间。宋代自仁宗嘉祐以来制立并颁布贼盗重法，严厉惩治贼盗的窝藏者，同时也规定了重法适用的地区，名“重法地”，重法适用的对象，称为“重法人”。神宗元丰年间，在贼盗重法中创立了有关妻子编管的条文，用于编配和管束贼盗罪犯的家属。

上述规定与宋仁宗时的“窝藏重法”、宋英宗惩治贼盗的“重法”相比，更为系统和详细。宋仁宗时《窝藏重法》。将贼盗犯罪的窝主或者窝藏犯，作为惩治的对象，以解决“盗贼不戢”的问题。治平三年，宋英宗制订了惩治贼盗的“重法”，不仅把重法地的范围由应京畿扩大到京东河北的一些州县，而且还连坐家属，籍没家产。宋英宗在治平三年降诏：“开封府长垣，考城、东明县并漕、濮、澶、滑州诸县，获强劫罪死者，以公所当得家产给告人，本房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管者，遇赦毋还。”即是明证。神宗时创立的京东、河北盗贼重法，不仅扩大了重法地的范围，而且增立了重法人之法，使重法统治更突出。宋仁宗嘉祐时的“窝藏重法”只选用于开封府诸县，英宗时的“盗贼重法”扩大到京东河北部分州县，神宗时的盗贼重法，除适用上述地区之外，又扩大到淮南、宿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兗、郓、沂、淮阳军等地。也就是说，重法地的范围，不断有所发展，至神宗元丰年间，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都推行重法地法。而且宋神宗元丰时制订的贼盗重法，可适用于全国的任何地区，即无论“重法之人”的犯罪活动发生在什么地方，一经捕获，便依重法地内的惩罚标准论处。不仅诛杀本人，同样籍没家产，株连骨肉。“重法之人”罪名的确立，使重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镇压作用。至宋哲宗时，重法发展到了顶点，在全国二十四路中已有十七路为重法统治地区，可以说此时的重法已成为北宋统治全国的基本形式。在重法内容上，从神宗元丰时重法地内的劫盗五人，“凶恶者，方论以重法”，到哲宗绍圣时则

“（重法地）有犯即坐，不计其数”，到元符时又规定，凡藏匿强盗，资给或走漏消息者“并罪至死”。重法内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北宋重法统治的不断完善和强化，反映出北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演变。⑥这在当时并对南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苏轼的治盗观

从苏轼的奏议等诗文来看，苏轼的治盗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密州和徐州是要地，事关国家安危。因此不能不防盗。苏轼在文中多次提到河北、京东和徐州等地，按照我国学者的考证，宋时的河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和河南黄河以北地区。熙宁六年分为河北东、西两路。宋时的京东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全境以及江苏北部徐州等地区。熙宁七年分为京东路、西两路。密州属于京东东路，当时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5县，相当于现在山东省的诸城、安丘、高密、胶州、胶南、日照、五莲、莒南、莒县等9个县市。在宋时，全国曾经分为二十四路。苏轼认为，密州地处京东，是腹心之地，这里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而徐州处于南北要冲地带，地势便利，兵民强勇，是京东诸郡的安危所依。特别是徐州东北七十余里的利国监，自古以来就是官府的治铁矿场所，四方商贾汇聚，使本地百姓富足快乐。监下所属共计三十六冶，冶户都是富豪大家，家财百万，常常成为盗贼窥视的目标，事关徐州和京东的安危。盗贼的存在和窥视对这里的秩序也是威胁。然而这里的兵力稀少，防卫薄弱。在利国监所产之铁可以运往河北的情况下，应组织冶户，同时把南京新招的骑射两指挥军队移驻徐州，加强对利国监的防守力量，此外，采集石头，修筑城墙，使利国监成为不可窥视的目标。这样徐州便无事，徐州无事，京东也就没有顾虑了。这是认识的深化。在密州时，苏轼认为，自古以来，建立法制，制定刑罚，都以禁止贼盗为急切问题，贼盗活动不停息，一定会出现强取劫掠，强取劫掠不停息，一定会导致战争，或者凭借豪杰之人的本性，而导致陈胜、吴广

大规模起事的势头。更何况京东地区的贫富状况，与河北地区休戚相关，河北地区的治乱状况，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安危。在苏轼看来，京东地区是在物力上支援河北的后方，而这一地区的民众惯为盗贼，为患最为严重。而在徐州，苏轼把徐州与密州以及河北联系起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指出了密州和徐州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揭示两地容易并且已经受到盗贼的威胁。

(二)密州和徐州的盗贼状况，令人担忧。贼盗，通常有三种含义，指偷窃、劫夺财物的人；指偷窃、劫夺财物；指阴谋祸乱。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诗文中，通常在前两种语境下使用这一词语。虽然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徐州上皇帝书》等诗文中，没有列出盗贼的具体数字，但从文中的表述、用语或列出的现象中，仍然可以看出两地特别是密州盗贼的严重情况，如“盗贼渐炽”、“盗贼蜂起”，这反映了“贼盗”在这些地区的产生、蔓延或发展，看到盗贼问题的严重性，尽管这有模糊性。公元1078年，由于连年灾荒，“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大意是，盗贼在各地的囹圄皆满，病死者不少。在苏轼看来，各处的盗贼大多是有罪被按问，又因灾害被减等处罚的免死之人。他们回归旧地，怀恨报仇，为害作恶最为严重。盗贼自知不会处死，即轻易违法犯罪，而一般民户也担心其再来报复，所以不敢告发，由此造成了盗贼公行。他们或多聚徒众，或广置兵仗，或在服装上标新立异，或绑架劫掠主人，或驱赶缚执一般的人，或贿赂贫民令其作耳目，或在路边店旁书写文告以惊动官私之人，如此行为，虽然不伤害人命，但罪行累累。在徐州，盗贼常常窥视富足的治户，而出自逃兵的盗贼，使农民望而害怕，因为其技艺精干，而罪责严重。

(三)盗贼主要是连年灾荒造成的，也与官府的横征暴敛等因素有关。可以说是天灾人祸相互作用的结果。苏轼认为，盗贼主要是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在密州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近年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遇到了少见的、严重的干旱和蝗虫灾害，影响了粮食的收成，使农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导致盗窃

滋生。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写道：

“今中民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饿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⑦意思是今日中等以下的户民，大凡都缺乏食物，违法而去为盗就要处死，害怕法律而不去为盗就受饥寒，饥寒之死与违法弃市，两者均是死亡，而不死的与忍受饥饿的，其死亡之祸到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即使每天杀掉一百人，也不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这揭示了农民沦为盗贼的原因，是由于连年灾荒所致。苏轼担心，今年数千里的范围内小麦无收，百姓逃散流移将向何处去，只恐怕这些良民会举事为盗。一些地方官员对受灾农民的冷漠，变革执行中的问题或者说官府的横征暴敛，以及具体制度的缺陷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导致其走投无路，沦为盗贼。例如，近年来河北、京东这些地区的盐课税额日益增加，这两路盐课的原本是三十三万二千余贯，到熙宁六年已增至四十九万九千余贯，由此可以看出，盐制刑法日益严厉，告发捕捉的条例日益繁密，由此导致下层小民越来越难以贩卖食盐。在朝廷征收盐课数量浩大，告发违法的人多如麻，但偷税被告发就罚重出赏钱，正常纳税则获利低微，要再去干农活又正逢凶灾之年的情况下，如果不为盗窃，就只有忍饥挨饿，因此，这五六年来，盐课利税日益增多，而盗贼也日益多起来，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苏轼进一步指出，京东恶盗积弊致盗的原因。

(四)对严重的盗贼，应严厉惩治。这是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文中提出的防治盗贼策略的一个方面。苏轼认为，对“乐祸不悛的凶残之党”，应“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意思是对好为祸患并坚持不改的党徒之人，应颁布新赦令，杀一儆百。对京东的大恶盗贼，也应如此。对在灾荒中铤而走险，恃强行劫的强悍者，要缉拿，坚决打击，用苏轼的话来说，要“磨刀入谷追穷寇”。苏轼甚至主张一定程度上的法外治盗。他说，“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

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懦懦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之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略其小过，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如徐、沂、齐、曹之类，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在苏轼看来，盗贼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地方守臣权力太轻的缘故。有时，因为制度上的缺陷，连守臣的职位都保不住，哪会拼死力去监捕盗贼，破获奸邪之人作的大案。他主张加重地方守臣的权力，要求他们按大纲办事，不必计较小小过失。凡京东路盗贼多发之郡，自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该谨慎地选择守臣，准许其法外惩治强盗。提出多给他们些缗钱，使他们能够安排自己的耳目之人，蓄养爪牙势力。并提出解决缗钱的渠道。可见，苏轼提出了法外治盗的执行主体（地方守臣）、权限（按大纲办事）、对象（强盗）、地区（京东路盗贼多发之郡，自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和经费等，这是形势所迫，是维护地方治安的客观需要，是超常的举措，对于打击强盗，控制局势有利。但是，这对于一个知法懂法的地方官员和司法官员来说，也是有风险的。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法令的范围，在执行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实际上，应如何法外治盗，苏轼本人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只是认为这也是防治盗贼的一种方法。此外，苏轼提出应区分情况，分别处理。对因缺乏食物图一时劫到粮食的和不伤害人命，但罪行严重的盗窃要分别处理，从今以后，对盗贼赃证不明确，只是已经拷问掠打开始承认其罪行者，一律不得再行查问减等处罚。在遭受灾害的地区，委托长吏等官员，具体考察犯罪情理的轻重，情理严重者，依法执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凶残之民稍有畏忌，使善良之民敢于告捕。

（五）宽政利民，综合施策。在惩治盗贼的同时，苏轼也清醒地认识到，光靠打击甚至镇压是不行的，因为民穷必反，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盗贼产生的条件问题。为此，苏轼主张宽政利民，给农民一条生路，以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应通过赈灾、放税、取消盐禁，录用当

地人才等措施来预防盗贼。面对密州干旱蝗虫的严重灾情，苏轼请求朝庭豁免秋税，或者暂停回收青苗钱，以资救济。苏轼认为，应根据灾情除放赋税，不再按常规检验考查。如果不按这样的方法实施，应将今年夏税应征粮食的数量，参考以前五年中平均一年应征税的实际价值，令三等以上户任便交纳现钱或交纳正色赋税，待以后再交，使下层小民不致于大批流离失所。苏轼提出对河北、京东两路应下令，规定贩盐的贫下小商，以贩盐三百斤以下为限，权免除收税，这样对贫民来说，有衣食谋生之路，对富民来说无盗贼不患之忧，由此可以减轻对朝廷所带来的忧虑。从去年租额的增加（二万贯）和其中捉贼赏钱的支出数额（一万余贯）以及没有捉获的贼盗还有很多，可以看出盐利的得失。前提是不实行食盐专卖。苏轼认为，在河北、京东地区，官府从来不专卖食盐，下层民户指望贩盐为生。近来，有臣僚提出专卖食盐的建议，但没有采纳，这使两路的官员百姓高兴。这有先例。在仁宗天圣中期，蔡齐任密州知州时，当时东部地区发生饥荒，蔡齐请求取消盐禁，仁宗听从这一建议，使东部一方之人，感觉不到饥饿和干旱。苏轼提出，为五路之人，即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陝西路之人，不通过通常的诗赋、经术选人取士，因为这五路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豪杰角逐之场，这里的人勇猛强悍，可以胜任大事。但是在学习声律、研读经义方面，与吴、楚、闽、蜀等地的士人有所差别，会影响他们进用。应采用唐末，使北方五路的监司郡守都选拔当地人士以补充牙校之职，都依据人才录用，督责他们去管理当地村镇的税场事务以及掌握捕捉盗贼之类的事情。

这些内容是建立在历史知识和实地考证的基础上的，具有综合性，构成了一个整体。

三、苏轼治盗的行动

苏轼在密州上书中提出的治盗意见，没有被朝廷采纳，这是一个遗憾。但他并没有灰心，在徐州任上，经过实地考察后，苏轼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写了《徐州上皇帝书》，继续提出建议，仍然没有被采纳，达到他的目的。

但苏轼在密州和徐州特别是密州任职期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落实治盗的建议，实践他的治盗主张：

首先，寻求政策扶持。在前面分析苏轼的治盗观的内容时，已经谈到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文中提出的政策建议，如赈灾、除税，取消盐禁。苏轼到密州上任后不久，还上书韩丞相，即《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如实反映当地的灾情，为民请命，要求斟酌情况，减免一些秋税，或暂停回收青苗钱。否则，那啼饥瘦弱的老百姓。早已饿死在沟壑里面去了。

其次，惩治贼盗。针对“盗贼蜂起”的情况，苏轼制定周密的缉盗方案，“磨刀入谷追穷寇”，惩治贼盗，维护地方秩序。这是苏轼作为地方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责任。在密州任上，他基本按照《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文中提出的治理盗贼的策略来做。如针对近年来连遭饥荒，杀人劫财常常发生的情况，到任后，就出了告示，宣布奖赏办法，只要抓住盗贼送来，立即兑现赏钱。这提高了老百姓求赏的积极性，又助人向善，减少和控制了强盗。对于朝廷因灾害减少抓住一个该判处死刑和发配到远方的强盗的赏钱（前者下降一等，从五十千赏钱下降到二十五千赏钱；后者减半，从二十五千赏钱下降到十二千五百赏钱），苏轼认为，这不利于打击盗贼，因为抓贼有难度，而且有生命危险。而今大灾之年，更应抓紧打击。（见苏轼《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

第三，组织抗旱救灾。他在实地调查，掌握灾情的基础上，组织民众灭蝗抗旱，生产自救，同时多方采取措施，处置天灾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他从访问农夫野老中，吸取生产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坚决铲除蝗害，在春暖之前，广泛发动民众以火烧土埋的办法群起捕杀幼虫，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群众，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仆”。苏轼还参与捕蝗救灾。他在《和赵郎中捕蝗见寄》一诗中，记载了此事：“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天公独何意，忍使蝗虫发。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他甚至还到常山求雨，以缓解旱情。

第四，反对“手实法”等一些可能加重农

民负担的变法措施。苏轼认为“民非独病旱蝗也”，手实法、方田均税等对农民有害。当时，朝廷正在推进手实法。苏轼在密州上任后不久，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一文中，陈述了方田均税及手实法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危害。手实法是吕惠卿采用他的弟弟吕和惠的建议制订的。“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价，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审息立等，凡居钱五当审息之钱一。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也就是说，这一法令规定老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籍等高低，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了防止有人少报，更明确宣布，奖励知情人告发。⑧苏轼极力反对，认为此法存在弊端，严重扰民，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吕惠卿力行手实法，由他直属的司农寺下达命令，地方官如果不实行该法，将以违制论罪。苏轼据理反对，说：“违制之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从？而现在竟由司农寺发出这样制裁百官的命令，难道不是擅自立法吗？”新法使者说，公请从缓。不久，手实法即被废除。手实法未在密州各县执行。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控制了密州的各种灾情，维护了社会治安。

四、“惟有悯农心尚在”

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文中指出，臣看到河北路、京东路地区近年以来，蝗虫灾害相仍，贼盗日渐猖獗，今日又加上天不下雨，自秋至冬，方圆数千里的范围内，小麦不能下种，臣预料明年的春夏之交，寇盗为患的程度会比今日更为厉害。所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道出了写作此文的缘由。写作《徐州上皇帝书》等诗文时，也是如此。从中可以显现苏轼治盗的动机。

苏轼之所以提出上述治盗的观点，并在任职的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对受灾害受苦难的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怜悯、理解和关爱之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这决不是偶然的。

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到密州上任。上任二十多天后，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一文中说：“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

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此京东余波及淮浙者耳，而京东独言蝗不为灾，将以谁欺乎？”这叙述了他见到的密州境内的严重蝗灾情况和一些官员的冷漠，以及他对此的不满。当时，密州正遭遇连年大旱、蝗灾泛滥，老百姓的生活早已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蝗灾影响了粮食的收成，也是导致盗窃滋生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农民因灾致贫，无法生存，在走投无路中，沦为盗窃。而当时的一些变法措施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加剧了百姓的穷困。

生活的贫苦也加深了苏轼对民众苦难的理解。与苏轼在此之前任知州的杭州相比，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在此生活确实艰苦了许多，也寂寞了许多工作。他感叹“寂寞山城人”，而且苏轼在密州，因灾情严重，生活困苦，采杞菊以食。苏轼在《后杞菊赋》序中写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意思是：我做官做了十九年了，家庭日益贫困，衣食穿着，还不如以前。这次来到密州，想想饭总能吃饱，谁知厨房里冷冷清清，整日里愁眉苦脸的。随后每天和通守刘廷式沿着城墙，在荒废的菜园里找杞菊来吃，相对摸着肚子大笑。在文中，他借宾客之口自嘲，并描述太守的寒酸窘迫：唉，先生。谁让你坐在堂上，还叫做太守。前有宾客请你吃饭，后有手下官员跟从。早上到衙门一直到中午，傍晚一直做到酉时以后，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喝过一杯酒，就是拿草木骗自己嘴巴。对着饭桌，时时皱起眉头，拿起筷子，却难以下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糗（qiǔ）指炒熟的米、麦，有的认为是干粮。这里代指粮食。这是诗人对生活窘迫的描述，有夸大的成分，但生活困苦是事实。

让他难以释怀的是，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

女抛弃道旁。为此，苏轼心情非常沉重，经常“洒涕循城拾弃孩”。在天灾人祸交加的情形下，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超然台记》）的局面，百姓们更是“比岁饥殍凋残之余，不复堪命”（《祭常山神祝文》）。目睹此情此景，苏轼不禁发出了“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感叹。⑩

在《雩泉记》中，苏轼说：“今民吁嗟其所不获，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闻于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轼以是愧于神。”苏轼筑雩泉是为了“勉吏”，特别是为了自勉：要关心民间疾苦。在《次韵章传道喜雨》中，苏轼表现了急农夫所急，喜农夫所喜的感情。这些情形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对盗贼的态度。思考治盗的策略，在他的治盗观点和行动的背后，是苏轼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这是其治盗的理论基础。这与苏轼早期在历史政论中，提出的结民心有关。在治灾和治盗的过程中，苏轼与密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写到：“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五、苏轼治盗的意义

苏轼的治盗观和实践，在中国法制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不该忘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治理盗窃，也有启示。

“贼盗”问题是一个相对古老而崭新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贼盗”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景况。在不同时代，统治者和学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社会矛盾或阶级斗争尖锐时，更是如此。

从刑法史的角度看，宋初以来，统治者始终将打击的锋芒对准“贼盗”等严重犯罪，以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在北宋统治进入中期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贼盗日趋严重，统治者在惊恐中，加重了对“贼盗”的惩治。这不仅表现在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方针上，也表现在对“贼盗”的严厉惩治甚至镇压的立法和司法上。贼盗重法或者说重罪治盗，就是这样一项重大的司法措施。前面我们已经叙述了贼盗重法的产生、主要内容和影响，这里不

再累叙。一些重臣名将面对在全国出现的“盗贼”充斥，处处峰起，“前贼虽灭，后贼更多”的情形，在惊呼“天下之祸患，岂不可忧”之后，纷纷提出“不可以常法治之”，要求别立法禁，“法外断遣”，出现了“惟严刑峻法以临之”的状况。这种情形延续到了南宋。南宋孝宗年间，号称治平，但对“贼盗”的防范和惩治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据史料记载，宋代贼盗罪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包括谋反、叛逆、谋杀、劫囚、造畜、蛊毒、造妖书妖言、强盗、盗窃、恐吓、取财等多方面的犯罪。《宋刑统》所附敕文对于这些犯罪的惩罚明显重于唐律。例如，与唐律相比，宋太祖建隆年间贼盗律的变化，只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减而从轻，对于武装的集团性的强盗、窃盗案加重处罚，以达到防范反逆的目的。另外，编敕中还有大量重惩盗贼罪的规定。宋哲宗元符年间，待御史陈次升在分析宋朝的法律时，说“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罚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②意思是祖先的仁政，广布于天下，对于苛重的刑法，改而从轻的很多，只有关于惩罚强盗的法规，特别严重，这是为了严禁奸邪而施惠良民。这揭示了重法治盗的原因。与宋以前的法律相比较，宋朝的处刑从许多方面来看未必皆为从轻，但对于“贼盗”之法，也即对于谋反、杀人、劫略、窃盗罪的处刑，大为加重，这是事实。贼盗重法是明显的例证，它充分体现了宋朝的严刑峻法的一面。这些规定不仅承继了秦朝的重刑规定，并有所发挥，而且在以后，如明朝也出现了重罪治吏的规定和行为，这似乎有着内在联系。

贼盗重法有一时的功效，对于控制局势和维护秩序有帮助，但也可能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换来抗争。对此，一些有识之士有清醒的认识。苏洵说：“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③刘敬《患盗论》说：“律使窃财者刑、伤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盗不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无以生，谓坐以待死，不若起而图生矣。”^④哲宗元祐六年（1091）礼部侍郎范祖禹对重法地法也提出了异议，说

“熙宁以来，州军别立盗贼重法，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多耳。”^⑤这些与苏轼对治盗的看法有相同之处。

在贼盗重法的大背景下，苏轼作为地方官员和司法官员，在对待盗贼上存在两面性：一方面，要依法办案，维护地方治安，这是他的职责，表现为打击甚至镇压贼盗，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面对人民的反抗，苏轼是赞成加强镇压的^⑥；另一方面，他又对人民、百姓，准确地说对绝大多数农民，怀着情感，同情、理解他们，设法解决他们的生存和贫困问题，消解使民为盗的条件。因为他深知民穷必反的道理，试图从根本入手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他认为，大荒岁月对于广大的穷苦百姓来说，“冒死而为盗”固然可能一死，“畏法而不为盗”也难免饥饿而亡，不少人“相率为盗”，正是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盗之法”，终究是治标而不治本。只有宽政利民，给人民一条生路，才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⑦于是，针对现实，特别是“盗贼渐炽”的情况，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盗贼的成因，提出了相应的治盗之策。这与单纯的惩治不同，不仅有打击，也有预防，包括救助，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盗窃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由此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惩、防体系，并付之于行动，在任职的地方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说，进行了一次标本兼治的尝试。呈现出治盗为秩序，也为民生的法制图景。如果说，要概括为一个名称的话，可以称之为苏轼式的治盗。从这个意义讲，苏轼的治盗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此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在执行当时的贼盗重法或者重典治盗的过程中，也有局限性，如在重灾中，主张加大打击贼盗的力度，还提出了法外治盗的看法，这是应急的策略和措施，也可能带来对法制的损害，扩大打击面，这似乎存在矛盾，其实也好理解，这与他的官员身份和角色有关。这是客观事实，不应否认，也不应苛求。

此外，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盗贼是强盗和小偷的总称。其实，它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藐视、贬低、排斥、打击，从词性上

讲，是个贬义词。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是盗贼成为加重打击的对象时，作为地方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苏轼自然无法超越，这一点，应表示充分的理解。

总之，在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苏轼提出了他特有的治盗观，并付之于行动，不仅体现了他的良知和担当，也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治理盗窃也有启发。

注释

① 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水照、朱刚《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曾枣庄《苏轼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参见 <http://www.msta.gov.cn/ygzw/zwxx/system/2007/05/25/000004201.html> 访问时间 2013年5月8日。

③ ④ 曾枣庄主编《苏文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3页、第293页。

⑤ ⑥ 高潮、马建石主编《中国刑法志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419页、第421页。

⑦ 蒋传光著《中国法律十二讲》，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49页。

⑧ ⑨ 《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7页。

⑩ ⑪ 王水照、朱刚《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第94页。

⑫ 参见 <http://tieba.baidu.com/p/1800100018>，访问时间2013年5月18日。

⑬ 参见 <http://tieba.baidu.com/p/1800100018>，访问时间2013年5月18日。

⑭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页、第247页。

⑮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6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⑯ 刘敬《患盗论》。

⑰ 《古今治平略》。

⑱ 曾枣庄《苏轼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彭林泉，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专委、高级检察官，东坡司法法学研究所所长)

(上接第49页)

二、乐山遗迹分类

笔者以上罗列的苏轼在乐山遗址共有11处之多，也算洋洋大观。正如明袁子让《洗墨池亭记》说“古词人墨客，为世所重，所寄迹之乡，山水俱有荣焉。玉山珠泽，理固然也”。

经笔者实地调查并仔细考察其内涵，认为11处遗迹大体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有文献可稽的苏轼当年足迹到过而以后人的纪念形式留传至今的遗迹，形成时间较早，一般在南宋以前，属于这一类的有凌云山上的清音亭、载酒亭、治易洞题刻、龙泓山题刻、白岩山“程公洞”碑刻、钓鱼台、三圣石题刻等。这一类遗迹中，有的已完全消失，如治易洞题刻、龙泓山题刻、三圣石题刻；有的以建筑形式寄存下来，如清音亭、载酒亭，该建筑一般不是古建筑。只有白岩山“程公洞”碑刻以原有的文物形态保留至今，殊为难得。

第二类：主要是因苏轼有关乐山诗歌及民间传说形成的遗迹，时间较晚，一般在明代以后，属于这一类的有凌云山洗墨池、东坡楼、

“苏东坡载酒时游处”题刻、苏稽镇东坡亭。这一类遗迹中，有的已完全消失，如苏稽镇东坡亭；有的经历代重建重修后保留了下来，如凌云山洗墨池、东坡楼和“苏东坡载酒时游处”题刻，三者并以原有的文物形态保留了下来，十分难得。

笔者认为，这11处遗迹不管它们内涵、现状如何不同，均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是乐山乃至四川继承和弘扬东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开发保护工作中，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如2002年大佛景区管委会对东坡楼的维修，把原两侧廊闭封，造成东坡楼形制的变化外，还使李晶移刻苏轼书画4幅原刻不可见。至于因经济建设造成苏轼遗迹的毁灭，则是永久的遗憾了。

今后，为传承弘扬乐山的东坡文化，地方政府应吸取以往苏轼遗迹开发保护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文物法》“整旧如旧”的原则，做好现存东坡遗迹的开发保护继承工作。尤其对本身就是古建筑的东坡楼等更应如此。此外，对已经消失的东坡遗迹可以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恢复，如在苏稽镇东坡院中，就可重建东坡亭，以寄存苏轼在苏稽的信息。又如五通桥区金粟镇就可在镇中适当地点立一石碑，镌刻“苏东坡与弟子由舣舟游处”等内容，使五通桥区也有“苏东坡”。笔者认为，乐山地方政府只要深刻认识到“苏轼”这一文化符号的永世价值，并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必能提高乐山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有力地促进乐山的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唐长寿，乐山市文化局副调研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关于战略苏学家的概念、素质与使命 ——学习《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的体会

孟昭全

内容提要 阐述了战略苏学家的概念、素质和使命，提出了加速苏学发展的八点建议。

关键词 概念 素质 使命 建议

一、引言

2011年第10期《科学学研究》(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合办)杂志发表了谭红军、郭传杰、霍国庆的《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论文。该文通过对战略科学家概念、评判标准和领导力的综合研究，提出了关于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的十条假设，在科学家传记分析、数据调查和假设验证的基础上，就战略科学家的领导力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战略科学家的领导力模型及其关键要素指标。

基于苏学也是科学的认识，以此类推，拟就战略苏学家的概念、素质和使命进行探究，并进而提出相关建议。这仅是个人见解，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概念

什么是战略苏学家？要弄清这个问题，请先来看看谭红军等先生对战略科学家的概念是怎样定义的：

关于战略科学家的概念内涵，目前只停留在称谓或名称上，而其实际内涵并没有得以严格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和阐述。经综合检索，发现涉及领袖型科学家、战略科

学家与科技将帅才能力体系的阐述者主要有张九庆、路甬祥、郭传杰、方心、范维澄、何祚庥、阎康年等人，其关于战略科学家的阐述或相关概念特征的阐述，分类梳理后，战略科学家概念的基本特征内涵可挖掘为如下五点：

(1) 对科技(学科)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其成就为社会所公认，能引领与指导相应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2) 有战略眼光，统观全局，善于把握人类社会或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与科技发展规律，洞察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善于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实施，有着卓越的科技领导能力。

(3) 具有跨越多学科的知识素养，创造力强。

(4) 善于培育、激励、造就大批科技优秀人才，领导科技研究团队，或组织持续创新，形成科技持续竞争优势。

(5) 有求真唯实、有执著的科学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因此，战略科学家的基准定义可为：战略科学家是有跨学科知识素养、科技创造力强、有战略眼光、能引领学科持续发展，并以科技创新成就为人类文明或社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为社会公认的杰出科学家。

“概念”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原理的抽象，是从整体上对一个复杂对象的概括和把握。在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会改变人们一系

列做法，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效果。因此，研究概念非常重要。我所以全文引用战略科学家的定义，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苏学也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苏学家也应属于科学家的范畴。原则上讲，给战略科学家下的定义，也适用于战略苏学家，只要把文中的科学、科技等改为苏学就行了。当然，苏学有他的狭义性，范围很小，但我们可以紧密结合苏学的情况，举一反三，为战略苏学家下出相应的定义。本人初浅认为：战略苏学家是具有“战略科学家”那样的人文素质，对苏学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具有战略决策能力，能引领苏学可持续发展的杰出的苏学专家学者

三、素质

《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作者对战略科学家的素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绘制了战略科学家领导力模型，列出了战略科学家领导力二级指标要素图表，对我们研究战略苏学家的素质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战略科学家的素质进行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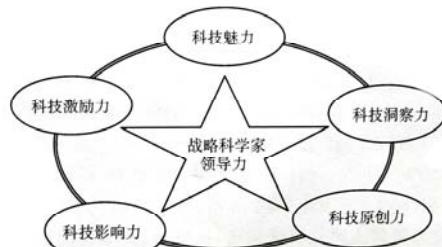


图3 战略科学家领导力模型

科学·学·研·究					第29卷
表3 战略科学家领导力二级指标要素					
科技魅力	科技洞察力	科技原创力	科技影响力	科技激励力	
科技理念/思想	战略概念/思维	科学兴趣	愿景激励	科学权威	
科学信念/精神	社会需求分析	专业知识	价值观念激励	科学模式	
科学伦理/道德	普遍规律把握	哲学思维	动机激励	战略咨询	
科技人物/特质	科技环境分析	科学锁相	资源激励	学科行业	
科技成就/贡献	科技需要构建	科学方法	环境激励	社会声誉	

《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作者指出：“对战略科学家来说，应有崇高的科学信仰和理想追求，崇尚科技为人类、为国家谋福祉；应有追求真理，不被经验束缚，敢于怀疑一切，不迷信权威，勇于捍卫科学真理，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敢于面对挑战的豪情与勇气，具有良好的人格特征，具有好的个性修养，遵

守科学伦理与道德；有卓越的科技创新成就，并为科技同行和社会所公认”。

本人认为，以上论述，对苏学界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苏学爱好者、研究者都有启示作用，我们应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

对于战略苏学家的素质而言，我认为，除了和战略科学家通用的人文素质之外，要强调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跨越多学科的知识素养，除了具有深厚的文史书画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如系统论、方法论、战略学、科学学等方面的知识。

二是战略苏学家必须是一个杰出的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及被苏学界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

三是战略苏学家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及指导苏学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实施苏学发展战略规划的能力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总之，战略苏学家必须是既具有优秀的人文素质，又具有突出的苏学研究成果，还能对苏学发展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引领苏学与时俱进的杰出领导人才及专家学者。

我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苏学研究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是因为有苏学巨擘曾枣庄、张志烈等一批战略苏学家的引领，靠广大苏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取得的。

这里要说明一点，文字上讲的战略苏学家的素质，是比较理想化的要求，作为个人要全面达到这些要求是很难的。但有这个要求是必要的。从苏学界的现实出发，可把这些要求当作苏学领导人及研究人员的目标，也可以把它当作苏学研究机构集体行为的参考。通过发扬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创建“战略苏学家”式的研究学会，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是能体现“战略苏学家”的素质要求的。

四、使命

苏俊七先生在《全国两会苏学研究之春——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注苏学》的文章讲，2012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苏立清，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冀才，全国政协委员、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等代表和委员，对《人民政协报》发表的“站在时代前列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开创中华苏学文化发展繁荣新局面”等文章表示关注（文中有“我们的目标是超古耀今普照未来”“苏学成为了‘世界学’”词句）。有的委员还专门题写了“苏学要成为世界学”的题词，表达了对苏学发展繁荣的期望。代表和委员们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华苏学发展繁荣提出了希望和建议：

首先，弘扬苏轼文化与苏轼精神，就是要培养造就中国人的伟大气质，造就中国气派、国家形象，在伟大的时代首先要培养伟大的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有苏轼那么一种凛然正气。

其次，苏轼文化与苏轼精神必须与时俱进地前进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上，推动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之一，成为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之一。在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举动。

再次，苏学文化与苏轼精神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争芳吐艳的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

学习了苏俊七先生的文章受到启发，加上本人的观察与思考，对战略苏学家的使命形成了看法：让中华苏学与时俱进、扎根中国、辉煌世界。我的理解是：

中华苏学——苏学与儒学一样，是中华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儒学勃兴：在世界各国建“孔子学院”，天安门广场上悄然树起了9.5米高的孔子雕像。对比之下，苏学就显得有些黯然。苏学若要走上繁荣辉煌，必须提高它的国家地位。

与时俱进——就是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以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用新理念、新目标、新方法去实现苏学的跨越发展。

扎根中国——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苏学发展的成就，不能小看，也不能夸大。苏学的根在中国是无疑的。但是，根扎得有多深？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大家常说的“各级政府重视”及“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两条。我们需要实际了解一下，全国的市级以上的主要领导

人，包括省、国家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及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哪些人重视苏学？我国的教育界、文学界、史学界、出版界等是否接受了苏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苏学知识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怎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多年了被国家重视得如何？

本人斗胆认为，放眼全国，苏学在我国并没取得应有的地位，更没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举个例子，被苏学界引以为荣的苏东坡是“世界千年英雄”。这个定位对我们解放思想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法国人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外国人帮助我们解放了思想。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教训：佛教原是印度的国教，在印度有过辉煌。唐僧到印度取经。可惜佛教在印度衰落了，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现在印度人研究佛教要到中国学习。中国也有惨痛的教训：敦煌在中国，然而敦煌学研究却在日本兴盛起来。据了解，每年到敦煌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日本人就占到了一大半。来敦煌的日本游客则非常虔诚，很多游客手里还专门拿着一个敦煌的日文介绍。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说，不到敦煌，就算不得一个有文化的日本人。文化学者平山郁夫说：“作为一个画家，我孜孜以求的是日本的源流。可是，这种源流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遥远的敦煌。”

如果我们不让苏学的根在中国扎深，未来的中国人研究苏学时很可能要到外国去取经。因此，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使苏学在本国根深蒂固上。根深在于抓好普及，蒂固在提高其国家地位。

辉煌世界——已故苏学家颜中其先生在《苏东坡论》一书中讲：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如达芬奇、拉斐尔、拉伯雷、莎士比亚等等。恩格斯称赞这些人，‘按思考能力说，按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说都是巨大的人物’。其中的拉伯雷，被人称为最渊博的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医学家、法学家、音乐家、算术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同时又是艺术家和诗人，植物学家和建筑学理论家。

而我国的苏东坡，他出现在11世纪，

他是一个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政论家、经济学家、又是诗人、词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语言修辞学家、医学家。从他写过的不少史学论文来讲，又是一个史论家，从他介绍过科技新事物来讲，也是一个科技家，从他写过有关教育思想的作品当过皇帝的讲读官来讲，他是一个教育家。他当然也是一个思想家。种种事实说明，苏东坡是我国自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以来的最有才能，最有思考能力，最有创造精神，知识最为渊博的作家之一，完全可以与拉伯雷等人媲美，他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文化巨人。从时间上看苏东坡的出现，比拉伯雷几乎早了五个世纪。

从颜中其先生对苏东坡的论述中可得出这样的认识：苏学辉煌世界是当之无愧的。当前的问题是，我国如何将苏学推向世界。本人设想，如能像建孔子学院那样在世界建苏东坡学院或许是良策之一。

中华苏学、与时俱进、扎根中国、辉煌世界，是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我认为可把它当作战略苏学家的使命。

五、建议

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实践是发展改革的真功夫。如何领导苏学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大力推进苏学研究全方位的改革实践，是战略苏学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向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速苏学发展理论的研究。我们徐州市开展了在科学学观点指引下的苏学发展理论研究，并编著出版了《苏学发展学初探》一书，对加速徐州苏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若要保证苏学研究发展与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进行苏学发展理论的研究。

(二)为实现苏学研究队伍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建议在县级以上特别是国家高层领导人，以及退居二线与离退休领导人员中发现苏学爱好者、研究者。争取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等高官帮助解决苏学发展中的难题。鉴于苏轼也是一个工程师、科技家，建议在技科人员中培养苏

学研究人才。

(三)为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建议充分利用每年地方及国家“两会”召开的机会，通过“两会”代表与委员向各级政府提出有关苏轼文化建设的提案。本人按此思路，2007年起草了“关于成立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的建议”，通过江苏省人大代表、徐州市人大常委、徐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徐州市委常务副主委袁兴森同志，向徐州“两会”提出了“关于成立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的提案，被市政府采纳，促成了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的成立。

(四)建议与世苏会配合，并争取国内外支持，在国外开展创建“苏轼学院”的试点。

(五)要造就一批弘扬苏轼文化的推手(特别是身在北京的推手)，大面积推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苏学研究方法。建议年龄、身体等条件允许的苏学研究人员，从论文、书本、课堂中走出来，(不是说论文、书本、课堂不重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争取每人都为苏轼文化建设办一件以上的实事，比如推动创办一所苏轼小学、中学等。

(六)夯实基础，加强薄弱环节，大力推进徐州的“中国苏轼名城”建设。2012年7月21日，在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的揭牌仪式上，徐州市李燕副市长的讲话中提到：“徐州市将在创建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的基础上，创建‘中国苏轼文化名城’。”李副市长的讲话让人振奋。为早日落实，建议如下：1.加大“苏轼在徐州”的政绩及创建“中国苏轼文化名城”的宣传力度；2.市领导责成有关方面做好创建徐州“中国苏轼文化名城”的计划并组织实施。3.抓好巩固充实提高创建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成果的工作。4.结合苏轼在徐州的事迹，深入开展苏轼精神及其廉政思想的研究，并广为宣传。5.加强苏轼养生学的研究和弘扬。目前，环境污染、人口老化、心理亚健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追求健康长寿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苏轼是美食家、养生家，融儒释道三家养生于一体，一生大起大落，屡受打击，最远被贬到海南，但始终保持积极心态。作为举世闻名的寿星彭祖的故里，徐州是养生学的发祥地，弘扬彭祖养生文化不能忘记苏轼，因

为苏轼在养生修身上与彭祖一脉相承，又是徐州的老“市长”。

(七) 在河南郏县创建“中国苏轼文化名县”，并开展“苏轼精神现代意义”的实验。郏县是苏轼的安葬地，有独特的苏轼文化资源。多年来，郏县在苏轼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郏县人民有搞好苏轼文化建设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全国第14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郏县举办。于2002年成立起来的郏县苏轼研究会，领导能力强，干劲足。基于以上情况，建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同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郏县县委县政府，在郏县开展本课题实验。

实验的目标：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将郏县打造成全国首家“中国苏轼文化名县”，并用事实证明“苏轼精神的现代意义”。从而，让国内外对苏学产生新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其国家地位。

实验的重点：一是提高三苏景区吸引国家高层人士及国内外游客的能力；二是在全县弘扬以“关注民生、勇于创新、和谐相处、自强不息”为基本内容的“苏轼精神”，提升人文素质。三是弘扬苏轼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心态，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实验的方法：实行苏学研究“三化”（政治化、社会化、群从化），“苏轼精神”“四进”（走进机关、走进基层、走进课堂、走进千家万户），“一塑造”（再塑人的利国利民之魂及伟大的气质和精神）。

检验标准：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主要看，通过打造名县及弘扬“苏轼精神”对提高官员廉政率的影响，对降低社会犯罪率的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居民保持身心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行动口号：全民普及三苏文化，世界关注郏县发展。

我的梦想：郏县成为中国弘扬苏轼文化的典型、苏轼文化现代意义的实验场、争取国家及社会对苏轼文化进行再认识的一个样板。

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授牌后，各地相继开展类似创建活动，对加速苏学的跨越发展有重大意义。本人衷心祝愿各家都取得成功。为了“创建工作”更好的开展，建议中国苏轼

研究学会参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8年4月22日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524令》：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核定标准》，下发“创建活动”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未下发之前，各家可自行参考以上条例和标准制订自己的目标和要求。

(八)建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适当时候召开苏学研究发展战略研讨会。

六、后话

2012年7月20日至22日，授予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揭牌仪式在徐州举行。会间，我和外市一位苏轼学会领导人交谈时，他说过去从未听说过科学学这个名词，读了我编著的《苏学发展学初探》才知道。这位领导人的坦诚让我感动，并从中受到了启发。我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有长期学习实践现代科学管理知识的经历，对苏学发展学进行了初探；有创意并参与推动“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徐州利国苏轼小学”成立，以及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创建的实践经验；订阅《科学学研究》杂志达两年，并对其中的《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一文产生了兴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汇报给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领导及苏学界的朋友们。但是写起来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写这篇文章需站得高，涉及的知识面广。然而本人是一个“小人物”，水平有限，位卑言轻，文章的口气与本人的地位不相称，难以把握分寸。思来想去，为了苏学的发展，觉得还是应该勇于担当，挑战自我，努力把文章写出来。即使因个人能力差写不好，把想法写出来供领导参考也是应该的，领导认为有必要，可请高手或组织课题组进行研究，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孟昭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读《东坡志林》(五)

徐 康

心想“迤逦致仕”，为何“言之怅然”

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

——苏轼《书请郡》

此篇作于元祐七年（1092），时苏轼知扬州，年五十六岁，却早已怀“致仕”退隐之思。致仕，旧时指交还官职，即辞官赋闲。在古代官吏中，有任期未满而因病或获罪罢官免职者，也有身体尚好、力能胜任却辞官赋闲者，后者称为“致仕”。“致仕”是一种历经宦海沉浮而求平稳退隐的万全之策。

其时的苏轼，因早年曾经历过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任杭州通判，又因“乌台诗案”横遭冤狱，被贬谪黄州，四年后量移汝州、乞居常州，经历了一次次的人生变故，看透了仕途蹭蹬（cèng dèng）、官场险恶。所以他只想着早作准备，以便全身而退，离开险恶的官场。作为一个嗜文如痴的文人，他幻想着回乡养老的退休生活，并想等待着弟弟一起“致仕”归乡，同享诗书之天趣，共渡安适之晚年。这一篇《请广陵》，便是“请求从广陵（今江苏扬州任上）致仕退休”的一厢情愿的心灵实录。苏轼的设想倒是挺美的：今年当从扬州请求“致仕”，再往湖北江陵（南郡），从江陵到四川三台（梓州），溯长江而行回归故乡，满载着一船平生喜爱的书籍，“迤逦致仕”（即沿着曲折连绵的山川道路，辞官而退，归隐还乡）。在家乡眉山修筑居室，种植蔬果，以等待（“须”，即等待）二弟苏子由也告老还乡。苏东坡将这种“退隐”之思设想得非常周到完美。然而仔细一想，面前仍横着无数的障碍，于是不得不悬疑而自问：“不知此愿遂否？”想到这

里，他自己也不由得心生“怅然”（惆怅）了。

这篇短文反映了苏轼身处险恶官场而力求彻底解脱的惆怅心态。实际上，当时的官场由于权奸当政，故而波诡云谲，动荡不定，作为一介儒夫，命运实难由自己掌握。就在苏轼写这篇文章不久，他便被以兵部尚书一职召还朝廷，不久又改任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兼任礼部尚书。然而“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太皇后去世，他便被贬知定州，次年又徙知英州、惠州安置，谪居三年之久。到了绍圣四年（1097），再贬琼州别驾，继而被当政者“甩”到边远的儋州，在地老天荒的不毛之地倍尝凄苦，直至四年后被“召退”时不幸病逝常州。一代天才文豪，终于寂灭于封建帝制尔虞我诈的险境之中。

若是再回过头来读苏轼的《请广陵》，就更可窥知他当时已意识到仕途险境，亟欲“激流勇退”的心境。其身不由己、困顿失意，其前程难料、吉凶未卜，实为后人哀叹之，而不胜深切同情之至也。

买田求归的“退隐”之思

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

——苏轼《书浮玉买田》

在这篇短文中，苏轼讲到元浮玉先生早年曾经想为他买田，地址就选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因当时苏轼正在扬州的知州（太守）任上，离镇江仅一江之隔，距离很近。元浮玉的本意，还因欲为苏轼所买之田与他的田相近，可为毗邻，便于照看，也便于共叙友情。对于元公的这份好意，苏轼念念

于心，“殆不可忘”。他援引二十年前（熙宁四年，即 1071 年）所作的《游金山寺》：“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意为：江山如此美丽，如不早日归山隐居，连江神也会惊怪我太顽固了。又引后二句曰：“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意思是：我答谢江神说我是不得已的，如果我有田不归，岂不正如这滔滔江水，一路流逝而永不复返也！

苏轼写这篇文章时，正做扬州的知州，时间则为元祐七年（1092），距离熙宁四年（1071）写《游金山寺》已有二十一年之久。然苏轼对元浮玉先生之盛情，虽远隔数年却仍“殆不可忘”。当年曾写诗慨叹，若是“有田不归”，恰如滔滔江水之远去，永不得返也。现在已有田了，若再不归去，岂不“食言于神”也耶（岂不有违神灵之意乎）？看来苏轼是认定了“归隐”乃势在必行，此文题即为此意。

古代的文人，在外做官久了，终将“致仕”（旧时指交还官职，即辞官）。到元祐七年时，苏轼已历经政治上的倾轧变乱，尝够了官场争斗、尔虞我诈的苦味，以致有“看破红尘，力求归隐”之情绪，何况二十年前就曾有过“买田京口”之“退”意，如今重提“买田求归”，早已于心铁定，因此引出了他当年“指江水发誓”的旧话。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将“买田求归”的旧事重提，以致决心再下，或可窥知他当时“激流勇退”的心思。

无官一身轻，然歇肩难也

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余出入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观与仲仪书，论可去之节三，至欲以得罪、病告去。君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进者之戒。

——苏轼《跋欧阳文忠公书》

在宋代之官场，“上”与“下”，进与退，即升官还是归隐，乃是一件令人左右为难之事。作为文人的苏轼，久居官场，知其险象环生，尤其是在渐

近老年之后，总是谋划着“释肩”（卸下肩上为官的重荷）而去，此篇即为这种心态的坦露。

文章开篇便说，“贺下不贺上”，即祝贺归隐而不祝贺升官，这是世间流行的说法（“此天下通语”）。知识分子（“士人”）为官一任，若能外无官场的毁谤，内无愧心（昧心）之举，离职卸任，一旦解除了肩上的重荷（“释肩而去”），那就好比热天出门远行，虽未到家，然已到达一处清凉馆舍（旅店或房舍），只要能解衣宽带，洗涤身上的暑热之气，那就足以令人欣喜了（“以足乐矣”）。何况是久羁官场，离职（“致仕”）而归，脱掉冠帽与佩带，遍访山林、流泉幽静之所，回顾平生经历而一点也没有遗憾之处（“顾平生一无可恨者”）这种欢乐怎能不溢于言表啊！苏轼的这番感慨，虽带有想像的成份，然出自平生体验，又发自内心，其对“致仕”的热烈向往与亟欲实现，实则是情切切而迫不及待也。

接着苏轼便举他的老师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为例，因出入其门甚久，所以屡见其（欧阳公）想要辞官解甲（“释位”）、买田隐居，心情可谓迫切。他人（指官瘾十足的官场中人）或许会口口声声将“归田”、“致仕”作为藉口（“苟以藉口”），哪里像欧阳公那样，归田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犹如饥饿者之念念不忘于食物之充足，而只是由于形势不允许，所以（欧阳公）归田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欧阳公到晚年才获准致仕，仅一年就去世了）。我（苏轼）看过欧阳公写给王素（字仲仪）的书信，论及可以退隐的三个环节，即获罪、因病、年老三条理由，有了这些理由方可去官退隐。君子（有道德的人）为官欲退，其难度这样大，这真可以作为那些求进（欲升官）者引为鉴戒啊！

东坡此文，以他的恩师欧阳修退隐之事为例，结合自己的观察与体验，论证了“释肩”之难；当然也寄寓了早日退隐的想像和欢娱，表述了他早日“归田”的真情实意。这在宋代具有真才实学而又为官场所累的文人之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山中隐士，高风亮节

张愈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云溪，自号白云居士。本有经世志，特以自重难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项黄馘（gu ó）盗名者也。偶至西湖静轩，见其遗句，怀仰其人，命寺僧

刻之。

——苏轼《题张白云诗后》

在这篇短文中，苏轼用极俭省的笔法，记叙了一位他父辈的朋友张愈先生的行迹与品格。

一开头苏轼就说：“张愈，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道出了张愈先生与他父亲苏洵交往游历的史实。古时称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为“君子”，君子而“隐”，是说张愈这位四川老乡（四川郫县人）与官场无缘，屡试不举，遂归隐于青城山之白云溪，自号白云居士。张愈先生本有经国治世之志，怀着一腔抱负，然囿于旧时科举制度之桎梏，屡试不第，故只好隐居白云溪，杜门谢客，著书立说，最终书未成而卒。对于这位长者，苏轼的评价是“特以自重难合”，即性情独特、孤傲，洁身自好难以与世人融洽，故只能“老死草野”。然而，他的志向，却是那些“槁项黄馘（guó）”（枯槁的颈项、黄瘦的面容）的假隐士们所不能攀比的。换句话说，欺世盗名是假隐士所为，而张愈先生却是满腹经纶、学识丰厚而又怀才不遇的真隐士啊！于是，苏轼偶至西湖静轩（僻静的轩堂）见那里有张愈留下的诗句，不禁感怀、仰慕之至，于是命山寺僧人将这些诗句镌刻于石上，以志纪念。

这篇短文实则寄托了苏轼的一种“人才”观：凡有真学问、真品格的人，哪怕隐居深山，老死草野，其高风亮节也是值得后人景仰的；而那些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不学无术者，则只能是被人唾弃的孬种。

诗家评诗，何等精辟

陆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药，通术数，能诗，萧然有出尘之姿。久客江南，无知之者。予昔在齐安，盖相从游，因是谒子由高安，子由大赏其诗。会吴远游之过彼，遂与俱来惠州，出此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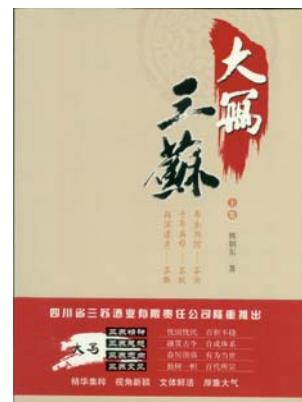
——苏轼《书陆道士诗》

苏轼是宋代大诗人，放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来看，亦堪称伟大诗人也。其一生，作诗数千首，兼及词、赋、文、论，他的诗评尤佳，言简意赅，精短独到。这篇《陆道士能诗》，便是他品评一位家乡人诗作的短文。

苏轼讲的这位道士，喜欢烹制丹药，又颇精通

“术数”（推断人事吉凶的卜卦之术）。更重要的是，此人“能诗”，且“萧然有出尘之姿”，即旷达灵动，大有高出凡尘之见的那种天姿。然而此人“久客（居）江南”，被尘世埋没，竟然“无知之者”。一句“无知之者”，写尽其声名隐没、无人知晓的寂寥之态，实令人遗憾也。然而这只是其一，重要的还在后头。苏轼陈述曰，我昔时在齐安县（湖北黄州西北），此人曾跟随我游历（“盖相从游”，此处“盖”是句首助词，无实义），因此而能在湖北境内的高安谒见子由（苏辙），当彼此相互切磋诗艺时，子由对他的诗竟然大为赏识（“大赏其诗”）。此时我（苏轼）已贬惠州（在今广东省）安置，正好陆道士与苏辙相会于江苏苏州（古称“吴”），一道远游同来惠州，相见之时，便吟出了这首诗。什么诗？苏轼在文中未能点明。但此文前后均论及陆道士之诗，由赞其“能诗，萧然有出尘之姿”，到“子由大赏其诗”，再到结尾处的“秘而不宣”（“出此诗”），足见苏轼及其弟苏辙对陆道士诗作之赞赏与推崇。苏轼作为一代大文豪，其诗作无论质与量均远超于同辈诗人，然而，却既无门户之见的偏执，更无文人相轻的恶习，对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真诚赞赏，推崇备至，足见其开阔的胸襟与容人的雅量。

（徐康，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书名：大写三苏（上下册）

作者：熊朝东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板式：787×1092毫米 1/16

定价：90.00元

购买：请联系《苏轼研究》编辑部

倾注“三心”写三苏

——熊朝东《大写三苏》的柔情与冰火

方永江

2013年7月,就三苏文化的传承创新而言,真可谓踵事增华。初发嘉州、聚首嘉州,25日至28日,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承办的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我忝为学会秘书长服务其中,领受张志烈、曾枣庄、邱俊鹏和刘尚荣诸先生的耳提面命,倍感荣幸。千年三苏、大写三苏,返眉之30日,又与市作协共襄熊朝东三苏作品座谈会,受益良多。感慨尤深的是,这两次盛会主题竟然不谋而合,都是关于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建设,朝东先生的《大写三苏》不仅是其真实写照,而且是其独树一帜的文化结晶。

《大写三苏》的文学性、学术性、可读性,受到了多方面的好评,我就不用锦上添花了。熊朝东倾注一腔柔情,用心用情苦心孤诣写出了三苏大气淋漓的精气神,把传主写成大写的人因而成就了书籍的集大成,这才是他的独具匠心。易水诀别的悲凉、霸桥折柳的忧伤、送郎出征的绝望和江岸踏歌的绝响,我家初发江源上的欢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不忘、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和早生华发祭周郎的苍莽,缠绵悱恻。他三十年身心许三苏,在喧嚣之中红尘之中,沉稳如冰冷静如冰,因而严谨因而严肃。别人锻剑,他却燃烧,把自己亮成一面旗。这却是我最为感佩的。

以开创之心传三苏品格。三苏之所以为三苏,首要的就在于他们从来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从不因循守旧,更不妄自菲薄。布衣鸿儒苏洵始能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千年英雄苏东坡始有闳伟之器识、卓荦之议论、雄隽之文章、精明之政事。颍滨遗老苏辙始得论事精确,修辞简严,其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朝东数十年下死功夫,吃透了传主的内在气质,故能在构思、结构、表

述上有所突破,是为国内故事性质传记第一部作品。《大写三苏》不以其人生行状、文艺创作取胜,而以精神志向、人格魅力、学问修养出彩,奠定了其在苏学研究和创作领域的独特地位。

以赤子之心尽普及义务。朝东深潜苏海,深受三苏精神涵育,其人品、学养亦高蹈豪迈。退居二线,闲居闹市若许年,放弃诸多挣钱机会,只一门心思与三苏深度交谈,着力要向世人奉献一套全面了解三苏诗文生平事迹的通俗读本。淡泊名利,勤奋善思,不吹擂、不骄矜,洋洋洒洒百万言,落到其他人名下,尾巴早就翘到天上了,恐怕眉山早就装不下他,四川装不下他,中国装不下他,甚而至于地球也装不下他了。朝东只一个劲儿地说:“研读三苏,实出于一种三苏情结,出于传播三苏文化、弘扬东坡精神的一种苏乡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感。”一再强调“只为皮毛”。谦恭若此,堪为楷模。其著述入选国家重点公益性文化项目,是对平民视野的最好褒奖。《大写三苏》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收藏价值,最为值得收藏和最为值得发扬光大的,是他的一颗赤子之心!

以感恩之心成不朽盛事。这些年来,服务眉山文化事业,服务苏学专家学者,受教受诲,见识稍长,愧疚益深。前度三苏祠馆长常言,是替三苏看大门的。前任、继任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张志烈、曾枣庄、邱俊鹏诸先生更是大张旗鼓广告自己,是替三苏跑腿的。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比起他们来,我们为三苏做了些啥,所做的那点事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扪心自问,有多少人的“饭碗”不是拜三苏所赐?没有三苏,多少人不知何处觅自己的“衣禄”?朝东从三苏的内核中去汲取营养,哺育自己健全的心灵,感恩生养自己的土地,感恩三苏,感恩同道,感恩亲朋良善,收获了中国梦的文化实践。

(下转第70页)

永远的记忆，难得的教诲

——记邱俊鹏教授一席谈

乔建功

公元 2013 年，时值大暑，笔者有幸与文友王君宪斌先生同赴四川乐山参加第 18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

26 日傍晚，结束了第一天会议的专家学者们聚集在滨江路的老房子酒楼下候宴，在嘉陵江畔尽阅大江东去的壮景。这时忽觉有人拉我一把，回头一看，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刘继增局长。他拉着我向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介绍说：“这就是我们郏县的乔建功同志！”这位长者就是享誉国内外的苏学权威、德高望重的邱俊鹏教授。我赶紧上前握手问好。邱教授开门见山说：“近几年你写了几篇三苏坟文章。”闻言我心里直打鼓，以为犯了什么忌讳，写了不该写的东西，于是忐忑不安地说：“主要是我认为三苏坟存在不少谜团……”这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被他打断了：“有关三苏坟的问题应该算是基本解决了，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看过，有理有据。这次向大会提交的《参寥子是凭吊苏坟第一人》和《三苏坟究竟葬几人》就发掘得很好！”这时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知遇之感油然而生，心里激动不已。他接着转向刘局长说：“以后凡是三苏坟的疑难问题，你就找他。”我顿感诚惶诚恐，连说：“不敢，不敢！”这时前来围听的人越来越多，刘局长提议说：“来，咱们合个影！”于是刘局长、王老师和我围着邱教授留下了难忘的瞬间。大家沿着江边甬路边走边谈，为我们拍照的、录像的人络绎不绝，让人受宠若惊。邱教授对刘局长说：“关于苏轼葬郏原因，早几年我就对你们的王盘根主任（原郏县人大主任）说，‘苏东坡说的话，你们不听，偏听那些地方传说，真是那么回事吗？’讨论苏轼葬郏原因要有文字依据！”当我提到二苏坟墓位置变迁时，邱教授说：“这个事

我曾和你们的高文焕县长说过，现在的位置可能有问题。你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当我谈到高县长已经作古时，他说：“我知道，他（指刘局长）已经告诉过我。”话题越说越多，当刘局长在后边提醒说“好了，好了”时，方才知道我们已经步入餐厅。席间，当我向邱教授敬酒问及高寿时，他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啦！大家都为他的健康长寿祝福。随后邱教授到我们桌前回敬时，特意给我斟满一大杯，又命我喝干，颇为感慨地对人们说：“我知道，他坚持研究好多年了，很不容易！”接着又叮嘱刘局长说：“关于三苏坟的各种说法，要有第一手资料的依据，这个事就交给你了！”刘局长笑着连连点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邱教授反复叮咛的话语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自 2002 年退休以来，在郏县苏轼研究会的领导关怀和众多友人的鼓励帮助下，通过不懈努力先后撰写 30 余篇论文，见诸于各级报刊杂志和文集，大致廓清了苏轼葬郏的前因后果，初步窥探了二苏坟墓位置变迁的秘密和原因，隐约再现了三苏坟的“庐山真面目”和其 900 多年来兴衰演变的跌宕风云。十年的研究成果，终得名家首肯，这也许就叫做“天道酬勤”吧！但瞻望前景，任重道远，三苏葬郏的神秘面纱仅仅撩开一角，正须铭记邱老训导，务必戒骄戒躁，沉心定气，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兴致所至，试吟七言一首，聊以述怀：

十年磨剑夜长明，一片仰苏赤子情。
坡翁葬郏千年谜，后学潜心万卷中。
陈陈相因雪泥漫，孜孜寻觅鸿爪踪。
幸有大方识刀人，苏学光大赖众公。
(河南郏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汉诗诗人江木衷（上）

——关于苏轼《聚星堂雪》的次韵诗

〔日本〕池泽滋子

内容提要 江木衷是活跃于明治到大正时代的著名法律家，同时还是以“冷灰”之号而为人所知的汉诗诗人。本文着重分析江木衷作为汉诗诗人这一侧面，通过他次韵苏轼《聚星堂雪》的诗，来考察他对当时汉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 江木衷 檀栾会 苏轼 聚星堂
雪 白战体

江木衷（1858～1925）是活跃于明治到大正时代的著名法律家，也是中央大学前身——英吉利法律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他曾在警视厅、司法省、内务省等处工作，后又从事律师工作。他以法律学者的身份，撰写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同时还是以“冷灰”之号而为人所知的汉诗诗人。

在整个江户时代，汉学一直是学术的主流，写汉文、作汉诗是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修养。但是，明治以后的社会变革给日本的汉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欧美学术的急速引进，汉学逐渐偏离主流地位，走上了衰退的路途。不过，在明治时代的前期，汉诗境况尚好，汉诗界呈现繁荣局面。

这一时期汉诗创作繁荣原因大概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第一，不仅活跃于江户时代晚期的汉诗诗人尚在世，而且当时的政府高官都对创作汉诗极有兴趣；第二，诗社数量很多并设立了大量私塾；第三，杂志上发表汉诗很多，报纸上增加了汉诗专栏，出版社出版汉诗诗集也较容易，为汉诗发表提供了机会；第四，日中之间通航（通船）的自由，使得文人往来明显增加。

作为汉诗诗人，江木活跃于明治时代后期。当时，森槐南（1863～1911）、永坂石埭（1845～1924）等汉诗专业诗人依然在从事创作活动。

江木衷通过参加汉诗会等活动，与汉诗专业诗人、汉诗爱好者，甚至来访的中国文人积极交流，并创作了不少作品。本文着重通过他次韵苏轼《聚星堂雪》的诗，来考察他对当时汉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一、关于江木衷

1858年江木衷生于山口县岩国市，是岩国藩士江木俊敬的次子。其兄江木千之（1853～1932）是贵族院议员，曾任文部大臣等职。江木衷八岁时，其父去世，由母亲和长兄千之培养成人。在故乡，江木衷上了岩国学校，又在南方一所的私塾学习汉学。明治七年（1874）十七岁时，靠长兄的资助，前往东京求学。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学习法律。在东京大学，江木衷很快就显露出其出众的才华，给同学和教授们留下深刻印象。他鹤立鸡群，远远超过了其他学生。不少教授在答疑时，甚至无法对他的观点给予反驳。他头脑敏锐，才华横溢，读书时不是一字一句弄清其含义，而是抓住要点，一目十行，总体把握。由于读书速度极快，与其他学生相比，他有了多余的时间。他的专业为英国法律，但课余时间学习法语和德语，并很快掌握。由于同时掌握了汉学方面的知识，江木对各种参考书也广为涉猎，从而以优异成绩毕业。直至老年，他都一直保持旺盛的求知精神，孜孜不倦地钻研各种学问。不管是作为学校的讲师，还是站在学会的讲坛上，他的演讲绝不像别人那种平淡无奇的论述。其他人演讲时，有些听众会打瞌睡，但江木开始演讲，那些打瞌睡的人会一下子清醒，并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冷灰全集·冷灰全集出版说明》）。

明治十七年（1884）大学毕业后，经伊藤博文的提携，江木进入中央政府工作，开始时任警视厅御用挂，后历任司法省参事官、特许局审判官、农商务省大臣秘书官、农商务省参事官、公使馆书记官、外务省参事官、内务省大臣秘书官、内务省参事官等职。明治二十六年（1893），江木辞掉内务省的工作，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另一方面，他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参与创办了英吉利法律学校，并且亲自授课。教学之余，江木积极著书，明治二十年（1887）出版了《现行刑法泛论》。

据长兄江木千之的记载，“江木衷性格豪放、散漫，即使是一些大人物高官来敲他的门，他都会以从不搞礼节性拜会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冷灰全集·写在冷灰全集后》）。此外，在政府工作期间，江木也被称为是官场的宠儿，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物。前述的《冷灰全集出版说明》中，记录了如下的逸事：

在明治维新的元勋井上馨手下干事时，大臣不在期间，他把大臣的安乐椅和自己的藤椅互换，自己用上了大臣的安乐椅。在此事遭大臣斥责时，江木反驳说，与其让迟到早退腰也不疼的人使用，还不如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的人用，这难道不是当然之事吗？盛夏之日，江木光着膀子办公。此事亦遭大臣斥责，但他完全不当回事。他无所顾忌地说，政府机构是办公的地方，决不是学习小笠原流吉良流礼仪的地方。各地的地方官来到秘书官室，请求转交文件。江木讨厌这些人，把几张书法用纸连起来，用黑墨写上了如下的文字：“捡拾纸屑者及地方官不得进入。”然后，江木堂堂正正地将其贴在门口。当我国立法史上著名的法典延期问题发生时，江木以内山下町内务大臣官舍为大本营，亲自充当攻击政府的急先锋。如此恃才傲物，实属罕见。

离开政府之后，江木衷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关于三井三池矿山的民事诉讼审判，成为参与解决明治、大正期间几乎所有著名事件的著名律师。此外，江木还两次担任东京律师会会长，并以法典调查会、法制审议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的立法工作。在刑法问题上，他受意大利学派的影响，批判大幅度扩大法官权限的作法，强调引进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性。

在如此繁忙地从事法律工作的同时，江木衷还过着风雅诗人的生活：“每年，从新鶲晚莺的时节到红蓼白露的日子，都要隐居在轻井

泽山庄的白云深处，与诗人们唱和，表达忧国忧民之情。同时，也有着忘掉纷繁世界成为山林高士的情趣。”（《冷灰全集出版说明》）

关于江木衷的作品，现在可以从他主办的檀栾会发行的汉诗集《檀栾集》，以及他曾经投稿的报刊的汉诗栏中看到①。此外，作为个人的汉诗集，留有一卷《冷灰遗稿》。这一遗稿是在他死后由夫人荣子于大正十五年出版发行的。编辑这一遗稿的岩溪裳川（1852~1943）在《序言》中写道：“冷灰博士诗可以人而传诗，非以诗而传人者。然其诗有足传者，自缘其品操。博士风流从此远矣。博士初问诗于山田新川。想其诗盖多矣。癸亥之灾一炬不可复观。故《檀栾集》多为钞选。事要火速，不保无沧海遗珠之叹。”

“癸亥之灾”是指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当时，江木衷夫妇因正在轻井泽避暑而未受到影响，但位于东京神田的住宅被全部烧毁。大部分作品也因此而失去，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江木学习汉诗时，曾师从山田新川（1827~1905）。山田是活跃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代的汉诗诗人，出生于金泽，字子昭，号太刀山人。明治维新之后，山田来到东京，主持汉诗团体正葩吟社。

正如岩溪在序中所说，江木虽然不是汉诗的专业诗人，但由于和当时的著名诗人积极交流，使其旺盛的创作欲望在汉诗方面开花结果。关于这一点，从江木给开始学汉诗时的老师南方一枝的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东京有名的诗人基本上我都认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不仅参加各个诗社的活动，而且还在自己家里举办两个聚会。一个是槐南、石埭、裳川、种竹、梦香、香国等星社派诗人参加的聚会，另一个是湖山、松坡、新川、蓄堂等人参加的聚会。”

举办汉诗会的江木家被称为“待我归轩”。据明治三年（1870）发行的《东京名所图会》介绍，江木家在东京神田淡路町二丁目七番地。黑门古风，气氛庄严。众多来客频繁出入，包括来自中国的宾客。会田范治《近世女流文人传》说：“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登门拜访，让江木家总是门庭若市。不仅有政治家、律师、医生、报社记者、书法家、画家、演员、实业家，甚至偶有以‘问候夫人’为名来讨些小钱的游手好闲之辈。另外，中国一些著名人士来东京时，冷灰大都会在待我归轩设宴欢迎。比如，孙中山和胡瑛来日本时，冷灰就曾设盛宴欢迎。”

虽然汉诗这个领域并不是江木的本行，但凭借其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加之中日文人的广泛交流，为当时汉诗界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亲自主持的汉诗社檀栾会。

二、关于檀栾会

江木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创办檀栾会的。该会开始时每月举办一次活动，并将参加者的作品编辑为《檀栾集》，每年出版。《檀栾集》共出版六册，其中《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各卷分别收入了1902年、1903年、1904年、1905年、1906年的工作。《壬子》卷收入了1907～1911年在檀栾会上发表的作品及其有关作品。

在《檀栾集》发表作品的诗人共有七十人。虽然每一册作者都有所不同，但森槐南、永坂石埭、本田种竹（1862～1907）、永井禾原（1852～1913）、岩溪裳川（1852～1943）、上梦香（1851～1937）、关泽霞、九峰（1844～1927）、井香国（1850～1922）等是主要作者。这些诗人主要是参加星社（1890年再度开始活动的诗社，森槐南为盟主。1894年解散。）的著名汉诗诗人。

举办地点不限于“待我归轩”，有时也在隅田川的船里或者上野的湖心亭举办。另外，夏季一般是聚集到冷灰在轻井泽的别墅远近山庄举办。在甲辰、乙巳、丙午各集，收入了每年八月在山庄招待客人，大家一起在山里散步咏唱的作品②。另有一些作品，是在中秋节和重阳节等节日，招待中国来的宾客时在宴席上咏唱的作品。

在《乙巳集》的序中，永井禾原作了如下记录：

吴兰雪，序张舸斋《寸草园汇钞》曰，人生百年如露电耳。其为真有四。而富、贵、功不与焉。一曰山水之胜，二曰文章之美，三曰友朋之益，四曰家庭之娱。得其一端已足自慰。况兼有之乎。吾友冷灰先生，寄迹一丘，追踪六逸。抱济时之策，甘守陆沈；怀作赋之才，愿安市隐。檀栾结社时，从竹里招宾远近名庄。爱向山中探胜，借风云而为气。乐琴书以忘忧，秉烛夜游，把臂皆都门旧雨。倚栏望晓怡情。在信岭晴霞时，或墨水观花，香风十里，每当莲塘买醉，明月一湖，常偕韩、孟以联吟，亦共谢、袁放棹，较胜淮南留客，数仅八人；不同净土修禅，盟推一衲。况复大徐嘉淑配苏蕙多才，生成简简之芳姿，恰合欣欣之雅号。春山入画，冬雪能吟。

宜其爱擅画眉，心甘同梦。如先生者正可谓一生修到四乐兼全者矣③。

从禾原的这一序文中可以看出，冷灰好客，有很多文人仰慕他而聚集到他的住处。另外，冷灰的夫人江木荣子（欣欣）被誉为大正时代的三大美人之一，是以诗、书、画、篆刻、谣曲兼通而为人所知的才女。她会作汉诗，在檀栾会上常和丈夫一起作诗。从禾原的序文可以看出，江木夫妻关系和睦。

本文以檀栾会中唱和参加者较多的第十一集（1903年1月17日举办）为中心，着重分析在那次会上咏唱的江木作品。在分析作品之前，先就江木主持的诗社“檀栾会”和他的住处“待我归轩”名称的由来加以考察。

注释

① 《冷灰全集》卷四《待我归轩诗存》中，收入了刊载于《檀乐集》中的冷灰作品。此外，从松田义男编辑的《江木衷著作目录》(<http://www5.ocn.ne.jp/~ymatsuda/>)中可以看出，明治二十八（1895）年开始，江木撰写汉诗给《法学新法》等杂志投稿。

② 檀栾会第二十五集（《甲辰》），第三十二集（《乙巳》），第三十八集（《丙午》），第四十二集，第四十八集（以上两集收入《壬子》）是在远近山庄举办的。

③ 编者注：此段引文有日文（た），有漏字，后半为骈文，因脱字而不成骈语。

（未完待续）

（池泽兹子，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上接第66页）

他把自己也写成了一个大写的人。我所喜见的这个人，正是赖正和先生笔下的那个人。

“7月8日中午，闷热难耐，坐着不动也流汗。路人看见一位上身只穿一件白色背心，露着臂膀，冒着太阳的炙烤，蹬着半旧自行车的花甲男子（原文为男士），跑到赤壁东路街口，把散发着墨香的两本厚书，递给一个白发老头，都以为前者是跑快递的。他们哪里知道，他就是鸿篇巨著《大写三苏》作者熊朝东！”不接地气、不沾人气，念兹在兹于名、锱铢必较于利，枯坐书斋是成不了大家、闷不出大作的；精彩的人生是冒着太阳炙烤跑出来的，优秀的作品亦如此，诚哉斯言！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十三）

——朝廷之旅（下）

雷金贵

五三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苏东坡还有一次半年的朝廷之旅，一次一年的朝廷之旅。

半年之旅：元祐六年（1091）三月到八月。

一年之旅：元祐七年（1092）九月到次年八月。

元祐六年三月，诏令苏东坡为吏部尚书，苏东坡很不愿意，以弟弟苏辙为尚书右丞而居执政之位为由，请求避嫌。苏东坡不想回京，朝廷或者说太皇太后却非要他回来不可，改为翰林承旨，继续给皇帝当老师。

天上一日，人间百年。

苏东坡离开朝廷，仅仅两年，朝局已经变换了。执政的权利，完全掌控在司马光门下的官僚集团手中，而且原来的所谓洛学的弟子们，在程颐倒台后，都纷纷转投在朔派的门下了，两年前，不遗余力攻击苏东坡的人物，个个都身居要津，掌控一方。刘挚已经做了宰相，虽然还有一位宰相，但他是个老实人，朝政其实左右在刘挚一人手里。苏东坡才到朝廷报到，原来因为攻击苏东坡最凶而受到降职处分的程门弟子贾易，立刻就得到升迁，而且是很有权势的侍御使。

或许，正是这样的朝局，让太皇太后很不放心，所以虽然苏东坡在杭州接到任职通知，一而再地上书恳辞，太皇太后还是坚决要把他调回来。太皇太后犯了一个错误，两年前，她没有能保护和重用苏东坡，现在依然不能。

瞎子都看得清楚，朝廷完全不是苏东坡呆的地方。

但是皇命不可违，苏东坡只得硬着头皮去上班。

苏东坡做事太认真，一回朝廷，即刻上报浙西灾情，请求朝廷救灾。

贾易果然很领会别人提升他的用途，立即就跳了出来，说苏东坡报告的灾情不实。太皇太后都批了的救灾物资——一百万担米，二十万缗钱——落不到实处，苏东坡很着急，想起他认为是朋友的人，现在是有话语权的御使中丞，苏东坡想请他出面，公正地为浙西灾民说话。但是苏东坡看走了眼，官场诡诈，与他的“官念”不一样，有的人在官场混，只有利益，没有朋友。

这个人叫赵君锡，两年前，苏东坡外放杭州，赵还是个小官，他晓得太皇太后对苏东坡极为看重，认为苏东坡不久就会回来，而且可能拜相，就上章请求把苏东坡留在朝廷，你看他说得多么的动听——

苏轼之文章，追攀六经，蹈激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公论倚重，隐如长城，请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风动四方，为利薄矣。

苏东坡刚回朝廷，在殿门前遇到赵君锡，赵还很谦虚，对苏东坡说：“……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朋友教诲。”苏东坡因此把他视之为“从来倾心”的朋友，请他以御使中丞的话语权，“以救两浙亿万生齿”。

但是，现在形势变了，赵君锡在朝廷这么多年，朝局他是看得很清楚的，苏东坡要想走上相位，那是相当的困难了。于是他把苏东坡

派人找他为浙西灾民说话的事，卖给了贾易，给攻击苏东坡的人，送上一枚重磅炸弹，给实际操纵朝政的官僚集团，送上了一份厚礼——宋制，政务官不得与谏官往来言事。

灾情是事实，朝廷派人下去访一访，就会真相大白，请言官出面说话，说的公事，只是违纪的问题。因此，仅靠这个是打不倒苏东坡的。打手们因此又故伎重演，在苏东坡的诗文里去找茬子。他们找出的罪证，是多年前的一首诗。

元丰八年（1085）五月，苏东坡从黄州释放出来，经请示同意，经南京往常州去养老，途经扬州，去访问竹西寺。考察苏东坡一生的行踪，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上任途中，还是贬谪途中，凡寺庙禅院，他都要去访问的。在竹西寺门外，有几十个人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其中一个老人说，好个少年官家！这是夸赞即位的哲宗皇帝。这年三月，神宗皇帝死了，哲宗皇帝上台。自己五十岁了，被允许养老了，一生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了，这两年，两浙大丰收，老百姓在由衷的夸赞自己的天子，几件很高兴的事情加在一起，苏东坡于是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被镌刻在竹西寺的墙壁上。

诗云：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贾易、赵君锡们说，神宗皇帝死了，全国人民都在哀痛，只有苏东坡一个人满心欢喜，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为了证明苏东坡确实罪不可赦，又在材料中说，在免役法的问题上，苏东坡反复无常，在杭州越权决配颜家兄弟，是为其横暴立威；在西湖筑堤，是为了方便自己的游玩；此次回到朝廷，又虚报灾情，妄言水利。尤其罪当诛之者，是在草拟皇命时，在草拟吕大防担任左相的告示里，将神宗朝的国策，污蔑为像周厉王时候的虐政。

贾易、赵君锡们给苏东坡定性：“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矣。”

苏东坡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人。贾易为老师报仇，为新主挣表现，总还算理由。而赵君锡，却忘记了两年前，自己对苏东坡极端的赞

美。谁是小人嘴脸，什么是小人嘴脸，瞎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贾易、赵君锡们不断攻击，苏东坡不胜其烦，他晓得，自己只有离开朝廷，才能得到安静。

太皇太后真的是老了，只想太平无事，只想等皇帝成人了，还政给皇帝。她想重用苏东坡，却拿又不出魄力来。言官们攻击不已，苏东坡请外不断。太皇太后就召集执政们讨论。结果还是和稀泥。

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

贾易也被外放，以本官知宣州。

可怜的赵君锡，本想借攻击苏东坡而同时打倒苏辙，自己取苏辙而代之，不想太皇太后看穿了他的把戏，把他视为朝廷今后的大患，责降处罚。赵君锡本想依附上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而青云直上，不想却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里有两个细节，很值得一说，看得出苏东坡的心迹。

其一，宰执们原本拟把苏东坡放到南京去，苏东坡说，有老朋友王巩——乌台诗案连累最重的朋友，此时正被安置在南京，为了不让朝廷为难，希望另派一个地方。所以才有颍州之任。

其二，苏东坡对朝廷放任这种人身攻击十分忧虑，他在请求外放的请示中，恳切的劝谏——朝廷以安静为福，人民以和睦为患，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则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为治乱之机，甚可惧也。

不幸得很，苏东坡的这个忧虑，不久之后就得到了无情的证实。

遭遇攻击，苏东坡不惊讶，对他打击最大者，是他敞开心扉的朋友之道被赵君锡剿灭了。朋旧反眼，不可复测，言语往来，动成坑阱。苏东坡的这种无奈，两个月后，竟然又应验到了正在呼风唤雨的刘挚身上。

刘挚被投靠他的程门弟子出卖了，贬出朝廷。

射中刘挚要害的子弹，与当年王安石遭遇吕惠卿致命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与北宋鼓励告密的制度有关。刘挚在给人的信中，有一句话让人举报了——“第往以俟休复”，与京外的

谣言遥相呼应，诬言太皇太后当初想要自己的亲生儿子即位，其实这是失势的神宗朝的大臣们要出的政治手腕，离间太皇太后与孙子哲宗皇帝之间的关系。哲宗皇帝后来果然中了圈套，一亲政就起用章惇、吕惠卿为相，制造血雨腥风的报复，把风雨飘摇的北宋，推向快速灭亡的深渊。哲宗皇帝亲政三十四年后，苏东坡病逝二十五年后，北宋自己把自己玩完蛋了。

五四 心里流出的血成了苋菜水

颍州半年，改知扬州，也仅仅半年，五十七岁的苏东坡，又被强行诏回朝廷。

苏东坡一万个不愿意。

朝廷的水太深，而且污染很严重，他这样黑是黑白是白的鱼，不能适应这样的政治生态。

此时是元祐七年（1092）九月。次年9月，苏东坡出知定州。

苏东坡一路都在请辞。

从二十出头到年近花甲，三十多年的仕途磨勘，在苏东坡看来，是短暂的梦。已为门下侍郎的苏辙，晓得老兄将回朝做兵部尚书兼侍读，两兄弟年轻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做弟弟的当然高兴，上奏皇帝，要出省去迎接哥哥。哥哥晓得了，先寄一首诗给老弟。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时一顷。
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
黄门殿中奏事罢，诏许来迎先出省。
已飞青盖在河梁，定饷黄封兼赐茗。
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
苏东坡的心境，竟与弟弟完全不同。

苏东坡不想回朝，朝廷却催他快点，皇帝已经长大了，要亲自去南郊祭天祀祖，朝廷给苏东坡安排了重要的工作。皇帝的郊祀典礼，于十一月举行。典礼一完，苏东坡立刻请奏，能够让他到越州去，就是现在的绍兴。朝廷诰下，不但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反而让他的官位到达了一生的顶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一身兼任两学士，不仅当时是惹眼的“异数”，就是在北宋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苏东坡丝毫没有喜出望外，而是惶恐不已：“闻名悸恐，不知所措……”

树大招风。

高处不胜寒，天凉秋瑟瑟。

请外不被批准，朝廷不可逗留，告老还乡没有指望，苏东坡甚至提出让自己到边郡去，那是功名富贵的人，都不想去的地方。苏东坡想，人人都不想去，我主动去，总会批准了。苏东坡又想错了，不但没有批准，而且不准他再提交这样的请示。

太皇太后强留苏东坡，只有一个理由，她老人家对现在的执政班子不放心，皇帝将满十八岁，快要亲政了，她需要一班与自己治国理念一致的人，辅佐年轻的皇帝，她很担心神宗朝的大臣要员们卷土重来，重新执掌朝政。她老人家有她担心的理由，她经历了四朝，公公仁宗皇帝的嘉祐时代，丈夫英宗皇帝的治平时代，儿子神宗皇帝的熙宁元丰时代，孙子哲宗皇帝的元祐时代。她很向往公公的嘉祐治世，她垂帘听政，取年号为元祐，复元嘉祐景象，是她内心渴望的昭示。而苏东坡，是仁宗、英宗，甚至神宗皇帝一直想使用的人，这些年来，苏东坡无论在地方上，还是在朝廷上，甚至在监外执行的黄州，政治表现，政绩表现，以及名望，在太皇太后心目中，都是不二人选。

一辞再辞，时间拖到元祐七年（1092）十二月，在无可奈何里，苏东坡只得去两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上班。

按照北宋的规矩，官员无论哪个地方上任，都要向皇帝上一封感谢信，以示皇恩浩荡。苏东坡既然上任了侍读学士，就要感谢皇帝。苏东坡是认真的，他一改感谢的套路，竟以师傅的名义，把感谢信写作为劝谏书：

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子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饮食，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蓍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食，

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生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苏东坡总结得好，这六件事情，确实不复杂，不高深，更不需要大动干戈，但是真要时时做到，处处做到，事事做到，也不容易。平常事情，恰能检验人的真工夫。此六者，任何人真是修炼到家了，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都将问心无愧。

很不幸，皇帝对这样的劝谏，竟然很反感。

这要检讨元祐时期的执政们，从司马光开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这七、八年时间里，都一心一意听从着太皇太后的号令，却把一天天长大的皇帝忽视了，甚至皇帝询问某个具体的事情，报告的大臣都不敢具体回答，竟然只是敷衍了事。皇帝的内心，对元祐大臣很不爽。司马光当政时，御使苏颂劝司马光，要注意小皇帝的感受，毕竟小皇帝是坐在龙椅上的，太皇太后是坐在帘子后面的，要照顾到龙颜，却没有引起司马光的重视，皇帝却晓得了这个事情，记住了苏颂，后来就提拔他担任了宰相。

皇帝被忽视的后果，相当严重，后来出任宰相的蔡京说：皇帝说，垂帘时期，二圣临朝，皇帝只见臀背。皇帝内心，不平已久，积怨很深，表面上对太皇太后恭敬有加，思想上其实很叛逆。他亲政后，对元祐的颠覆，称太皇太后为老奸，起用吕惠卿章惇辈，重惩元祐执政，是有基础的，带有浓厚的报复心。

这位皇帝，其实心眼很小，怨气郁积，所以很短命，仅仅活了不到三十岁，就呜呼哉了。

皇帝变得冷漠了。

苏东坡看在眼里。

但是苏东坡抱着希望，皇帝总还是年轻，正需要他这样的师傅的引导。这一点，苏东坡和程颐，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辅弼圣学，视为挽救北宋国运的头等大事。程颐，本是悠哉于

民间的大处士、学问家，因为司马光的举荐，让他给小皇帝当师傅，他就欣然出山了，弄到最后，一世英明，都毁掉了。

苏东坡很用心，组织人力编写了专门的教材。他越是用心，皇帝竟然越是叛逆，不是对苏东坡个人的叛逆，是对太皇太后任用的元祐大臣的集体叛逆。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让苏东坡再遭围剿。

第一，卖书事件。元宵节，入贡的高丽使者，在京逗留，提出购买北宋有关书籍。有关部门认为不妥，皇帝要礼部提出意见，礼部尚书苏东坡表示反对。理由是：其一，他们提出的书目，不仅关乎文化安全，更关系国家安全——周知地理险要，危害边防。其二：朝廷已有禁出文书的法令，应该遵守。北宋朝廷禁出文书，目的是防范契丹，管制非常严。为什么要这么做，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三年前出使北辽，回来后给皇帝做了专题报告，大概说，兄长苏东坡的文集，在北辽流传很广，不仅诗词文赋，甚至给朝廷的各种报告、意见和建议，也被人收集在文集里，很不妥当，泄露了国家机密。苏东坡也多次就此提出过警告。

但是，执政们却认为，过去赏赐过，现在卖给他们，并不妨事。

朝廷还没有定论，有关执政却已经把书卖出了。苏东坡当然就很愤怒，但是他的愤怒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又给自己树了敌。

第二，祭祀事件。就是恢复“冬至祭祀老天于南郊，夏至祭祀大地于北郊”的老传统，神宗皇帝就提出过这个动议，还是坚持现在的天地一同祭祀。朝臣们争论得很凶，各有各的道理。即使苏东坡兄弟，在这个事情上，意见也不统一。苏东坡是坚决主张天地一同祭祀的，他认为，天地一同祭祀，由来已久，关键是这个祭祀活动要由皇帝亲自主持，而皇帝是日理万机的忙，一年当中，劳神费力做两次这个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应该。为此，他洋洋洒洒三千言，上书应该坚持天地一同祭祀。朝廷下令对苏东坡的意见进行辩论，苏东坡认为这样辩不出一个结论，再次上书，要求对自己的意见公开诘难，谁要是推翻他提出的理由，

他就赞同谁的意见。苏东坡很自信，他知道没有谁能够推翻他旁征博引的理由。

苏东坡的意见，终于被皇帝采纳了。

但是，围攻却来了，而且来势凶猛，连章攻击。攻击者这一次对苏东坡的攻击，和之前的每一次攻击一样，方式、内容、套路都没有创新。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过去有过定论的，朝廷竟然又允许把这些事情拿出，再行辩论，这让苏东坡很寒心，即使这次出面的攻击者遭到了处罚，他认为自己再在朝廷已经没有意义，于是连章请去。

因为苏东坡太认真，每一次在朝廷，都会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有一种说法，官员是不以苏东坡为榜样的，太认真，太认事实，爱提意见，不讨上司喜欢，不讨官僚认同。

彻底把苏东坡的心浇冷的，是继室王闰之的溘然去世。时在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王闰之陪伴苏东坡二十五年，宦游四方。她比苏东坡小十二岁，年近花甲的苏东坡，原本希望与她一同回老家，度过晚年，不料造物弄人。

我曰归哉，行返丘园。

曾不少须，弃我而先。

孰迎我门，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旅殡国门，我实少恩。

唯有同穴，尚蹈此言。

夫人逝去，苏东坡已然心碎，也在此时，一直对苏东坡很器重的太皇太后，被谣言所刺激，而病倒了。失势的官僚们，在宫廷外散布谣言，说太皇太后要废帝，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谣言很盛，太皇太后终于忧思成疾，于王闰之死后一月又两天，即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满怀忧虑地闭上了双眼。

朝局将变，而离间祖孙关系的谣言，却更加汹涌。苏东坡不能不说话了，他写一份奏章，去找范祖禹商量，向皇帝揭穿谣言制造者的阴谋。不料范祖禹也写了同样的奏章，苏东坡看了，写得实在是好，就在奏章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苏东坡也好，范祖禹也好，都是正人君子，纯粹都是从大局谏言，希望皇帝不要被谣言所迷惑，但是他们不知道，或许也是知道的，即

将亲政的皇帝，对元祐的执政们，在内心里早已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

他们杜鹃吐血般的谏言，皇帝却把他看成苋菜水。

也就在这个时间里，苏东坡请求外放的请示批准了，被免去其礼部尚书职务，以两学士身份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

这是个迷。之前，苏东坡一再请外，都不获准，却在这样敏感时候，竟然放他出朝廷。这个迷，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太皇太后为保全苏东坡的最后之举，她活的时候，苏东坡在朝廷的日子都不好过，她撒手西天，苏东坡必然将陷入重围，所以放他出去，解放他。第二，是皇帝扫清亲政障碍的首先之举。而从苏东坡不得面辞的遭遇看，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不管怎样，离开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对苏东坡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

北宋的规矩，朝廷官员派去边防地区任职，要当面向皇帝辞行，皇帝却不见他了。苏东坡却仍然在尽心尽职，皇帝不见他，他就给皇帝上书《赴定州论事状》，它是苏东坡对皇帝最后的忠告，大意说：

陛下当了九年皇帝了，其实除了与执政大臣和台谏官员接触过，还没有与更多的其他官员见过面，因此，现在你亲政了，当务之急是要更多的了解下情，掌握下面的真实情况。我这样一个老臣，也算你的老师，现在要去边防地区，你竟然不见我了，你这种心态，想要疏远小人，自作主张，我看很难。皇帝你现在很年轻，也是聪明人，作为经历了四任皇帝的臣子，我希望陛下虚心循理，你现在才亲政，还没有作为，现在要做的，是细心考察所有事情的厉害，是细心考察每个大臣是正直还是奸邪，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来做这些基础工作，把事情的厉害搞清楚了，把大臣的品行搞清楚了，然后应物而作，这样做了之后，天下不会有怨恨，陛下也不会有悔恨。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事，陛下当然会有所作为。我只忧虑你急于有功，而不担心你三年以后才有作为，这个道理你应该看明白。

（下转第 78 页）

东坡精神赞（上）

李时英

在中国，每逢中秋佳节，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想起苏东坡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面对壮丽河山，人们往往情不自禁地吟诵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思念逝去的亲人，那催人泪下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便油然浮上心头……这说明，苏轼这位逝去九百余年的古代诗人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心里。

其实，东坡留给我们的，远不止那些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更值得珍视的是他那感人至深发人深省令人肃然起敬的东坡精神。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数以万计的俊杰精英。苏东坡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准确地说，他是我国古代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也最为深远的文化巨人之一。近千年，东坡作品为后世研读不衰，东坡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敬仰、称颂。

何为东坡精神？简而言之曰：改革求新、真诚坦荡、清廉爱民、坚韧乐观、不谋私利。

中国人景仰先贤，或因治政清明，或因军功卓著，或因爱民情重，或因操守高洁，或因文苑辉煌……苏东坡是集大成者：他是杰出的诗词书画大家，是几千年来不多见的文苑全能，他留下的作品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他是中国古代遭受磨难最多并在逆境中坚韧执着终于成就辉煌的旷世奇才；也是封建制度下一位无论顺境逆境都毫不动摇地坚持操守、关怀百姓的佼佼清官。

许多年来，人们只知道苏东坡是一位大文豪，却很少有人提及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坛的盛誉，湮没了他政坛的清名；更因为反对熙丰变法而被戴上“保守派”的帽子，使得他这位文坛巨人，蒙上了政坛小丑的阴影。

应该说，这是一桩应予平反的历史冤案。

改革求新，从不保守

说是冤案，并非信口雌黄，因为苏东坡从来不保守。自步入政坛的第一天起，他就反对因循守旧，极力主张改革朝政，主张“课百官，安万民，严择吏，裁冗官，抑兼并”。只是他的主张与先他十年走到皇帝身边并主持变法大政的王安石明显不同。王安石倡导的新法，多是官府伸手向百姓要钱，而苏轼反对与民争利。他认为：“大宋积贫积弱，并非祖宗之法有误。仁宗宝元年间朝廷岁收是盛唐开元的两倍，可见“祖制虽有缺失，并无大害。当今为害至大者，莫过于吏治腐败。若欲富国强兵，非从此事入手不可。”他还主张改革应稳步推进，打击面不要太宽，要避免采取过激和过急的做法。后来的事实证明，东坡没错。王安石倡导变法，其初衷是为富国强兵，但因其不合民心，他本人又过于刚愎自用，未能谦虚听取苏东坡和许多老臣的意见，实施的结果事与愿违，众多百姓对新法有抵触情绪，许多人因欠下官债无力偿还而被捕入狱。又因王安石重用的一帮政客小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扰乱了朝政，扰乱了民心，以致变法半途而废，未能实现既定目标。为此，十八岁登基、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大宋的神宗皇帝赵顼后悔不迭而忧心忡忡，才三十八岁便英年早逝。自神宗熙宁二年（1068）至徽宗宣和七年（1127）的六十年间，仁宗在位时的兴旺气象日渐消弭，竟至给后来金兵南侵、徽钦二帝蒙尘、北宋王朝覆灭留下亡国隐患。而苏东坡怀揣自己的政治主张治理密、徐二州，关心百姓利益所在，对新政予以适当修

补，全力投入救灾、助农，效果良好，得到老百姓齐声赞颂。元祐年间，苏东坡有机会接近高层，但因政敌们对他极尽攻讦之能事，使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得不离开京城，出任杭、颍、扬三地知州。在那里，他全力以赴救灾伤，除弊政，免积欠，兴水利……老百姓有口皆碑，颂声载道。

真诚坦荡，不假矫饰

苏东坡襟怀磊落，待人真诚。他说真话，办真事，讲真情，求真理。仕途跋涉四十余年，遇事辄直言不讳，从不人云亦云，不谙逢迎，不假矫饰，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之道更是一窍不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占得人间一味愚”。以他与司马光的关系为例。司马光德高望重，是东坡应制科试的主考官。苏东坡对司马光一直尊敬有加，司马光对东坡的才华和人品也十分赞赏。熙宁二年（1069）东坡两次上书神宗皇帝，毫不隐晦地批评新法，司马光引为“同志”，到了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做了宰相，主持朝政，下令全面废除新法。在朝臣们议论差役、免役（新法）执行孰废的热潮中，司马光做梦也没想到，十七年前志同道合反对新法的苏轼竟然与他唱开了反调，说是根据自己在密、徐二州执政的经验，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已实行十七年的免役法有五利二弊，应留不应废。为此，二人发生争执，互不相让。司马光说苏轼固执太过，苏轼说司马不讲道理。司马光说，“没想到你如此不识好歹！”苏轼说，“相公莫发脾气，当年，你作谏官，与韩魏公为陕西秦勇一事发生争论，魏公不高兴，你也不让步；怎么你做了宰相，就听不进别人与你不同的意见？”这一问，怒气冲冲的司马光竟无话可说，半晌才笑道：“我不和你争了，免得你说我摆宰相架子。”此次争吵过后才一个多月，苏东坡就由正四品中书舍人晋升为正三品翰林学士。过不久，司马光因病辞世。东坡伤心之余，对自己与老宰相争吵一事悔恨不已。但他还是认为自己与司马光争吵是失礼而非失理。为此，他被司马光的追随者视为誓不两立的仇雠，并联合一些嫉恨东坡的势力，持

续不断地对他予以攻讦。

爱民情重，为政清廉

苏轼东坡出身于平民之家，从小生活在百姓中间，他的“致君尧舜”之志与钟爱百姓之心浑成一体。初次为官，任凤翔府签书判官，他便能体察民情，改革衙前役，实施平反冤狱，免除百姓积欠。在杭州通判任上，他作诗反映新法不合民心，希望皇帝能从他的诗中体察百姓疾苦，有所感悟。他胸怀“致君尧舜”大志，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没奈何求做地方官。但这种“没奈何”并未使他为官敷衍塞责，也不限于恪尽职守，而是竭尽全力。在密州，他吃野菜粥过苦日子，还倡导收养弃孩，救治旱蝗灾害全力以赴。在徐州，他力排弃城逃难之议，率领军民抗洪抢险四十多天，夜宿堤上，灾后组织重建不遗余力。他出任杭州知州之日，正值两浙严重灾伤之秋，他连续七次进奏，请求朝廷拨给救灾钱粮。杭州瘟疫流行，他倡导建立公立医院并捐献全部积蓄。他到扬州上任，叫停大奸臣蔡京首倡劳民伤财的“万花会”。杭、颍、扬三知州任上，他一路大刀阔斧免除百姓积欠。在做过侍读学士（皇帝的老师）和礼部尚书之后，朝廷政风大变，他身遭冷遇，被打发出京去担任定州知州。他明知自己的职位朝不保夕，却仍然不顾一切地整饬腐败疲惰之风，惩治贪官劣吏。他被贬黄州，发现民间溺杀女婴之事，便倡导组织育儿会干预、救助。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他一如既往，依然时刻不忘百姓疾苦，爱管“闲事”。甚至没事寻事。在惠州， he 去架桥工地，问工程的主持人有无为难之事，听人说军队营房大缺，就去察看、询问，得知详情后，一再给任广东提刑的表兄程之才写信，要他出面向朝廷反映实情。不过在信中一再嘱咐，千万不要叫别人知道，他苏轼曾过问此事。

坚忍不拔，乐观向上

苏东坡仕途颠沛四十四年，三遭贬谪。老前辈文彦博说他才高众嫉。就因为这个“众嫉”，

除了三贬之外，还有接二连三的攻击、弹劾，弄得他无法安生。换了别人，大概早就没命了。比如汉代的贾谊，年轻时春风得意，雄心勃勃，得到汉文帝重用。而后遭到批评，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从从便此郁郁寡欢，才三十三岁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苏轼却是顺境逆境都能活得积极、平和、潇洒、风趣。

元丰二年七月，苏东坡被朝廷差人从湖州拘捕进京，临行向家人告别。家中上下老幼哭成一团，他却对眼睛哭红了的夫人王闰之说：“哭啥子嘛，皇上叫我去，去就是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见皇上。”接着讲了个笑话，逗得王闰之也忍俊不禁，笑了。

初到贬责地黄州，苏东坡虽曾一时情绪低落，自比“飘渺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也曾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的慨叹。但他很快进行自我调整，丢掉包袱，在生活中寻求乐趣。黄州五年，他努力摆脱思想和物质生活的困境，最终迎来东坡躬耕和文学创作两丰收。

元祐八年十月，苏东坡顶着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的头衔出京去做定州知州。不满半年，就被削去两学士衔，以左朝奉郎贬知英州，他不悲不叹，即日就道。在往英州途中，他又连遭两贬。六月，“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八月，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对此，他无惊无悸，唯盛暑中感到心寒而已。

初到惠州，知州詹范慕名予以礼遇，安排苏东坡住在驿站合江楼。可不到半月，广东转运使衙门有人传话：“合江楼是三司行衙，苏轼乃朝廷贬逐之人，居此不便。”他便把家搬到了嘉祐寺。不久表兄程之才任广东提刑，来惠州巡视，临走时嘱咐，让他搬回合江楼去住。过不久，程之才离开广东，转运使衙门又有人说话，不得已，又搬家……搬来搬去，实在叫人心烦，但东坡苦笑着摇头：“搬就搬，没啥子了不得的！”

（未完待续）

（湖南省衡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干部，作家、副编审）

（上接第 75 页）

我担心那些急功好利的人，动辄就给陛下出馊主意，很轻率的改这样变那样。因为有这样的担心，故进此说，我希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苏东坡对自己不得面辞皇帝，说得直言不讳：“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缺官，迎接人众为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已经五十八岁的苏东坡，去往边地，没有给自己讲价钱，字字见心，句句带血，说的是国家的长远，皇帝的长远，大宋的长远。但是，饱经世事的苏东坡很清楚，如同他当年劝谏神宗皇帝不可轻举妄动、谨防小人言行一样，同样年轻而急于有功的哲宗皇帝，一样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必须要尽够做臣子的职责。

果然，元祐八年(1093)十月，哲宗皇帝亲政，十二月，迅疾起用章惇、吕惠卿，太皇太后的担心，元祐重臣们的担心，无不应验。次年，改年号为绍圣。绍者继续也，继承也；圣者神也，说白了即神宗皇帝也。意图很明确，哲宗皇帝将再行神宗朝的路线、方针、政策。

元祐大臣的厄运从此开始，一场由哲宗皇帝和章惇、吕惠卿连手的报复行动，搞得血雨腥风，甚至死了多年的司马光，也被重重的追罚。

苏东坡从定州流放岭南。

直到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苏东坡死后 27 年了，才被平反昭雪。

（未完待续）

（雷金贵，眉山电视台副台长）

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流水）在苏轼逝世912周年之际，7月25~28日，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乐山师范学院隆重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与会者来自全国苏轼遗址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博单位等，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韩国东国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和台湾东吴大学的专家学者。收到海内外征文90篇，约94.5万字。这些论文涉及三苏文化精神与地方文化建设，三苏文化传承创新的现代价值意义，苏轼成才与地域文化环境关系，苏轼生平、思想、创作、影响，三苏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和文化思想比较等诸多方面，论文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范围广泛。

乐山市人大副主任罗国荣、乐山师范学院副院长杜学元等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张志烈教授在致辞中说，三苏作为蜀学的杰出代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与传承中的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此次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们围绕三苏文化传承与地方文化建设这一主题，进行广泛交流与探讨。主会场进行了两场大会主题报告，三个分会场分别进行了两个半天的学术交流。25日晚，还召开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11届理事会，就苏轼文化名片打造、人事安排、明年工作进行了商讨。

28日，与会专家学者还分别参观了眉山三苏祠和沙湾郭沫若纪念馆。

熊朝东“东坡传记”入选国家项目

本刊讯（熊莉）日前，眉山市苏学专家、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熊朝东撰写的东坡传记作品《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入选国家重点公益性文化项目“农薄图书”工程书目，于今年再版，由国家采购免费送农村。

《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200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更名为《千年英雄苏东坡》，更直观通俗，贴近群众，更适合基层读者阅读。该书采用传记的形式，既通俗易懂，又别开生面，将苏东坡性格鲜明、多才多艺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全书计23万余字、二十章，以“苏轼之名”开篇、“死

必不坠”收笔，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苏东坡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汪洋恣肆的一生。

正是因其简洁的线条、明白的文字，能够走进普通读者的精神世界，故而受到推崇，顺利入选。这不仅是眉山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是我市强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的生动实践，深受好评。

（熊莉，《眉山日报》见习记者，转自2013年7月16日《眉山日报》）

第 19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 征文启事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苏轼主政密州（诸城）期间，不但政绩卓然、彪炳史册，而且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赋，建造了超然台等千古名胜。苏轼于密州（诸城）形成的豪放词风、超然思想不仅是中国苏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城地方文化的重要宝贵财富，对诸城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诸城市政府曾于 1998 年 6 月成功举办了第 10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为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拓展苏学研究领域，加强学术交流，推动苏轼文化研究与地方文化研究开发相结合，中国苏轼研究会、诸城市人民政府决定联合举办“2014 中国（诸城）第 19 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此面向国内外学者征集论文。

一、征文范围

国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新闻出版部门、苏轼遗址地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好者，以及国外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好者。

二、征文内容

- (一) 苏轼知密州期间的思想、政绩、文学、行迹、历史影响
- (二) 苏轼超然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 (三) 诸城超然文化的内涵、形成、发展

与影响

- (四) 超然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对策等
- (五) 其它苏轼文化研究内容

三、征文时间

征文时间从征文启事刊出之日起到 2014 年 7 月 31 日止。稿件请发送到：《苏轼研究》编辑部电子邮箱：sushiyanjiu@163.com 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邮箱：chaorantaibj@163.com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内容提要 50~100 字，关键词 3~5 个，注释采用尾注；页面设置：A4 纸，题目 2 号黑体，正文 5 号宋体。在稿件左上角注明“应征稿件”字样，在稿件末尾注明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者 QQ，以便联系。主办者将在征文截止前一个月根据论文质量和作者情况，发正式邀请函。

五、会务联系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刘清泉
电话：028—38299092
山东省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乔云峰
电话：0536—6567956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2013 年 8 月

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暨 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广东海洋大学共同主办，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承办的“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暨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将于 2014 年 10 月下旬在广东海洋大学召开，兹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 (一) 苏东坡的流寓人生与文学研究
- (二) 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
- (三) 其它地区流寓文人研究
- (四) 流寓文化理论研究

二、论文征集

参会代表请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前，将论文按照《文学遗产》杂志发文格式排版，并发至指定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广东省湛江市湖光岩东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邮政编码：524088

联系人：蔡平 18826690598 (手机) Email:caipinga@126.com 邓建 13692353590 (手机) Email:dengj@gdou.edu.cn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
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
2013 年 4 月 16 日